

伊斯兰国家创立始末记

(伊) 费雷敦·胡韦达著





伊朗国王倒台始末记

(伊)费雷敦·胡韦达 著
周仲贤 译 怀成波 校



广东人民出版社

出版说明

《伊朗国王倒台始末记》的作者费雷敦·胡韦达，系长期担任伊朗首相阿米尔·阿巴斯·胡韦达的弟弟，一九七一至一九七九年是伊朗驻联合国常驻代表。他在书中以第一手材料，记述了巴列维王朝被推翻的前前后后，内容丰富，资料翔实，写法别致，深得国际上研究伊朗事务的专家和广大读者的重视。

伊朗盛产石油，战略地位重要，巴列维国王倒台后，伊朗局势的发展举世瞩目。本书对了解和研究伊朗统治阶级内部的纷争和当前事态演变的原因，不无裨益，是一本值得注意的书。

序

一九七八年十月三日，星期二，法国奥利

彤云密布，天空低垂。一个金属的庞然大物徐徐地降落在简易机场上。这架波音飞机慢悠悠地朝着停机坪滑去，最后停了下来，机舱门缓缓地打开了。

一个长得奇形怪状的人站在机舱门口，活象一个坠入陌生世界的天外来客。机场的职员和航空小姐，向他投以奇异的眼光。这个缠着黑头巾，蓄着又长又白看起来象假胡子的人物，究竟是哪一个朝代的人？他的眉毛很浓，一双眼睛放射出严厉的光芒，一眨也不眨。他朝迎候他的朋友们的方向踱了几步，人们立即围了过来，把他领进机场建筑物的迷宫。一名警官检查了他的护照，念出了鲁霍拉·穆萨维·霍梅尼这个姓名。

这群人穿过海关，步下楼梯，朝出口处走去。他们在中央广场靠近刻有戴高乐将军题词的大理石板附近停了片刻。戴高乐将军描绘这个机场的题词是“人间天上汇合处”。

阿亚图拉^①正在和反对派结合在一起。宗教正在革命的

^①指霍梅尼。阿亚图拉是伊斯兰教什叶派最高的头衔，它的意思是“真主的标志”或“真主的反映”。——译者

中心扎根。人间天上正在汇合在一起。

一九七八年十月三日，星期二，伊朗德黑兰

落日的余辉洒在厄尔布尔士山峰上。雅利安人的太阳——伊朗国王穆罕默德·礼萨·巴列维——在这座大山山麓的王宫里搓手庆幸，他终于拔掉了一根肉中刺。那个人被送过边界，从此在伊拉克的纳杰夫流亡。他远在四千英里之外，再也不能在伊朗境内策动颠覆活动了。这位王中之王宽慰地微笑着：他在计谋上比反对派略胜一筹，再一次占了上风。他给在纽约参加联合国大会会议的外交大臣发了贺电，因为正是这位大臣，根据国王的指示，同伊拉克外长谈判驱逐阿亚图拉出境的问题。

这位王中之王，雅利安人的太阳，礼萨·汗王的继承人，巴列维王朝的第二个君主，哪里会料想到，十月三日这个日子，不仅标志着他自己统治开始的开始，也是伊朗两千五百年君主统治结束的开始呢？！

移居离巴黎市中心几英里的诺夫勒勒夏托的霍梅尼突然被推到国际政治的前台。由于电视、电台和报刊的宣传，他成了一名世界性人物。他的启示甚至比过去更加容易传给伊朗群众了。为了躲避萨瓦克^①（国王的秘密警察）的镇压，长期以来一直以欧洲为基地的有组织的反对派，现在聚集在

^①伊朗国家安全和情报组织。——译者

阿亚图拉的周围，拥护他，并且制定出了建立政府的纲领。阿亚图拉在纳杰夫时，还不如在法国那样自由。伊拉克当局对他进行严密监视，限制他的来访者的人数，而且还不允许外国记者接近他。

十月三日之后，形势发展的速度加快了。国王与霍梅尼之间的较量进入了一个新的局面。犹如戏剧中的两个主角，重新开始中断了十五年之久的一盘棋赛。现在霍梅尼走棋了，国王则在坐待时机，对未来充满信心。

这两个人之间的敌对情绪由来已久。伊朗的什叶派一向鄙视巴列维一世礼萨国王，但是因为无法公开反对他，只得同他妥协。一九五三年，法兹洛莱·扎赫迪将军在中央情报局支持下发动了政变，穆罕默德·礼萨国王恢复了王位。他在此后十年之间，甩开了美国人强加给他的一些主要大臣。在终于取得了绝对权力之后，他于六十年代初提出了土地改革和实现现代化的计划。反应来得不慢，最激烈的反对者是霍梅尼。他号召他的信徒起来造反。一九六三年在德黑兰发生的骚乱，遭到了国王的血腥镇压，国王还把霍梅尼投入了监狱。宗教界进行煽动并提出抗议。为了平息他们的不满情绪，国王就把阿亚图拉流放到国外。阿亚图拉在土耳其作了短暂停留之后，就在纳杰夫定居下来。这样，国王赢得了第一个回合的胜利。但是，霍梅尼的性格同他的敌人的性格一样倔强固执，他并不认输。他在离开伊朗的时候嘟嘟囔囔地说：“人民到底是听谁的话，听我的还是听国王的，咱们等着瞧吧。”《古兰经》里不是有一节说到，真主是站在有耐

心的人的这一边的吗？十五年之后，两人又重新展开了激烈的斗争。

奇怪的是，国王在一九六三年的成功和阿亚图拉在一九七九年的得手，都得到了百分之九十五压倒多数公民投票的肯定：第一次是赞同君主政体和实现现代化，第二次是赞同建立伊斯兰共和国和反对现代化。不管这是一种竞赛也好，纯属一种巧合也罢，都无关紧要。有意思的是，在十五年里，全国人民的愿望竟然完全翻了个个儿。这种颠倒是怎样发生的呢？为什么会发生这种情况？这就是我要试图阐明的问题。我将回顾国王统治最后几个月的情况，并运用我的回忆录的材料，尽量客观地来阐明问题。我有时会感情用事的，如果发生这种情况，希望看了这几页的读者会预先原谅我。我忘不了我哥哥、前首相阿米尔·阿巴斯·胡韦达被谋害的事件，尽管有阿亚图拉向法国总统作出的保证^①，我哥哥还是在经过一场审讯闹剧之后被谋害了。

^①吉斯卡尔·德斯坦总统在一九七九年四月的一次记者招待会上提到了这个保证。——作者

伊朗国王倒台始末记

(伊)费雷敦·胡韦达 著

周仲贤 译 怀成波 校

•

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

广东省新华书店发行

广东粤中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32开本 5.875印张 100,000字

1981年12月第1版 1981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7,000册

书号3111·628 定价0.45元

(内部发行)

目 录

| | |
|-----------------------------|----------|
| 序 | 1 |
| 一九七八年十月三日，星期二，法国奥利..... | 1 |
| 一九七八年十月三日，星期二，伊朗德黑兰..... | 2 |
| 第一章 预示结局的先兆 | 1 |
| 一九七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星期日，伊朗德黑兰..... | 1 |
| 危机的端倪..... | 3 |
| 两个主角..... | 6 |
| 一九七八年一月八日，星期日，德黑兰..... | 8 |
| 一九七八年一月九日，星期一，库姆..... | 8 |
| 国王的信用..... | 11 |
| 我同国王的最后一次见面..... | 13 |
| 同我哥哥的最后会面..... | 17 |
| 相对平静的传位..... | 20 |
| 暴力的新浪潮..... | 24 |
| 国王面对现实..... | 29 |
| 暴力行动再起..... | 32 |
| 罢工..... | 37 |
| 反对谢里夫—埃马米的阴谋..... | 39 |

| | |
|------------------------------|-----------|
| 十月底的政治气候 | 42 |
| 第二章 日益增长的危险 | 46 |
| 逐步增大的危机 | 46 |
| 一九四四年十二月的伊朗 | 48 |
| 荣誉的一面 | 50 |
| 马赞达兰山区的西亚卡尔村，一九七一年四月十日 | 53 |
| 德黑兰，一九七二年五月三十日，星期二；尼克松 访问 | 54 |
| 德黑兰，尼亚瓦兰宫，一九七三年十二月；石油景 气 | 56 |
| 伊朗，瑞沙尔，一九七七年八月五日 | 59 |
| 危机的根源 | 63 |
| 政府里的政府 | 64 |
| 国王的首创性 | 65 |
| 腐化 | 66 |
| 镇压 | 69 |
| 毒品 | 70 |
| 不道德 | 71 |
| 巨大的军火库 | 73 |
| 经济恶化 | 75 |
| 一党治国和“不参与”政策 | 76 |
| 宗教骚乱 | 79 |
| 国际形势 | 81 |
| 一九七八年七月的德黑兰 | 85 |

| | |
|-----------------------------|-----|
| 第三章 变化中的国王 | 86 |
| 波斯波利斯，一九七一年十月十五日，星期五..... | 86 |
| 与历史的约会..... | 89 |
| 追求合法性..... | 91 |
| 我第一次会见国王..... | 94 |
| 从一九四九年的暗杀企图到摩萨台的倒台..... | 97 |
| 走向专政..... | 99 |
| 我同国王的第二次和第三次会见..... | 102 |
| 一九六五年的宫廷..... | 103 |
| 国王的弱点..... | 105 |
| 有其父，必有其子..... | 109 |
| 巴列维的财富..... | 111 |
| 家长作风..... | 114 |
| 巨大变化..... | 116 |
| 伟大中的伟大..... | 120 |
| 他们垮台得更惨..... | 123 |
| 第四章 最后垮台 | 123 |
| 伊朗阿莫尔城，一九七八年十月二十九日，星期日..... | 128 |
| 德黑兰，一九七八年十一月五日，星期日..... | 131 |
| 替罪羊的解决办法..... | 134 |
| 军政府的战术..... | 137 |
| 一九七八年十一月底的形势..... | 139 |
| 穆罕拉姆月..... | 141 |
| 塔舒阿节和阿舒拉节..... | 145 |

| | |
|--------------------------|-----|
| 我哥哥的境况 | 147 |
| 垂死挣扎 | 150 |
| 国王的出走 | 155 |
| 君主制度寿终正寝 | 160 |
| 巴赫蒂亚尔的末日 | 162 |
| 德黑兰，一九七九年二月十二日，星期一 | 165 |
| 尾声 | 166 |
| 德黑兰，一九七九年四月七日，星期六 | 166 |
| 帕拉迪西岛，一九七九年四月七日 | 167 |
| 跋 | 173 |
| 纽约，一九七九年六月 | 173 |
| 布里奇汉普顿，一九七九年九月 | 174 |

第一章 预示结局的先兆

没有人能够推翻我。我得到七十万军队、全体工人和绝大多数人民的支持。

——穆罕默德·礼萨·巴列维，一九七八年六月二十六日对《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周刊记者的谈话

一九七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星期日，伊朗德黑兰

卡特总统和夫人，在赴印度途中，同伊朗国王一起在尼亚瓦兰宫迎接了新年。这一访问引起了记者们的兴趣。这两个人其实在一个月之前已在华盛顿会晤过了。那么，这次在这里作中途停留是为什么呢？真实的情况是，这位美国总统（他的政府曾有时批评伊朗的独裁政权）要作出一种公开支持的姿态。他给伊朗国王带来了一份对人权问题表示满意的声明。午夜，两位国家元首频频举杯，痛饮香槟酒。卡特赞扬伊朗取得迅速的发展，并且对这位享有“他的人民对他的完全信赖”的开明君主表示钦佩。

过了不到一年之后，几乎所有伊朗大城市，都有成千上万的伊朗人走上街头，高呼“处死国王！”

为什么象美国总统那么一个消息灵通的人，竟然会大错

特错了呢？头一天在德黑兰美国文化中心门口放置的炸弹，分明是一个警告。而且，就在不久前，即十二月二十九日，情报机构已经宣布，禁止公众使用从麦赫拉巴德机场通向王宫的汽车道，警察占领了沿线所有的住宅和公寓。不仅如此，十一月间，就已经有戴假面具的示威者，在距白宫草坪只有几步的地方高喊“处死国王！”当然，另外有一群人在不远的地方对这位君主表示了不太热情的欢迎。但是，大家知道，阿德希尔·扎赫迪大使（一个将军的儿子、国王的前女婿）和萨瓦克分子，一直在伊朗的驻外使馆和领事馆中招募“志愿人员”。还有，对于美国一些大学和舆论工具对国王政权大声明确的抨击，总统不可能毫无觉察。象匹兹堡大学的理查德·科塔姆等教授，同国王的反对者有密切的接触，并且一直把情况告知政府。甚至在伊朗国内，反对派也重新活跃起来了，而且引导人们谈论反对派。报刊上充满了关于圣战者游击队和敢死者游击队（它们分别同宗教界人士和马克思主义者集团保持联系）行动的报道。

卡特在判断上的错误，是美国情报系统混乱不堪的很好证明。九月间，就在示威活动开始蔓延之际，中央情报局却写了一份关于这个政权稳定的报告，认为伊朗国王在国内没有面临什么威胁。一九七八年十一月十一日，总统决意把一份措辞严厉的书面判断材料发给国务院、中央情报局和国家安全委员会的负责人。接着就出现了这样的局面：在伊朗工作的各个机构的人员，根据上司的命令，谁也不得批评这个政权，或者同反对派接触。无论如何，对伊朗局势缺乏实事

求是的估计，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明美国政府为什么在整个事件过程中举棋不定。由于情况不明，苏联和其他国家也采取了谨慎行事的方针，它们一直等到最后几周才撤销对伊朗国王的支持。

危机的端倪

事实上这场危机酝酿已久。自从卡特当选为总统，接着开展了一场大力强调人权的宣传运动以来，伊朗的反对派，由于受到苏联持不同政见者榜样的鼓舞，已经组织起来。卡里姆·桑贾比的民族阵线（前身是五十年代的摩萨台党，这个党当时由于受到残酷的镇压而潜伏下来）重整旗鼓。拉希迪律师和迈赫迪·巴扎尔甘，创建了一个保卫人权和自由活动权委员会，公开散发传单和小册子。因此，在一九七七年五月间，五十多名律师签署了一项宣言，抗议行政部门干涉司法事务。六月间，一批作家，约四十人左右，要求享有言论自由、废除检查制度。七月间，一些知识分子发表了致国王的公开信，要求他结束专制统治。各种各样的批评材料在秘密流传。这些活动标志着这个国家政治生活的一个转折点，因为在此以前，抗议事件只限于在国外发生，或者是以城市游击队发动袭击的形式表现出来。

与此同时，在美国的压力之下，伊朗国王提出了一项“自由化”计划。他允许在报刊上和在这个国家的唯一政党——复兴党内，在一定程度上批评他的政府。他允许少数

议员——仍然是复兴党党员——投票反对政府提出的方案。萨瓦克虽然对各种活动进行严密监视，但还没有去找小册子和信件作者的麻烦。对一度很有权威的检查制度也稍为放松。但是这种羞羞答答的改变，并没有使渴望民主的热情冷却下来，而这种要求民主的热情，是推动伊朗学生和知识分子采取行动的力量。此外，也没有人真正相信这种改变。当英国记者艾伦·哈特问伊朗国王，他是否设想将来实行英国式的君主立宪制时，国王回答的大意是，如果那就是人民所希望要的制度的话，没有理由不这样做，不能违背人民的意志去治理人民，如果他们希望要那种制度的话，他们就会如愿以偿。①他当时这样说是诚心诚意的吗？我认为是这样的。他试图接过反对派提出的“民主化”的主张，就象他在一九六〇年，接过了当时的革命者鼓吹的改革的口号一样。如果他们要革命，他们就会如愿以偿，这是他当时的口头禅，不过，他们得从国王那里要革命。

但是，到了一九七七年，反对派警惕了。他们把国王的言论看作是转移卡特视线的把戏。事实上，曾经许下的在报刊上和唯一的政党复兴党内可以有辩论自由的诺言，也迟迟没有履行。这怎么能够使人无视这位君主对西方民主尖酸刻薄的批评呢？他在记者采访他的许多场合，从来不放过机会，对当代世界伟人评头品足。他抨击美国“伸缩性社会”，抨击英国工人的“懒散”、意大利的政局“动乱”。

①一九七七年六月九日英国《泰晤士报》。——作者

等等，等等。他在和人私下的谈话中，有时也突如其来地提出过这种指责。一九七六年夏天，我出席了在里海之滨瑙沙尔举行的御宴，同席的另一位客人是玛丽安·贾维茨，她是纽约一位资历高深的参议员的妻子，当时是国王的公共关系顾问。国王同贾维茨夫人发生了一场争论。这位君主严厉地批评美国的民主，并且断言，伊朗人享有凡是想象得出的一切人权。在美国，腐败作风猖獗；而在伊朗，政府把盗贼抓起来，哪怕这些人在社会上有很高的地位，也照样抓起来。伊朗国王的冷讽热嘲使客人们感到寒心。

清真寺是这个国家反对派的传统中心，在这里正在开展政治活动。在一个不能够在议会发泄不满情绪的社会里，相对来说不可亵渎的圣地，自然就成了持不同政见者的活动中心。教士们把对社会和政治的批评，同他们的讲经掺和在一起，不仅如此，随后还展开了真正的辩论。大批参加聚礼日活动的教徒，听到了非法带进来的霍梅尼在纳杰夫演说的录音，教徒们还把听到的东西到清真寺外去扩散。从伊拉克归来的游客，带回了霍梅尼讲话的录音带，上面贴着东方音乐的标签，骗过海关和警察的检查。这些录音带在库姆和德黑兰的商店里公开出售。

就这样，流亡了十五年之后，霍梅尼的声音在全国都听到了。除此之外，反对这个政权的各式各样的人物，都到纳杰夫去拜访阿亚图拉。亚兹迪和戈特布扎德（后来成了他的左右手），在一九七七年就去见了他数次。这种情况必然会触怒国王，特别是因为这位在纳杰夫的流亡者，讲经时

对他进行了人身攻击。

两个主角

国王憎恨霍梅尼，并且不隐讳这一点。他不放弃一切机会贬低霍梅尼。对这种“关照”，霍梅尼给予加倍的回敬。用不着追溯他们在六十年代初期争吵的原因，这里还可以举出他们最近不和的若干例子。一九七一年，国王对法国《世界报》记者埃里克·鲁洛说，“伊朗人民瞧不起霍梅尼这种外国血统的人，因为他出生在印度，他还是一个背叛收养他的国家的卖国贼，甚至据说他还是个英国雇佣的间谍，他还受伊拉克的雇佣。”

国王这番惊人的妙语，是对霍梅尼在“庆祝”君主政体建立两千五百周年前夕发表的攻击性长篇讲话的报复。他的讲话被印发给伊朗的所有宗教领袖。这个在纳杰夫的流亡者在讲话中喊道：“伊朗人民会去歌颂背叛伊斯兰教的那个人吗？……那个人在一九六三年……在库姆屠杀了一百人，在全国屠杀了一千五百多人，伊朗人民会去歌颂他吗？”

说来也奇怪，这两个不共戴天的仇人竟然有许多相似之处。他们都很顽固和爱报复。对于本国的问题和世界上的问题，他们都提出简单化的主张。两人都容不得矛盾的现象。他们都自认为是按真主的旨意行事。他们都想当人民无可争辩的领袖。他们的独裁欲望没有止境。

当然，他们过着不同的生活。霍梅尼是一个禁欲主义

者，而国王则尚豪华，讲排场，注重繁文缛节。“即使国王有历史的半神秘性的一面以及君主政体对伊朗人民有重要意义，这里的人谁也不能理解在君主在场的情况下，怎么可以不遵守一定的规则。”^①国王在一九七五年向作家奥利维埃·瓦兰谈到了自己的这一看法。

撇开礼仪不谈，他们是有共鸣的。且听霍梅尼说的话：“从宗教观点来说，我有权自行其是……当我看到这场运动的规模的时候，我就看到了真主在其中的作用。那不是人力所能够做到的。”再听听国王有一次当着我的面对他的一些助手讲的话：“没有神的支持，我的革命就无法进行。没有真主的支持，我就会象其他人一样，是个平庸的人。而神的帮助将保证我们的事业得以继续下去。”

实际上，当权后的霍梅尼同他的前任一样不能容人。他在致吉斯卡尔·德斯坦总统的信中，对他在法国的“朋友们”，“为少数几个犯罪分子和小偷的事”，当面提出人权问题批评他“表示遗憾”。^②而国王则对那些端出人权问题批评他对“几棵杂草”采取行动的人，动辄加以责骂。霍梅尼在谈到马克思主义者时说，“他们是小孩子，对伊朗社会一无所知。”^③而国王则说，“这些人论年龄已是成年人，但是举止却很幼稚。”霍梅尼象国王一样，限制出版自由，只

^①奥利维埃·瓦兰：《狮子与太阳》（1976年巴黎斯托克出版社）。——作者

^②法国《世界报》1979年5月13—14日。——作者

^③法国《外交世界》月刊1979年4月。——作者

许刊登不违反“人民感情”的消息和文章。象萨瓦克一样，“委员会”恣意捕人，并进行即刻裁决。象国王的法院一样，“伊斯兰”法庭无视整个西方世界公认应有的诉讼规则。

实际情况是，这两个人仿佛是从一块布上裁出来的，是一路货色。

一九七八年一月八日，星期日，德黑兰

一九七八年一月九日，星期一，库姆

国王听到有人把录音带私运进来的消息时，对他的特务机关和警察大发雷霆。至此他已控制不住自己的坏脾气了，他迫不及待地要进行报复，他没有同任何人商量就命令刊登一篇对阿亚图拉大肆贬辱的文章（这篇匿名文章指控阿亚图拉有同性恋的癖好，拿他在外国出生这点大做文章，说什么他的母亲是一个职业舞女等等）。新闻大臣大流士·胡马云（阿德希尔·扎赫迪的姻兄弟），强迫德黑兰的一家大报刊登这篇文章。这就是触发火药桶爆炸的星星之火。

反应来得很快，次日就在法蒂玛陵墓所在地——圣城库姆爆发了。虔诚的教徒们在清真寺周围进行示威游行，抗议对宗教领袖进行恶毒攻击。军警向群众开枪，打死了好几个人。

于是便开始了一系列的送殡仪式，因为根据伊朗的传统，在人死后第四十天要举行这种仪式纪念死者。由于每次

示威游行都有人死亡，因此每隔四十天都有信徒们冲破保安部队的阻拦，冒险上街游行。参加这种示威游行的人，大部分是非教徒的反对派。他们中有越来越多的人参加宗教仪式的游行，扩大了抗议者的队伍。阿亚图拉·沙里亚特—马达里（此人生于大不里士，住在库姆），七十六岁，是伊朗最受人尊敬的宗教领袖，他号召虔诚的教徒们在全国各地起来反对镇压。

库姆事件发生之后的第二天，阿穆泽加尔首相在复兴党政治局的会议上说，政府采取坚定的立场，事先挫败了卖国贼危及国家崇高利益的计划。在他看来，保安部队的干预，阻止了事态的发展。

然而，一九七八年二月十八日在大不里士，数千名群众举行了纪念库姆死难者的示威。示威发展成为骚乱，据目击者说，正是在这里第一次喊出了“处死国王！”的口号。群众捣碎银行和商店的玻璃窗，袭击复兴党的地方办事处——他们袭击银行，因为银行借钱要利息的做法，是同伊斯兰教规背道而驰的；他们袭击电影院，因为电影院上映黄色电影；袭击复兴党，因为它代表政权。警察向群众开火，几个人被打死。政府利用它对报刊和电台的控制缩小事态，还撤换了阿塞拜疆省省长，开除了大不里士警察局长，作为对公众舆论的一种笼络。当我回顾这个时期的情况时，最使我感到惊讶的是，国王对局势的严重性所作的错误判断。在这场危机中登场的各种各样的人，各种各样的角色，都云集在大不里士。他只消看一看、听一听、想一想就行了。

三月三十日，为响应宗教领袖们的号召，在几个城镇，特别是在德黑兰和伊斯法罕，举行了悼念大不里士受害者的游行。保安部队再次进行干预。当局宣布有五人死亡，反对派则说有三十多人。

在这关键时刻，德黑兰加斯尔监狱的政治犯举行绝食。政府先是否认这一消息，但是后来承认了，同时又试图缩小它的规模。巴扎尔甘创建的捍卫人权和自由委员会，指控狱吏虐待绝食者。

后来，在其他城镇也举行了类似德黑兰和伊斯法罕举行的示威游行，其中有许多是和平游行，因为宗教领导人曾提出这样的劝告。但是，在伊朗东南地区的亚兹德和贾赫罗姆的游行发展成了暴力行动。政府方面说，在这两个城市里有三人被打死，反对派则说是三十二人。

震撼全国的为期四十天的恶性循环，就这样发展起来了，这场争夺也就这样日益演变成一次宗教革命。

在德黑兰，相当沉着的国王却批评萨瓦克的头子纳西里将军和他的首相：他们怎么能让事态弄得如此束手无策？他下令由复兴党举行反示威。四月二日，复兴党领导人在大不里士纠集数千名工人、农民和贵族，参加这一活动。

我当时正在塞内加尔的达喀尔，在伊朗大使馆里收听德黑兰电台关于大不里士集会的实况转播。复兴党副书记贾法里昂，用深奥得使群众难以理解的华丽词藻发表了一通演说。他赞美这个政权，赞美“国王和人民革命”带来的好处——农民拥有了土地，工人在企业利润中可以分到百分之二

十，人民享有社会保险，等等。演讲者每次提到国王的名字时，便自动爆发出一阵掌声。“愚蠢至极！”我拍案喊道。

“为什么？”大使问道。我向他解释说，阿塞拜疆的工人和农民，只能讲最基本的波斯语，他们怎能听得懂这种文绉绉的话呢？我对他说：“事实上，贾法里昂不是在向群众讲话，而是在对国王讲话——国王肯定在收听电台的转播。”

因为这是政府中的惯常做法。高级官员丝毫不在乎他们的声明对人民发生什么影响，而只关心国王的反应。

国王未受大不里士事件的干扰，继续推行他的自由化政策。但是，他的指令照例含糊糊糊。没有人确切知道，他的葫芦里到底装的什么药，他对自由的限度究竟有多大。反对派认为，国王的做法是一个圈套：当局正设法迫使不同政见者从隐藏处出来。就国王自己的人来说，由于习惯于多年的独裁统治，对此也满腹狐疑：他们觉得，国王可能是要考验支持者的忠心。这种普遍的怀疑情绪，是由于国王以前常常批评民主所致。

国王的信用

国王在一九七六年十月三十日接见伊朗《世界报》记者时宣称：

如果说存在民主，能同我们正在做的有什么不同吗？……民主的真正含意是什么？对有些人来说，民主意味着在城市和首府的中心光天化日之下袭击人民，特别

是妇女，进行抢劫，然后用刀子刺杀他们……在有的国家中，有一半选民弃权，人民四分五裂……有的人在民主和人权问题上批评我们，这是荒唐可笑的……那些在自己的家中、在大街上或者在旅馆的房间里，因为钱的缘故而被谋杀的无辜人民，有何权利可言？难道他们不是人吗？他们不该有权利吗？如果他们享有权利，可又有谁保护他们呢？而我们（在伊朗）做了些什么呢？我们不仅把卖国贼，而且还把恐怖分子抓起来。我们保护我们的人民免受他们的伤害，我们不会给他们机会，把我们的国家和盘拱手送给敌人。难道这不是保护人权吗？当我们在阻止无辜人民惨遭杀害之时，谁又能说我们不是在保护人权呢？

国王一九七七年，在伊朗出版了最后一本书。他给这本书起了一个极其响亮的名字：《走向伟大的文明》。他写道：

在我们的民主生活中，个人的自由是同秩序和社会纪律不可分割的。每一个公民享有最充分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权利……我们的民主是一种合法自由、合法政治、经济和社会权利，不是无政府主义，不是破坏和谋反。对此，我的意思是，在伊朗，我们不接受、也不会原谅破坏和捣乱，我们不给受骗者、怀有恶意者和疯子以公民权利。他们在先进国家里，在任何情形之下都获得充裕供应，不幸的是，他们却构成一种国际恐怖主义。这些人由于愚昧无知或者逻辑紊乱，由于被洗脑或者神经失常，在诸如伊斯兰马克思主义（其先天固有的

矛盾，即使一个小孩子也能看得出来）等混乱思想的名义下面被引入歧途。他们正在从事针对他们国家的破坏、甚至谋杀等行径（这自然有利于外国利益），认为制造混乱是他们“英勇”使命的一部分。显然，这些人的活动——不管他们是糊涂愚蠢，还是蓄意谋反——为反对这个国家的进步和建设秩序效力时，都不会有任何结果，而且也不必引起真正的忧虑。但是，看到这为数不多的杂草在探头探脑也着实令人讨厌。这就象有些人，本来是成年人的年纪，待人接物却是小孩子的一套。

我同国王的最后一次见面

我最后一次见到国王是在一九七八年四月的一天。

当天下午，一些身着镶有金边的军服和挂满勋章的军人中间，正进行着一场讨论。他们谈论在他们的统帅麾下的军队的各方面问题，一点也没有受到在库姆、大不里士、伊斯法罕和亚兹德发生的事件的影响。我颇感惊讶地注意到，国王在同一个时间接见他们。最后一个走进帝国办公室的总参谋长，一点也没有——至少可以这样说——对这种异乎寻常的程序感到不快。人们常常说，国王赞同分而治之的想法，可是又有谁会想到他会走这么远呢？

最后轮到我了。我发现国王决心奉行他的“自由化”政策。他一如既往，几乎不让我插上片言只语。他滔滔不绝地

说着，仿佛在向自己发表演说。他描绘了一幅关于伊朗及其发展的乐观图景。他声称：“我们已经击败通货膨胀。”（当然，食品价格被确定在一个合理的水平上，但是只有在黑市上才买得到。）接着，他提出了最近发生的骚乱问题：“这没什么了不起。还有大不里士吗？还有伊斯法罕吗？这是为了民主化所要付出的代价。没有什么危险。更何况，谁敢反对我呢？霍梅尼吗？他算得了什么！桑贾比和其他人吗？他们没有资格，都是卖国贼。”当我被这些话吓得脸色发白时，他盯着我的眼睛说：“是的——我们有文件，说明他们同外国主子有联系，就象摩萨台一样。”

说到这儿，我设法插空提了一个问题：“既然存在这些证据，为什么你不公之于众？”

他回答道：“一俟时间合适就公开发表。”他呷了一口茶接着说：“所有这些都害怕我的自由化政策，就象他们害怕我在一九六二年实行的改革政策一样。自由化政策砍断了他们的老根。他们并不使我感到可怕。我将继续前进。人民、真正的人民同我站在一起。”

我探询到他写《走向伟大的文明》一书的意向（我根据他的命令，承蒙我同事索海拉·沙卡尔的帮助，刚把此书译成法文），企图使他明白这本书必定会产生相反的影响。可是这是白费时间：“伟大的文明”是他的口头禅，是他自己的小小发明。对他来说，一个想象中的世界比现实更加真实。我的话说了半句就给他打断了，“对于此事，有口皆碑。我在书中所写的东西，对伊朗的未来至关重要。”

他在位三十七年，从未明白奉承拍马的危险。此书的英文译者福阿德·鲁哈尼，赞同索海拉·沙卡尔和我的意见，即如果说这不是妄想狂也是一派胡言。问题并不是这本书必定会引起反作用使我们担心，而是其内容。国王在书中把全国描绘成一幅田园诗般的情景，而这是无处可寻的：

十五年之前开始的我国革命，是伊朗历史上最伟大的变革……通过革命，所有阻碍积极行动的屏障都已拆除，这样，各种才能和潜力都能自由地发挥，伊朗人民可以平等地享受他们的劳动成果……

今天，建立在现实主义和深谋远虑基础上的我国经济，正在健康地蒸蒸日上。有赖于此，一个崭新的伊朗正在诞生。这将使所有公民受益……

谈到制止通货膨胀，我们的成就在世界上是空前的，是一个未被打破的纪录……

近年来，我们的社会享受了为数众多的特权，未遇到重大困难……给予伊朗工人的某些好处，即使最先进的工业国家和社会主义世界，也是无法比拟的。同样，伊朗农民享有的权利和特权，远远超过许多国家农业工人经过数百年才能达到的水平……在一般的社会福利方面，工业国家尽管为之进行了长期和艰苦的奋斗，还是被伊朗所超过。

我可以列举更多的例子，但是，上述几段节录已足以说明，国王的思想脱离日常生活的现实。

我从塞内加尔返回伊朗之前，同萨德鲁丁·阿加·汗和

美国驻联合国大使安德鲁·扬进行了交谈。我对他们说：

“这是难以相信的。他完全同现实失去了接触。如果说你要听听我的看法，那么，我说前进路上存在麻烦，是混不下去的。”我在同德黑兰的官员们交谈之后，可以看出，他们并未拥有那本书中所说的一切。然而，国王仍然继续他的梦呓：“自由化是必要的。我们正在进入革命的新阶段。胡安·卡洛斯^①毕竟设法实现了，而他们也还有一些障碍……”

我离开王宫时深感悲观。没有一个人敢对他说，你不能同时既是佛朗哥，又是胡安·卡洛斯。长期以来我一直担心的事现在得到证实：他脱离现实，不了解他的国家动乱发展到什么程度。我想，从五十年代以来，伊朗看来再也没有比一九七八年春天那样，更处在一种人们不满的状态之中。我所到之处，不管是朋友还是陌生人，都毫不犹豫地提出他们的批评。断电、缺粮、急剧的通货膨胀（尽管政府发表胜利公报）、高昂的房租、交通拥塞、检查制度、镇压——如此等等，民怨沸腾，随时可能爆发。如果说人们还没有公开侮辱国王本人的话，他们无疑在抱怨他的家庭成员：阿布多雷扎干了这件事，戈拉姆雷扎干了那件事，等等。他们不提这些人的王室头衔。人们最喜欢谈论的目标是国王的孪生妹妹阿什拉芙公主。她在一九七七年从戛纳^②赌场回来的路上，她的汽车遭到了伏击。一九七八年春天在德黑兰流传着关于这次事件的各种说法：有的说此事牵涉到一个贩毒集

①胡安·卡洛斯，西班牙国王。——译者

②戛纳：法国的地中海城市。——译者

团，有的说是一次黑手党的袭击。同她有关系的人的名字是人所共知的。她和她的随从垄断了伊朗大部分生意也是人们共同的想法。

同我哥哥的最后会面

我同我哥哥一起吃饭时（当时他任宫廷大臣），他同意我的看法：国王作为“伊朗之父”的形象，无疑已日薄西山，而不满情绪强烈。“对所有这一切，王室负有严重责任，”阿米尔·阿巴斯说道。“如果国王失去他的王位，那是因为他兄弟姊妹的缘故。你不可能了解宫廷内幕：充满勾心斗角，是一个腐败的老巢。我同老板谈过这些事（他参加政府以后，一直称呼国王为老板）。我曾千百次地对他说，同腐败进行斗争时，要先从自己的家庭开始，而且他应当严格以身作则。一九七五年，美国参议院的质询透露，成百万美元佣金给了这儿身居高位的人，其中包括他自己家庭中的成员。而他却对我说，这是自然的事，他的兄弟姊妹有权做生意，象其他人一样谋生，经商付佣金的做法世界各地皆然。”

我对我哥哥说，这有力地证明了国王不懂服务费用与彻头彻尾的偷盗之间的区别。

“是的，”我哥哥说，“但是他最后同意了我的论点，授权我为王室成员起草一项行为准则。根据这个准则的条款，他们将无权参加任何涉及到国家的商业交易，不允许他

们举荐大臣，或者请求大臣给予支持，他们也不能再保留官方职位，等等。不幸的是，每一次我请他公布这个准则，他总对我说等一等。”

这个准则在十月底披露，可是这时大多数王子和公主都已经离开伊朗。尽管如此，我发现我哥哥同一年前相比变得悲观了。几天之后，在一次有某些王室成员参加的招待会上，我看到了他对整个聚会惹人注目的排场的态度。他在一个朋友的耳边悄悄地说：“我们生活在庞培^①末日之中。”

在离开德黑兰之前，我再次去见我的哥哥。我问他为什么不辞职。“我已经走得那么远了，”他说，“现在，风暴既起，我反倒不想离开这条船。的确，我应当在石油价格暴涨之后的一九七四年离开。正是从那以后，一切都发生了变化。”

“那么，如果我离开外交部，会怎样呢？”我问他，“会不会给你增添麻烦？”

“不会，为什么会呢？由你自便吧。但是在目前的形势之下，你的态度会证明什么呢？两方面——左派和右派——都不会相信你。他们会说，你看到麻烦来了就临阵逃脱了。”他点燃烟斗，抽了一口，继续说：“你应该帮助解决这些问题。我们的国家处在危机之中。你不忘记你的左派朋友。假如我不在这个职位上，你也不提醒我，左派中的许多人现在可能早已长眠地下了。我总是试图使温度降下来，帮助我的部下和教士……如果我离职而去，牟取暴利的人将更加肆无

^①庞培，意大利古城，因附近火山爆发而湮没。——译者

忌惮地进行偷窃。”

我告诉阿米尔·阿巴斯，我对国王已不抱任何信心。

“他的书使人毛骨悚然。他同一九六五年相比变化多大呀！他不再是同一个人了。你会看到，他将放弃这条船，离开我们所有的人而去。你应当在一九七五年你生病时和所有那些腐败丑闻暴露前挂冠而去。”

我哥哥磕干净他的烟斗说：“我们都生活在同一个政权之下，而且不论喜欢还是不喜欢，我们都得进行合作。有些在政府里任职，有些不在政府里任职，没法作任何选择。在这个国家里，你不能辞职。你应该一开始就不要卷进去。”

“那谁来负责任？”我顶上一句。

“什么责任？”我哥哥听起来火了，“他自己作的决定。我甚至不知道军队和萨瓦克内部发生了什么情况……我竭尽职守。我从未偷过一个铜板。我从未下令向群众开枪……”

我哥哥在一九七九年四月初遭到的不公正的审判中，曾多次重复这些话。在他被谋害后，霍梅尼的总理迈赫迪·巴扎尔甘，几乎逐字重复过这些话。象阿米尔·阿巴斯一样，他曾几次提出辞职，但均遭到拒绝。为什么他不顾另一个权力中心给他制造的困难，还呆在职位上呢？难道他不也象我哥哥一样考虑的是国家的利益吗？难道他不是因为相信，如果放弃自己的职务，他的继任者会更加走极端吗？难道他不是因为想到由于他在职而会缓和许多冲击吗？这两种形势之间的相似之处是值得人们牢记心头的。

当我向哥哥告别时，我断没想到，这竟会成了永诀。

相对平静的传位

一九七八年五月十日在库姆，保安部队为了追捕“骚乱分子”，进入了据说是各宗教领袖、特别是阿亚图拉沙里亚特—马达里的神圣不可侵犯的住宅。政府发表一项公报，表示对这一事件“深为遗憾”：“事实是，（进入了某些人的住宅）追捕从事反对国家利益的骚乱分子，说明追捕者的无知，他们不是库姆本地人。”虽然公报这么说，可在全国仍进行了无数的逮捕。

五月十一日，在宗教领袖们支持之下，德黑兰举行了示威游行，迫使国王推迟出国访问，以便掌管军队，避免“一场无用的血洗”。十六日，国王说，他打算奉行他的“自由化”政策，但是，面对“最终目标是分裂国家的挑衅行动”，军队不会坐视不理。六月五日，德黑兰、马什哈德、库姆和大不里士的市场统统关闭。

国王为了使自己的民主化努力取得人们一定程度的信赖，解除了纳西里的萨瓦克头子的职务，任命他为驻巴基斯坦大使。这是说明这个政权一个值得注意的特征的合适之处：它的决定总是模棱两可的。如果国王真的要摒弃他的秘密警察，他应当把纳西里送交审判。他在十一月份之前一直没有那么做；但是到了十一月份，即便那样做，也已经太晚了。从那时起，国王和他的政府采取的所有措施，都已不起作用了。他们看起来，要末被事件弄得胆战心惊，要末

被事件所左右。国王用一个较为温和的人莫加达姆将军取代纳西里，试图平息公众的愤怒。但是人们认为，警察作出暴力反应是彻头彻尾的挑衅，打算制造一种恐怖气氛，从而阻止示威游行。

虽然如此，一九七八年六月十七日举行的纪念库姆被害者的集会，却没有发生事件。德黑兰市场和少数商店那天仍然停业，而在其他地方商业活动照常进行。警察仅限于驱散清真寺周围的集会。

霍梅尼从他在纳杰夫的巢穴宣告，最近的骚乱是一次“巨大爆炸”的最初讯号。国王无动于衷。他对《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周刊（一九七八年六月二十六日）记者说，示威游行有些构成了针对他本人的个人复仇行为。他把这些归结为某些宗教领袖反对他的现代化计划，并谴责共产党人同穆斯林分子相勾结的“奇怪现象”。他冷静地断言：“没有人能够推翻我。我得到七十万军队、全体工人和绝大多数人民的支持。”他拒绝建立多党制的意见，并声称，许多政治犯已经获释，余者如果同意“悔过”，亦可获释。但是，他不再谈论五年内使伊朗成为一个工业国家了。“我们希望十年内成为欧洲现在的样子。这将并不容易。但是我们希望在二十年内成为一个完全先进的国家。”他把他的“自由化”政策说成减少了“恐怖主义”活动，而当时的事实是，被打得七零八落的城市游击队组织，利用这个间隙喘过气来，重新组织更具有决定性的战斗。他们正在同霍梅尼和在欧洲难民中的反对派进行接触。

显然，国王难以推卸对这个国家存在的大部分问题的责任。六月底，他仍然对伊朗沉疴的深刻根源和局势的严重性一无所知。一个在其他场合颇有鉴别能力的人，可能这样吗？

事实上他只能引咎自责。多年以来，他专横独裁的秉性，使人不敢提出批评和反驳。由于担心会惹恼他，他的合作者——甚至萨瓦克分子——也在他们的报告中，把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如果他面对现实，如果他注意倾听顾问们的意见（我哥哥也算其中的一个），在三条战线采取行动，他有可能转危为安。这三条战线是：他应当宣布向腐化公开宣战，先从自己家庭开刀；给予人们言论自由，解散单一的复兴党，这个党缺乏群众基础是显而易见的；同阿亚图拉沙里亚特—马达里和其他温和的宗教领袖们举行谈判。事实上，霍梅尼当时还未成为无可争辩的反对派领袖。温和的宗教领袖们，并没有要求废除君主政体，只是要求实施一九〇六年宪法和宗教受到国家尊重。

国王没有利用七月这个相对平静的有利时机，采取某种决定性的行动，开始同宗教和世俗反对派对话，而是跑到里海，同他的朋友、前希腊国王康斯坦丁和约旦国王侯赛因一起度假去了。

霍梅尼却没有休息。他加倍赶制说道布教的录音，并加强了同伊朗宗教中心和国外新的支持者们的联系（亚兹迪在美国建立并加强了他的伊斯兰运动，戈特布扎德同巴勒斯坦解放组织进行接触）。他决心从已经在伊朗开始的这场运动

中，获取最大的好处。世俗反对派也正在组织起来，知识分子正在刻写油印传单，秘密散发。年轻人在这个既不能使他们舒适又不能赋予他们美德的消费社会中，感到迷惘。腐败成风，只有报纸上的文章和词藻华丽的演讲表示反对。复兴党在错综复杂的矛盾中，已毫无希望。在现有的两个阵营中，又增加一个第三者。此党受前德黑兰大学校长、前内阁大臣和王后的私人秘书胡桑·纳哈万德的控制。复兴党内勾心斗角。总书记、前首相阿穆泽加尔，一门心思利用它们为自己谋利。

八月五日，国王在宪法周年纪念日发表广播文告，答应一九七九年六月举行“百分之百的自由选举”。不属于复兴党的候选人，在他们入选者的指派之下也可以参加。只有“法律禁止”的共产党被排除在外。人们抱着怀疑的态度对待这一消息。

政权的反对派在宗教的旗帜下，日益紧密团结起来的时候，统治阶级内部的裂痕却正在扩大。保安部队自一月份以来，枪杀了数百名群众。阿穆泽加尔政府的倒台迫在眉睫，大臣级的新人选似乎已经准备就绪。纳哈万德，得到王后的信任，背后也有一些年轻人支持。阿德希尔·扎赫迪，一直觊觎首相职位，亦重新引起了他的朋友们的注意。在“老班底”中，前首相阿里·阿米尼，重新开始了同宗教界的接触。谣言工厂也开工了。一些人谈起我哥哥可能东山再起，从而对十分重要的忠诚和“政治上的灵活性”表示敬意。后者的可能性，使其他候选人感到心烦意乱，他们联合起来，

在迎合低级趣味的报纸上攻击我哥哥。此外，自从阿穆泽加尔被任命为首相以来，他常常抨击前十四年政府的所作所为，忘了他自己也曾是那个政府中的一员。鉴于没有言论自由，有谁会相信对我哥哥的诽谤是自发的呢？

我打电话问阿米尔·阿巴斯为什么不回答——难道他不担心沉默可能被曲解吗？他的回答是，国王不喜欢他的宫廷大臣卷入同报纸的争吵。朋友们告诉我，国王发现形势有利；他自己正在受到反对派的人身攻击，他希望把批评转嫁到他的合作者身上。

回顾这一段时期，我不能不提出一些恼人的问题。难道不正是国王本人鼓动起整个这场运动的吗？在我哥哥一九七七年八月被解除首相职务之后，国王仍然允许他的现任首相、议员和报纸，继续重复对阿米尔·阿巴斯的造谣中伤。也许他已经在考虑，是否把我哥哥作为他犯错误的替罪羊了。

暴力的新浪潮

正是在这种捉摸不定的气氛之中，暴力行动于一九七八年八月十一日斋月开始之时，在伊斯法罕爆发了。从黎明起，数百名群众，大部分是青年人，带着装满汽油的罐头盒，进入市中心，焚烧警车、银行和电影院，高喊“国王哈鲁姆扎德奇！”（国王杂种）。警察和军队用自动武器开火，受害者达一百多人。

为什么会突然爆发暴力行动呢？前一天，群众轮流前往一位地位很高的宗教人士的住宅，抗议逮捕另一个教士。警察殴打他们，并向他们开枪，因而引起全城的反抗。最有煽动性的谣言不胫而走，说什么开枪是伊朗士兵装束的以色列突击队干的。在国王命令之下，政府实施戒严令，但是群众无视宵禁，罢工和示威在亚兹德、大不里士、设拉子、库姆、德黑兰和其他地方爆发了，并席卷全国。一群群年轻人袭击间接代表政权的任何东西——警察、军车、外国公司的办公室和复兴党会议室，等等。萨瓦克被指控派便衣人员在街上杀害群众，还有报告指控萨瓦克打恐吓电话，威胁反对派成员。

正在这个节骨眼上，八月十九日晚，大火吞噬了阿巴丹的雷斯电影院，据官方公布的数字，死亡人数达三百七十七人。政府报纸和电台先指责这种“罪恶行径”，是一个宗教狂热组织所为，继而又指责是外国代理人所干。群情高涨。当阿穆泽加尔听到这一消息时，他下令立即进行调查。反对派则指控警察和萨瓦克暴徒。

八月二十二日，星期二，数千名群众在阿巴丹公墓新坟前痛哭。群众涌上街头，高呼“处死挑衅者！”调查没有进展，谣言迭起。这个石油城的消防队的设备，是伊朗全国第一流的，为什么迟迟不来？有人说，警察直到起火半小时之后才发警报；有人说，电影院的太平门上了锁；有人说，特务阻挡志愿人员搭救陷于绝境的群众，等等。

报纸一开始发表大量文章，指责这次事件是极端主义分

子干的之后，神秘地沉默起来。政府也保持沉默。事件发生两周之后，据宣布，伊拉克当局在边境地区逮捕了其中一名罪犯。这名犯人交给了伊朗警方，并受到讯问。但是接着又无声无息了。这一事件迄今仍然是一个谜。没有人知道，可能永远不会有人知道到底是谁放的火。如果事情如此，那么，进行挑衅之说看来是最可信的。

国王匆匆回到伊朗之后，第一次表露出不安的迹象。他在对国外报纸记者发表的谈话中，重申坚持自由化，向反对派作出姿态，发表措辞强硬的警告，并许诺进行自由选举。

八月二十三日，星期三，德黑兰菜市场被“恐怖分子”放火焚毁。报纸发表社论呼吁实现和解。自由反对派不理睬当局伸出的和解之手。民族阵线主席卡里姆·桑贾比举行记者招待会，谴责“政府的恐怖政策及其空空洞洞的诺言”。

霍梅尼，一颗仍在跃升的明星，呼吁士兵和警察不要盲目服从：“不要服从要你杀戮无辜的命令。”他在炽烈的气氛中作出举行起义推翻国王的号召，比其他阿亚图拉不那么充满火药味的呼吁，产生了更大的反响。这位在纳杰夫的流亡者，还首次谈到要建立一个伊斯兰共和国。

八月底，渴望摆脱国王统治的怒火，在各地群众中——在毛拉中、在市场的商人和一些中产阶级成员中间，以及在大学和亲苏或不亲苏的马克思主义者组织中间——猛烈燃烧。但是，因为他们追求的目的各异，他们缺少一个核心。霍梅尼和他唤起的伊斯兰狂热，提供了这个核心。他本人成了叛乱的粘合剂。

如何来解释这种事态发展呢？如果不考虑自十六世纪以来就是伊朗官方宗教的什叶派对人们——甚至包括受西方方式教育出来的伊朗人的影响——就无法解释。有这么一个故事：在一九七八年九月德黑兰发生游行示威时，民族阵线领导人桑贾比说：“我不再是自我，而是其他人中间的我，是其他人中间的一个穆斯林。”^①一九五八年哀悼节^②，我在德黑兰市场拍摄纪念伊玛姆·侯赛因殉难的队伍的镜头时，也感到了这种半神秘的狂热性。当时我为感情所驱使，把照相机扔给了一位外国朋友，加入这个洪流，同群众一起陷入哀痛之中。我不打算介绍什叶派——百分之九十五的同胞信仰的宗教——但是，我确信有必要指出什叶派的某些特点，这个教派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为什么在伊朗发生导致国王无情垮台的事件。

什叶派和逊尼派都承认穆罕默德是“先知的征兆”，即最后一个先知。但什叶派认为，“先知轮回”的最后要点，同“伊玛姆轮回”最初要点是相吻合的。伊玛姆被看作是“上帝使者秘密”的管理人。十二个伊玛姆是这样的人，即他们用先知宣布的天启，在奥秘的精神方面，指导他们的追随者。第一个阿里，先知女儿法蒂玛的丈夫，公元六六一年被刺死。他的两个儿子哈桑和侯赛因亦被谋杀。圣伊玛姆时期可以追溯到公元九四〇年“大隐遁”时期，第十二个伊玛

^①引自克莱尔·布里埃和皮埃尔·布朗歇著《以上帝名义进行的革命》（1979年巴黎雪尔出版社）。——作者

^②回历正月初十，伊玛姆·侯赛因殉难日。——译者

姆穆罕默德·埃尔·盖姆，在这个时期终于出现。这就开始了隐遁伊玛姆的秘密历史，使什叶派成了伊斯兰教的神秘分支。什叶派是这样一些人，即他们接受伊玛姆的秘密性，并保存了古兰经的隐遁意义。恰恰由于它在伊朗发展起来的秘密状态和神秘主义，使它具有强大的吸引力。什叶派生存下来了，经历了沙法维王朝，遭受了各种迫害，由于信徒们的坚定信念，他们是真正伊斯兰教的见证人。现在说来对他们至关紧要的是，保卫精神圣地，反对世间事物的一切邪恶。

伊朗的历史和什叶派的传统缠结在一起，而且在以后的许多世纪里从来没有停止过发展。八万左右清真寺和十八万名毛拉，构成一个组织良好的基层结构，一旦需要反对被领路人阿亚图拉认为是进行迫害的根源的东西时，就有能力动员群众。整个一九七八年，在信徒眼里，国王变得越来越腐败和残忍。这说明，伊朗革命运动损害了宗教控制的局面。此外，象马什哈德大学社会学教授阿里·沙里亚迪这样的人的教导，也赋予了什叶派以现代社会的内容，这样，读者就会明白为什么绝大多数学生聚集在霍梅尼格言之下了。阿里·沙里亚迪在流亡中死于伦敦。信徒们立即指控萨瓦克，把他尊为烈士。对于任何熟悉伊玛姆·侯赛因的殉难在伊朗传统中所起关键作用的人来说，沙里亚迪的影响也就变得清楚了。同样的因素也可说明这些纪念死难者的示威游行队伍所起的决定性作用。他们从一个四十天的时期进入到下一个时期，就是从最初的抗议运动过渡到真正的革命。

国王面对现实

由于持续的混乱，并随着标志斋月禁食期结束的开斋节的来临，国王觉察到阿穆泽加尔不是能够左右时局的人。一月份以来，他既没能激励复兴党采取必要的行动，也没能压下宗教煽动浪潮。相反，他不仅在反对派中，而且在政权的支持者内，引起相当大的怨恨。这种情况说明不需要一个技术专家，而是需要一个有经验的、知道如何来安抚毛拉的政治家。国王遵循一条诸事同美国大使商谈的习惯方针，这位大使显然提到了我的哥哥。这个意见被拒绝了。从那时候起，他在同他自己家庭（由于反对腐败的斗争而受到损害）成员和同阿德希尔·扎赫迪有关系的人士的怂恿之下，决定抛弃阿米尔·阿巴斯。这位美国大使后来同一位我们共同的朋友交谈，这位朋友又把大使的话转达给了我们：“国王妒忌胡韦达。然而，他却是伊朗屈指可数的几个政治智囊中的一个。”

即使如此，国王仍命令阿穆泽加尔辞职，并指示参议院议长贾法尔·谢里夫—埃马米组阁。同时，为了给人造成一个改弦更张的印象，他解除了大部分前同僚的职务，我哥哥是其中之一。那一天，一位路过纽约的朋友告诉我：“我认为，这是国王的末日。”他看出我的惊讶，提醒我想起：法蒂玛公主在一九七三年举行的晚宴上，国王转向阿米尔·阿巴斯，当众宣布：“我想，我们将一起退休，你和我一

起！”

事实上，这次行动是他在位最后几个月中，一连串的失算中的一次。对此，我的意思并不是说，他已经忘记了他的预言！因为，他不仅在自己周围制造了一个真空，也在谢里夫—埃马米周围制造了真空。谢里夫—埃马米虽然出身于一个产生过一些重要宗教人物的家庭，他还负责过巴列维基金会，但舆论认为，这个基金会是王宫谋取非法暴利的一个中心。在大多数阶层中，他被认为是腐败的。

甚至他在宣布内阁班子之前，就耀武扬威地宣布关闭伊朗的赌场（伊斯兰教禁止赌博），重新使用回历——先知穆罕默德从麦加逃到麦地那的那一年算起^①——并废除在国王孪生姊妹的要求下成立的妇女部。他不允许报纸刊登霍梅尼的照片。由此表明，他同国王一样，对这场危机的根深蒂固的原因一无所知。事实上，这些装潢门面的措施也欺骗不了任何人。霍梅尼已在要求国王滚蛋，建立一个伊斯兰共和国。伊朗的温和派教士则呼吁严格实施一九〇六年宪法。在这部宪法中，令人瞩目的条款是，他们中五个人有权否决违反伊斯兰教教义的法律。至于知识分子，以及突然出现的十八个左右的党派，他们则要求完全自由。

在德黑兰，有些人眼睛望着美国。可是美国直到那时为

^①回历，即公元622年为起点的纪年。1976年，伊朗国王把伊朗历法的纪年改从公元前558年古代波斯帝国开国君主居鲁士登基之年算起，被称为帝历，1976年纪年为2535年。1978年8月，伊朗政府已废除帝历，重新采用伊斯兰教历法回历。——译者

止一直保持沉默。中央情报局策动了扎赫迪将军推翻摩萨台的政变，它会再次进行干预来支持国王吗？当扎赫迪将军的儿子、伊朗驻美国大使阿德希尔突然积极在政治舞台上出现的时候，谣言传得更加神乎其神。他吹嘘自己是政府更迭中的工具，并且对任何愿意听的人讲，他已经挑选了几名新大臣，其中包括外交大臣阿米尔·霍斯鲁·阿夫沙尔。

在自由反对派不参加的情况之下——他们仍然拒绝同国王发生任何联系——国王召集了“老班底”的代表进行磋商。他们是一九六三年从台上撤换掉的，包括阿里·阿米尼、阿卜杜拉·恩蒂扎姆以及其他的人。这样，他几乎完全断绝了自己同与他一起工作十五年之久的人的联系。为了确保取得西方的支持，他加强了同美国和英国大使的联系，而且还接受军队头目们的频繁来访。

根据我在那时收到的秘密情报，国王正处在两股相反潮流中。一边是以谢里夫—埃马米和“老班底”的人马为代表，主张同教士和解和作出让步；另一边是军方强硬派，主张实施武力政策。显而易见，他不准备听取“自由派”（民族阵线、知识分子和其他人）的意见。这些人要求国王逊位，恢复宪法。在以后的几个月中，他一直在这两极中间犹豫彷徨。在日复一日发生的事件的压力下，他慢慢地失去了自信。他脸色憔悴，眼神呆滞，声音发抖。美国财政部长迈克尔·布卢门撒尔访问伊朗回来后说（据一位朋友转告给我）：“他玩不转了。”正如事情很快证明的，任用谢里夫—埃马米是一个严重错误。

国王面对正在恶化的危机，表现优柔寡断。我们对此如何解释呢？实际情况是，由于他让首相作出让步过快，由于几个月来国内动乱削弱了他的地位，由于断绝了同他熟悉的顾问们的联系，他感到需要一个坚实的靠山，因而到他的西方朋友中去寻找了。一个在宫廷中的熟人后来对我说，国王经常抱怨“美国人”不让他用自己的方式、自由地解决这场危机。所以国王在需要立即动外科手术的地方，使用了急救。这样，他不仅没有满足反对派的期望，也使他自己的军队感到不高兴。军队中也出现了不一致。

在那个连续发生事件的阶段，在他面前只摆着一条路，那就是蒙受耻辱和自我批评。只有通过公开承认错误，解释自己的动机，从人民中间挑选大臣，以及摆脱谄媚拍马者、盗窃分子和蠢蛋，他才能混得下去。由于他性情冷峻、高傲，他不可能走这条路。然而，可能也罢，不可能也罢，谢里夫—埃马米出现在舞台上，不仅远没有降温，反而使温度升高到了沸点。

暴力行动再起

九月四日星期一，开斋节结束了一月之久的斋月，这就给德黑兰人民提供了举行游行示威的机会。巨大的人群先聚集在盖塔雷区——一大片荒地——进行祷告之后，象潮水般地涌上街头，高呼反对国王的口号。自由反对派加入了穆斯林信徒的行列，用宗教的形式表达人民的意志。他们接着举

行游行，第一次喊出了“霍梅尼万岁”的口号。当人流遇到满载武装士兵的卡车的阻挡时，游行者向士兵投掷鲜花，喊道：“兄弟们，不要开枪。”有的士兵感动得流泪，队伍就让通过了。

九月七日，德黑兰人民不顾要小心的警告再次上街。他们高呼的口号变得越来越尖锐：“处死国王！”“霍梅尼万岁！”“我们的宗教是伊斯兰，我们的国王是霍梅尼！”“国王恬不知耻，滚蛋！”“统治五十年，卖国五十年！”“国王，我们要杀死你！”“士兵们，我们的兄弟，加入我们的队伍。”巨大的游行队伍蜿蜒前进，避免了流血对抗，这简直是一个奇迹。

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里（七月和八月），霍梅尼就掌握了群众，这已是既成事实。纳杰夫的流亡者比伊朗国内的阿亚图拉还强。他成了这场九个月之前开始的运动的唯一的和无可争辩的领袖。

军方对事态的转折感到震惊。“我们必须实施军事管制。”他们坚持向国王要求说，“今天群众能够控制议会、电台和电视台。”国王犹豫再三，同美国和英国大使磋商后，终于同意了军方的意见。他感到他的自由化政策正在崩溃。可是这不是军方担心的问题。他们早在私下里批评自由化政策了。直到今天，他们中有一些人还把伊朗政权的垮台，归咎于自由化政策和卡特坚持人权。

九月八日星期五凌晨，电台广播一项关于前一天游行示威的政府公报。公报宣称：

这次违背对宗教领袖们的忠告而组织起来的示威，目的是反对国家和反对宪法，只是出于对不要发生不必要的流血事件的关切才予以容忍……鉴于这个由外部势力策划和资助的阴谋正在扩大并危及个人权利、自由和国家的独立，其矛头是为了阻止伊朗的前进，本政府有责任正当地执行宪法，特此发布军事管制法，为期半年。

前伊朗卫队司令、鹰派的阿里·奥韦西将军成了军事管制长官。

德黑兰许多人那天早晨没有听到电台的广播。（甚至连警察局副局长贾法里将军也承认，他没有得到要实施这个新措施的通知。）因此，群众还是按照前一天的约定，前往贾莱广场，当祷告者从法蒂玛清真寺出来时，警察和军队就向高呼口号的祷告者开枪。冲锋枪向示威群众——大部分是年轻人——扫射。人们议论说这是一次蓄意屠杀。政府方面说五十八人死亡，而反对派则说有五百人。首都的各处全天都可听到零星的枪声。

德黑兰的“黑色星期五”，标志着一个不可改变的转折点。到处流传着离奇的谣言。其中一个谣言说，三架满载以色列突击队的飞机前一天到达德黑兰，执行伊朗士兵拒绝接受的肮脏任务。

反对派阶层中间情绪激烈。他们感到，美国是决不会给国王开绿灯的。许多反对派转入了地下。其他许多人，包括宗教领袖，纷纷被逮捕。民族阵线副主席沙普尔·巴赫蒂亚

尔（他后来同意任国王的最后一任首相），对法国《世界报》记者说：“同政权妥协的可能性已不再存在。”

次日，霍梅尼呼吁对“罪恶的国王进行抵抗”，并要求军队造反。而国王呢？他对美国《时代》杂志记者说，如果不是因为实施军事管制，反对派说不定已经控制这个国家了。最后，深孚众望的阿亚图拉沙里亚特—马达里宣布举国居丧，保持平静和尊严。

九月十日，星期日，谢里夫—埃马米在坦克保护之下，把他的政府成员介绍给议会。他表示将继续自由化进程。他还表示打算为自由选举创造平静的气氛，并消除腐败。

在此期间，罹难者家属在贝赫奇泰·扎赫拉（扎赫拉天堂）公墓，偷偷地埋葬了死者。

同一天，国王举行游园会，招待来访的一百二十位银行家，他们代表国际高级金融界参加伊朗国家银行成立五十周年庆祝活动。同时，谢里夫—埃马米则要求王室的亲王和公主们关闭他们办的商行。

也是这一天，在华盛顿，惊慌失措的扎赫迪——他想扭转乾坤——打电话给在戴维营的卡特总统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布热津斯基，恳求他向卡特总统做工作。卡特在同埃及总统萨达特和以色列总理贝京举行的会议中间，抽空给国王打电话，向国王保证他的支持。这个电话，象总统以后九个月里发表的声明一样，远没有起到帮助国王的作用，反而引起人们对国王更大的愤怒和蔑视。

关于当时局势，六十年代的前首相阿里·阿米尼——正

试图在政治上东山再起——后来对法国《世界报》的特派记者说：“我始终支持这个政权，我想在国王陛下和反对派之间搭桥……的确，国王并没有使我的任务变得更容易一些……一旦他同意辞职——仅此而已——我将组成一个民族团结政府，进行自由选举。”在九月和九月以后，人们对“阿米尼解决办法”议论纷纷。但是，我看不出他如何能够越过霍梅尼设置的障碍和来自左派的反对。他被看作是美国人口袋里的玩偶，根本不能抵销方兴未艾的反美情绪。①

不过，在以后的几天中，政府开展了它允诺实行的反腐败运动。谢里夫—埃马米在这场运动中，没有去处理可能对舆论产生好影响的国王周围的“大人物”，而是满足于抓出几只替罪羊了事。例如，他逮捕了一名前卫生大臣。高层人物立即得到信息，偷偷地逃之夭夭，把还没有来得及运往国外的一切东西都随身带走。国王继续没完没了地向外国记者发表谈话，这些谈话恰恰为反对派提供了炮弹。（我一直不明白，为什么在原油价格上涨四倍之后，国王突然染上那么热衷于夸夸其谈的癖好。每一个采访过他的人都说，他是他自己最糟糕的敌人，这不仅是因为他讲话的内容，也是因为他出现在电视上时那一副严峻可怕的面容。）他继续责怪

①一九七七年十一月国王访美前夕，《新闻周刊》的阿诺·德博什格拉夫问道：“两周之前，你的政府发表的一条新闻报道声称，肯尼迪总统一九六一年使用三千五百万美元作为美援，压你任命阿里·阿米尼博士为首相。这则报道是否正确？”国王回答道：“这是过去的历史了，但正确无误。”——作者

“共产党人”和“无政府主义者”给他制造困难。

谢里夫—埃马米想象他还是处在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又着手实行许诺和让步的战略，以减轻压力。他的大棒加胡萝卜的政策，意在分裂反对派，例如，他释放了在“黑色星期五”抓起来的温和分子，而把好斗分子关进监狱。很清楚，他没有意识到这场动乱的范围和性质。当他被事态弄得束手无策时，他就赤裸裸地使用权力。

局势愈演愈烈。在霍拉桑发生灾难性的地震之后，事情一度看起来可能会平静下来一点。但是，情况的发展并非如此。当我们在办公室收听德黑兰电台广播时，电台的新闻简报仍象往常那样开始：“今天，王后陛下让法里德·迪巴（她的母亲），负责协调救援行动……”我的一位同事耸耸肩膀说：“又是重弹老调。他们从不吸取教训。他们也从不会有所变化。”事实上，应该承认，电台的新闻简报总是使听众生气。他们一成不变地以详细报道王室的活动作为开始，即使从电传机上源源不断地传来重要新闻，也依然如故。

罢 工

由于罢工被禁止，又有军队监视，反对政权的斗争采取了新的形式。在举哀的日子里，市场上的商人和小店主关门停业。工人的反应是开始运用罢工的武器，而这真正使国王感到不安，因为国王曾相信他们的忠诚。（就是这些工人，

在一九七六年一月，当他们在为国王工作的企业中取得股份时，曾表示他们对国王的“永远的感激”之情。）

罢工开始时纯粹是经济性的。政府同公用部门的罢工者举行谈判，答应增加工资，其中有些增加百分之四十。官方鼓励私营工业的头头们也照之办理。

在此期间，伊拉克响应伊朗政府的交涉，在霍梅尼号召造反之后，对这个阿亚图拉采取了限制性措施。鉴于流亡的霍梅尼是一个政治难民这一事实，伊拉克禁止他同来自伊朗的访问者进行任何接触。这些孤立措施遭致抗议。伊朗反对派号召十月一日星期日举行总罢工。德黑兰和各省的主要城市都参加了。伊朗外交大臣正在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他同他的伊拉克同僚进行谈判，设法使霍梅尼被驱逐出境。

政府作出一个和解的姿态，宣布所有在国外的伊朗人都可以回国，唯一的条件是他们“尊重宪法”。这等于是对敌视政权的学生们的一次大赦。

复兴党由于被党员所抛弃，政府也不再继续资助，决定自行解散。复兴党的寿终正寝具有象征的性质，也表明了国王政策的破产。国王所怀抱的“伟大的文明”和“人民团结在国王周围”的理想，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纳杰夫的阿亚图拉离开了伊拉克，在科威特边境折回，前往巴黎。十月三日，他到达巴黎。

尽管如此，罢工并没有结束，而且很快扩大到一些公共机构，包括大学和医院。十月九日，在几个城市中，警察同支持罢工者的示威学生发生冲突。罢工逐渐呈现政治色彩：

开始，工人要求释放他们被捕的同志，继而要求释放所有的政治犯。

国王为了缩小骚乱的规模，十月十六日宣布部分赦免政治犯。但是，这犹如杯水车薪。士兵和示威者的冲突在全国范围内继续发生，规模时大时小。

在德黑兰，数千居民聚集在贝赫奇泰·扎赫拉公墓，纪念“黑色星期五”的罹难者。仪式很快转成政治性的，人们喊出了反对国王的口号。由于什叶派宗教悼念活动的重要性，这座位于德黑兰以南的大公墓，很快变成了一个定期开会的会场。

十月二十二日，星期天，哈马丹爆发了大规模示威。群众占据大街达十个小时之久。警察驱散不了他们时，军队采取了行动。他们向群众开枪，死伤众多。二十三日，星期一，乱子蔓延到马什哈德和库姆。克尔曼附近的一座清真寺被身分不明的人焚毁。谣言指责萨瓦克分子。

与此同时，谢里夫—埃马米赐予新闻工作者的自由，惹恼了军事当局。军方为了防止报纸传递霍梅尼的信息，企图实施新闻检查制度。因此，新闻工作者也举行了罢工。经过三天谈判，他们取得了首相的让步。罢工继续蔓延开来，零星的骚乱遍及全国。

反对谢里夫—埃马米的阴谋

统治阶级内部的众多矛盾，成员们之间为了扩大自己的

影响而不断争斗，在政府内部反映了出来。胡桑·纳哈万德组织了复兴党的第三势力，九月初又把它转变成“新社会党”。他在九月五日发表的一项宣言中宣言，伊朗人民不会容忍对君主政体、国王与人民进行的革命进一步产生怀疑：

“过去十五年间，赢得社会、政治和经济权利的农民、工人和妇女，在他们的利益付之东流之时而会听之任之，这是可以想象的吗？”这种态度表达了国王本人的想法。一九七八年四月，国王在最后一次召见我时对我说（大意）：“我已经惠赐人民一切：教育、卫生、不差的生活水平、社会和政治权利。我赐与他们的劳工法规，在许多方面超过了世界上最自由的制度。农民拥有了土地，工人得到企业百分之二十的利润，并且正在变成股东，分享百分之四十九的利润。在这种情况下，霍梅尼和桑贾比的人还能做些什么来反对我呢？”国王陶醉在宏伟壮观的“伟大的文明”的梦幻之中，他在颁布的敕令中还提出要硬通货的想法。

纳哈万德创立的“党”骗不了任何人。人民怎么能够忘记，他在进入政府之前，是王后的首席秘书呢？他们又怎能忘记，他当德黑兰大学校长时所起的镇压作用呢？在内阁中，一些大臣支持他，其他大臣恨他。各方矛盾破坏了政府的团结，而军方对谢里夫—埃马米继续作出让步皱眉蹙额。

对后者的批评影响了国王。强硬派劝国王组成由军事管制长官奥韦西为首政府。“老班底”则举荐阿里·阿米尼。阿米尼对愿意听他讲话的人不厌其烦地说：“如果国王

满足于君主统治，让我组成政府，我能拯救国王。”复兴党的流亡者主张，为了继续进行自由化，封住反对派的嘴，应建立一个由军方人士和文职官员组成的政府。

在这个关键时刻，阿德希尔·扎赫迪于九月十二日星期二到达德黑兰。据说他携带一封重要信件。有的说，他是前来劝国王放弃对阿米尼的反感。有的则把他看成是首相的可能人选。两种看法都错了。国王决心自己找出办法，解决这场危机。无论如何，他知道他的前女婿（他在私下里称阿德希尔是一个“笨蛋”）能力有限。事实上，扎赫迪携带一封书信，我通过美国的熟人获悉了其中的内容：美国以前曾反对使用武力，现在决定让国王“完全自由地”解决他的困难。国王的随从们希望，这种全权委托，会结束他的优柔寡断的精神状态。

关于谢里夫—埃马米，他在这些阴谋活动中间也没有闲着。“我是议会选出来的，”他重复说，“只有议会才能撤销对我的信任。”总之，他不打算辞职。

但是，整个十月份局势越来越恶化。二十六日，国王生日，尽管释放了一千名政治犯，继续实施宵禁，学生们仍在大学区举行反对国王、支持霍梅尼的示威。

反腐败的半心半意措施无济于事。公众认为逮捕几个前大臣仅是算一些老账。这些人事实上曾企图拆首相的台，当时谢里夫—埃马米是参议院议长。总之，就人民看来，腐败的根源产生于宫廷本身。事实是，尽管王室成员一个接着一个逃奔国外，也不能减少任何怀疑。

我哥哥告诉我，国王决定让他的家庭成员去流亡，以卡断对他的事务的干涉。“那么，为什么他不公开宣布呢？”我问道。国王由于没有公开宣布他的理由，所以他针对王子和公主们所采取的行动的效果适得其反。舆论认为这些人是仓皇出逃，指控王室把他们从国家“盗窃”的财富转移到国外。国王对他家庭实施的自吹自擂的“行为准则”，完全是对牛弹琴。

就在那时，我的一位美国熟人提醒我，扎赫迪阴谋反对我的哥哥。当我同一位伊朗朋友商量此事时，他证实了这个情报。扎赫迪企图说服国王和军方逮捕一批人——我哥哥亦在其中——作为打狗的肉包子，以平息民愤。这位驻华盛顿大使说，根据宪法条款，国王不承担责任。抛出前大臣作为替罪羊，他就可以保全王位。这种幼稚的论点，只能产生于被妒忌蒙住了眼睛的俗不可耐的人。扎赫迪常常当着我的面说，他从不看书。他对我哥哥的妒忌可以追溯到一九七一年，那时他与我哥哥吵了一架。我哥哥向国王提出辞去首相职务，而国王当时决定让扎赫迪离开内阁。

人民沉浸在革命的乐观情绪之中，对这些伎俩没有引起注意。他们对政府作出的任何让步都不信任，他们认为依靠自己的斗争赢得了胜利。

十月底的政治气候

德黑兰“黑色星期五”以后，反对派变得更加咄咄逼人

了。象沙里亚特—马达里这样的阿亚图拉，象桑贾比这样的世俗分子，一个月之前，如果实行君主立宪制就满足了，国王退位或者不退位都行，而现在已卷入革命行列之中。国王和他的首相双手沾满鲜血，使妥协成为不可能。他们的自由化措施无人相信。反腐败运动看来是虚伪的，因为所有大人物都已远走高飞。从逮捕的人数上可以断定，仍在进行肆无忌惮的镇压。反对派的许多成员转入地下。桑贾比后来对一位记者谈话时总结了这一时期的局势：“在一九七八年初，攻击国王需要很大的勇气；而今，保卫国王需要很大的勇气。”

尽管如此，反对派许多成员仍感到提心吊胆。他们私下里承认，国王的下台只是个时间问题了。日益增长的暴力活动使他们感到烦恼，他们觉得，如果美国不同意，军队就不可能对示威者进行干预，所以，超级大国的作用不能忽视。到现在为止，苏联在隔岸观火。一般认为，它不打算利用这种局势，只是满足于对事态发展保持警惕。但是，如果在没有政治经验的教士们领导下，在它的边境上建立了一个伊斯兰共和国，它是否仍会保持这种态度呢？而美国会作何动作呢？是否会象一九五三年那样，企图煽动一次政变呢？反对派的许多成员认为，他们革命的成功也伴随着危险。一部分什叶派成员敦促采取温和的行动。因此，阿亚图拉沙里亚特—马达里宣布，“我们的行动必须在宪法允许的范围内进行……”

但是局势完全处于霍梅尼的影响之下。经过八个月之久

的动乱，霍梅尼已牢固取得控制权。这位诺夫勒勒夏托的老人，现在就是要求他的不共戴天的敌人下台。他的决心和他对群众的控制日益增强。在德黑兰，国王对来自各个方面大声疾呼的要求迎接不暇，对自己迟迟才认识现实感到沮丧，对农民和工人的“忘恩负义”感到震惊，因此变得更加冷漠和捉摸不定。霍梅尼之星正在伊朗天空冉冉上升，而国王之星正在迅速暗淡下去。

当时，一些古怪的谣言在伊朗流传。说什么某些同美国中央情报局和以色列间谍机关有联系的西方分子，决定收回他们对国王的支持。可是，这些人为什么要反对看起来肯定仍属西方利益的东西呢？人们的猜测是，他们感到国王已经完蛋。在伊朗实行真正的民主，会导致马克思主义的接管，而一个建立在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基础上的政府，将成为反对共产主义扩张主义的一个坚固的屏障。没有人能够为这些谣言提供根据。这些谣言流传甚广，起了鼓舞反对派力量的作用。它们也说明了——至少在一定程度上——为什么华盛顿继续表示公开支持国王。

伊朗许多阔佬意识到末日将近，纷纷把他们的财产存到瑞士银行，移居国外静观事态发展。当时在德黑兰流传着一个故事：一天，王后对没有举行代表国王的反示威向一个廷臣表示惊讶：“一九六八年在法国，戴高乐的支持者在爱丽舍田园大街组织一次盛大游行。为什么我们的人民不出来？”这位廷臣回答道：“可是，王后陛下，他们都欣然参加游行——沿着爱丽舍田园大街！”

十月底的一天，脸色阴郁的艾哈迈德·米尔-芬德雷斯（他后来成为短命的巴赫蒂亚尔内阁的一位大臣），走进我的办公室。“你看了采访霍梅尼的报道没有？”他问道。

“没有。他说什么？”

“嗯，他的调子完全变了。在此之前，他的讲话更多的是玄学——他故意说得含含糊糊。现在，他有了一个活生生的政府纲领。这个政权末日到了。”

同一天，我的美国熟人告诉我，扎赫迪已最终说服国王和军方头目逮捕我的哥哥。我和阿米尔·阿巴斯接通了电话，我劝他离开伊朗。“决不离开，”他语气坚决地对我说，“我不是一个胆小鬼。”

现在回想十月底时的情景，我意识到木已成舟，大势已去。

第二章 日益增长的危险

我不会犯你们同样的错误

——国王一九七六年三月七日对法国《世界报》记者
雅克琳·格拉潘的谈话

逐步增大的危机

一九七八年事件的突然发生和扩大，震惊了全世界。怎么事情这么糟糕了还没引起任何人的怀疑呢？

事实上，危机迹象的露头已有一段时间了，但是没有人予以注意。正如在埃德加·阿伦·波^①的一篇著名小说中描绘的那样，一封信放在完全显眼的地方，可是寻找者却翻开地毯，察看墙壁，寻找秘密隐藏处。

从一九六〇年以来，左派与右派，工人与文职人员，市上的商人与现代资本家，农民与城镇居民以及教士与俗人之间，存在着可能结成联盟的清晰前景。

^①埃德加·阿伦·波（一八〇九——一八四九），美国著名诗人兼小说家。——译者

但是，由于秘密警察的残酷镇压而造成的广泛的恐惧气氛，伊朗保持了一种表面上的平静，在动乱中的中东，伊朗外表上是一个稳定的天堂。

一九六三年，国王提出一个革命改革计划，唤起了人民一时的希望。伊朗看起来沿着合理的方向前进，以致于许多知识分子和技术专家，纷纷参加了国王的现代化运动。我的一群朋友认为，真正的经济发展，必定会带来民主。因此，要做的事情是支持国王的改革，并且为经济发展和政治自由化提供动力。我们想，国王终于认识到，伊朗不可能单靠发号施令而发生变化。在我们看来，他似乎已决心在一个维持公共秩序就意味着窒息人民愿望的领域里，引进法制。由于讨厌继续存在的封建主义，我的朋友们认为，土地改革势在必行。如果这场土地改革由国王来进行，而不是一个革命政府来进行，这又有什么关系呢？

为了使人们理解我们的态度，回顾一下六十年代之前的局势是值得的。民族阵线主席桑贾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发表的博士论文中写道：

现代的土地政权以及地主同农民之间的关系——一种中世纪封建主义的遗产——要求改革，甚至完全重新组织起来……波斯的地主，并不被他的农民视为一个商人，靠契约同他们联系在一起；恰恰相反，而是视为首领、主人和老爷……村民们要侍候老爷和他的家庭……波斯的地主认为，村庄坐落在他的庄园里，是他自己的财产，而农民则是……他的臣民。地主还依靠土地所

有制的合法权利，对这个村庄行使主权和组织权……地主是农民与公共当局的中间人，并完全取代了公共当局。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最后几个月，我结束了我的学业回到伊朗。我有机会看到这个国家的糟糕情况和农民的悲惨境遇。

一九四四年十二月的伊朗

我决不会忘记久违十五年之后重新回到故乡的情景。在霍拉姆沙赫尔的边境哨所，一个满脸皱纹、病恹恹的海关官员，嘴上叼着一节烟屁股，不停地在我的箱子里翻来翻去。他看我不耐烦了，便说道：“这就好，这就好，先生——我得照章办事。”一个衣衫褴褛的挑夫在我耳边轻轻地说：“你得给他钱。”我所有的一切就是到德黑兰的盘川。最后，这位官员拿走半公斤桔子才算满意。桔子是我过河之前从伊拉克的巴士拉买的。

一辆木框的走起来格格乱响的破汽车，在坑坑洼洼的路上颠簸前进，把我拉到阿瓦士火车站。售票处窗口贴着关于好几天都已“满员”的通知。外面下着雨，美国陆军的推土机正在平整路面。我惆怅地往前走，衣服上溅上了泥巴。由于旅途劳累，加上对自己的处境感到绝望，我几乎要哭起来。美国驾驶员从推土机上爬下来，帮我弄干净衣服。我告诉他自己的遭遇。他把我带到负责这个军车队的一位中尉那

里。中尉给我弄了一张横穿伊朗的通行证。

当晚我睡在美国士兵们中间。他们身上可以闻到啤酒和烟草味。我酣然入睡。黎明时，火车到达安迪米什克站。这是一个山区小站。数百名大人和孩子看着我们。他们光着脚，衣不遮体，冻得嗦嗦发抖。在露天的站台的一头，美军供应处正在供应纸包的三明治、水果和咖啡。士兵们当场吃着早点。开车之前，把吃剩下来的东西掷进站台上每隔不远一个的圆筒里。穿着补丁落补丁衣服的伊朗人立即向垃圾箱冲去，寻找丢弃的面包屑、桔皮和香蕉皮，然后狼吞虎咽地吃个精光。

贫困和疾病遍及伊朗。我同表兄弟们呆在一起，每个小房间睡四个人。大街上，乞丐十个或十几个结成一帮，紧跟着我们的脚步。盟国俱乐部门上常常贴着“伊朗人与狗不得入内”的通告。

一九四五年春，朋友们把我带到他们在萨里附近的马赞达兰的庄园，庆祝伊朗新年。农民们挤在他们的小茅棚里，一天两餐，吃的是面包屑和酸乳酪，因为地主把几乎所有的大米都囤积了起来。管家严格地监视工人，如果他们试图躲避法定的劳动任务，就要受到惩罚。

在首都，议会——尽管伊朗实行了“自由”选举——仍然掌握在大地主和上层资产阶级的手中。局势看起来令人绝望。我的大多数朋友在回国小住一段时间之后，随着战争的结束和交通的恢复，又再次前往西方。

伊朗处在痛苦的萧条之中，而且似乎看不到尽头。就在

这种情况之下，国王宣布进行改革，并举行公民投票，这在一些人的眼里产生了一线希望。因此，无视一九六五年之后所取得的惊人成就，仅根据巴列维统治的最后两年来判断这个政权，是不公正的。事实上，在一九七二年之前，伊朗取得了重大进步。

荣誉的一面

一九六三年骚乱一平息下去，事情似乎就出现了起色。尽管独裁主义的阴魂不散，在经济和社会方面的确还是取得了成就。

在国内，土地改革对封建地主和贵族产生了政治影响，多少世纪来破天荒第一次使他们处于崩溃边缘。

解除萨瓦克鼻祖沙普尔·巴赫蒂亚尔的侄子、虐待狂特伊穆尔·巴赫蒂亚尔将军的职务，由一个较富有人道主义的斗士哈桑·帕克拉万取代，澄清了一点儿气氛。在哈桑·阿里·曼苏尔的带领下，政府班子中充实一批年轻人，接管职业政治家手中的权力，这为正在崛起的一代开辟了新的前景。

在外交政策方面，国王宁愿同西方保持距离，并向北方的强邻稍微靠近一点，同莫斯科缔结了商业和文化协定。他称之为的“民族独立政策”开始形成。他向自己保证，不允许在伊朗土地上建立任何外国军事基地。

苏联领导人和伊朗国王在谈话中，都把两国之间的睦邻

关系说成是良好范例。我觉得国王采取这条新路线是诚心诚意的。我还清楚地记得国王在签订关于在伊斯法罕建设新的炼钢厂的俄—伊协定之后兴高采烈的情景。那是在一九六六年。他在首都中心他父亲建造的王宫中，亲切地接见了我们。

“好啦！”他兴奋地喊道。“我们刚同俄国人签订合同。西方人拒绝帮助我们兴建炼钢厂。可是炼钢厂不久就将矗立在扎因达·鲁特河畔。重工业将保证我们的独立！”

这则新闻受到人们普遍热情的欢迎。甚至从战前以来，炼钢厂就成了一种特别象征，因为当时统治伊朗的英国人反对修建炼钢厂。作家萨迪克·特舒巴克后来告诉我一个他如何走访市场和询问其中一个商人的故事：“哈吉先生，你难道不想去麦加松松你的筋骨吗？”“我当然想去，”他回答道，“不过，我正在等修建炼钢厂。炼钢厂建成了，一切都会好转。”

那就是一九六六年春天的情景。人们不再谈论一九六四年暗杀曼苏尔首相的事件。（一群宗教狂热分子当时受到指控。有些人则认为暗杀事件是外国制造的一个阴谋。）一九六五年三月企图谋害国王的事件似乎也已成为遥远的历史。纳西里将军取代帕克拉万任萨瓦克领导人，没有人认为有什么特殊意义。我哥哥被任命为首相，使政治派别活动暂告停止。国家就象一个巨大的建筑工地。增长率在百分之九和十二之间浮动。个人平均收入正在缓慢但却是肯定地增长。在一次中央条约组织会议上（中央条约组织是一个由伊朗、巴基斯坦、土耳其和英国组成的军事条约组织，美国也参加

了。)国王信心百倍地对美国国务卿迪安·腊斯克说：“你瞧，一切顺利。我的首相秉性谦逊，他的弟弟，一个左翼知识分子，决定接替他的职务，为国效劳。”

我哥哥在任职十余年之后到一九七七年被国王解除职务之时，伊朗呈现出新的面貌。百分之六十五以上的人口拥有了自己的住房（在首都的百分比则更高）。按人口平均收入为二千二百美元（一九六五年为三百美元）。小学入学人数超过一千万（一九六〇年为二十七万）。文盲从百分之八十五下降到百分之五十五。石油收入在五十年代占国民生产总值的百分之九十，而到了一九七七年，则不到百分之三十五（总数为七百亿美元）。今天掌握政权的批评者声称，工业仅限于装配工业。他们忘了，拿汽车工业为例，在一九七七年，百分之六十五的部件是伊朗制造的。农业方面，虽然还有许多有待改进之处，但也有了真正的可喜的进步，一九七八——一九七九年发生的事情可以证明。（尽管几乎全部伊朗食品进口事实上都已陷入瘫痪，可是无论是德黑兰还是其他任何城镇，食品供应从未出现短缺。值得一提的是，从一九七二到一九七七年，国内消费增长了四倍。）在交通、社会福利、卫生、教育等领域中，给人的印象是同样深刻的。如果说通货膨胀在一九七七年开始迅速发展——在一九七五年之前一直保持合理的水平，那也是伊朗石油收入增加突然刺激的结果，这是普遍同意的看法。

我觉得有必要回顾这些事实，因为要对这个政权作出公平的判决，不能无视前十五年取得的成就。事实上，在国家

发展的那个阶段，国王的基本错误并不在于加快经济发展，而在于对政治自由的疏忽。到一九七〇——一九七二年，物质条件改善需要与民主化齐头并进。这里，国王犯了严重的判断错误，放过了一些机会。早在一九七一年就出现了游击队活动，虽然规模不大，也应当引起他的警觉。

马赞达兰山区的西亚卡尔村，一九七一年四月十日

国王的秘密警察一无所知的一群游击队，突然袭击了西亚卡尔村附近的警察分局。西亚卡尔村坐落在马赞达兰山区，俯瞰里海。当局远未把这一事件放在眼里，而是强调农民们的合作最近使地主逮捕了七名“恐怖分子”。萨瓦克专家们认为，这是一个孤立事件，不象会引起什么反响。

可是，游击队改变了他们的战术，放弃了同他们的口号相左的乡村地区，而把力量集中在大城市。一九七一年秋，他们暗杀了德黑兰军事法庭检察官法尔赛将军，此后年复一年，袭击接连不断。萨瓦克再次成为无情的镇压工具，就象它一开始成立时那样。国王没有象他曾暗示过的那样，采取鼓励自由主义的做法，而是强化了他的权力，从一位开明的国王变成一个残忍的暴君。

一九六五年相对的自由主义被令人窒息的独裁主义所接替。一九七〇年底，我哥哥在国王每周例行的召见后回来对我说：“我不知道他怎么搞的。他不听任何人的意见。讨论问

题使他心烦。”

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了？是否是因为英国离开波斯湾而需要填补“真空”的前景，使国王欲火中烧？是否是因为他的朋友尼克松入主白宫而增加了他的梦想？是否是因为前女婿扎赫迪的影响而使他向右摆？是否是脑血管胀裂了？

事后确定国王转变观点的日期是可能的。这似乎可追溯到尼克松连任美国总统，以及美国外交太空新人亨利·基辛格的飞黄腾达。

德黑兰，一九七二年五月三十日，星期二：尼克松访问

尼克松总统在离开莫斯科——他在那里刚同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签订了重要的协定——前往华沙之前，绕个大弯，访问了德黑兰。这次累人的顺访似乎越发令人莫名其妙，因为他在前一年前往北京途中在德黑兰作了停留，已经同国王进行了讨论。

尼克松想一箭双雕：首先，在举行（波斯帝国）二千五百周年庆祝活动时，派副总统阿格纽代表他出席，对国王是一个侮辱，他想进行修补；其次，他想强调伊朗对美国的新的意义。因此，国王不再是一个附庸，而是一个可以平起平坐的人。

过去三年中，伊朗、美国和联合王国之间进行的三边秘密谈判，就英国在海湾留下的“真空”问题，提出了一项解决办法。国王同意巴林宣告独立。作为交换条件，伊朗占领

了保卫霍尔木兹海峡的几个有战略意义的岛屿（两个通布岛和半个阿布·穆萨岛）。尼克松发现，这个安排是对他的“主义”的一种极好的试验，根据这个“主义”，美国的朋友们应当承担他们自己防务的责任。伊朗可以向海湾的各酋长国提供美国向其他地区提供的性质相同的保护。而国王提出可以自己担负费用——这是一笔额外的红利。基辛格是同总统一起来的。他兴高采烈：他的从澳大利亚、经过中东油田到南非为轴心的“宏伟计划”，已见雏形。根据在德黑兰达成的秘密协定，国王购买武器的计划得到了充分满足。

这是美国政策的一个真正转折点，因为在此之前，一直是美国决定武器的性质和数量，并建议国王应奉行什么样的政策。在林顿·约翰逊时代，国王向苏联和英国靠拢，以表示他的烦恼。总之，他同民主党的几届总统关系从来不好。在私下里，他总是抓住机会批评罗斯福和约翰逊，特别是约翰·肯尼迪。“民主党人正在干有利于俄国人的事”，他有一次当着我的面对一位大臣说，“共产党利用他们扩大自己的帝国，这是不足为怪的。”

尼克松和基辛格不想软化国王的態度，使他安心沿着民主化的道路走下去，而是鼓励他的独裁主义。一位德黑兰会议的目击者告诉我，尼克松对国王说：“我羡慕你同学生打交道的方式……别去理我们自由派的牢骚。”

尼克松离开德黑兰时同国王拥抱，为国王作为“西方的保卫者”的新地位拍了板。

这个政权后来的大部分困难，就是从那一天开始的。这

种说法是可靠的。事实上，这种事态发展引起了这个地区每一个国家——特别是苏联——的怀疑。（设立在东欧某地的伊朗派凯电台，恢复了对伊朗的敌对广播。）就国王来说，他被新的地位所陶醉，实施一项雄心勃勃的购买武器的计划。这个计划破坏了伊朗的经济和政治平衡。他甚至忘记了他的政权的基本弱点，即建立在靠一个人发号施令的统治基础上的。在一九七八年的最后日子里，这个国家已痛感缺少任何过渡性的机构了。

同尼克松和基辛格签订的关于保卫海湾和印度洋的秘密协定，使国王偏离了他原来的方向。国王迫不及待地要立即尝尝新权力的果实，甚至还没等到果实成熟，仍在发青的时候就摘了下来。他走得太远了，成了他自己本人的死对头。他自己做的两件事，都事与愿违，并导致了他的倒台，那就是：一九七三——一九七四年石油提价和一九七七年改变国内政策。

德黑兰，尼亚瓦兰宫，一九七三年十二月：石油景气

国王在举行非常记者招待会，等着向外国记者发表演说时，兴奋地搓着双手。他刚把他国家的收入增加四倍，并强有力地进入国际舞台。民族将永久感恩戴德。摩萨台毕竟只是名义上将伊朗的黑色金子收归国有，而他——穆罕默德·礼萨·巴列维，却把巨款倾入国库。由于有了这笔数十亿的额外收入，他可以加快发展速度。在他有生之年，伊朗将成

为世界上“第五大工业和军事强国”。他将与世界上的超级人物相媲美。他，一位伟大的政治家，迫使“七姊妹”石油公司屈服，而这些石油公司一直被认为比超级大国还强大。

几天之后，他主持了一次限制性的经济委员会会议。我哥哥以及胡桑·安萨里和马吉德·马吉迪两位大臣，企图阻止国王把全部盈余一下子都用于发展经济，但没有成功。他们建议先使用百分之五十，其余的一半逐年逐步使用。国王根本不听。他下令修改刚实施一年的第五个五年计划。更有甚者，他还改变了经济发展轻重缓急的顺序，而优先发展重工业和军队。

（我哥哥告诉我，在最高经济委员会会议内外，有几次他如何压国王削减军费开支，把钱优先用于社会福利部门，停建那些纯粹为了面子好看的工程，拒绝接受宫廷内部人士炮制的合同，合理地平衡经济。但是，在那个时候，在伊朗资源突然增长的影响之下，国王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加相信资本积累和增加开支的自动效力。他吃了金钱万能这个天真想法的亏，忽视金融法则，不考虑突然急剧增加开支所产生的后果。在短短几年中，预算从二十亿美元增加到五百亿美元。通货膨胀当然是不可避免的了。）

一九七六年以后，我们亲眼看到了一个有条不紊的抢购黄金的风潮。世界所有的商人象蜜蜂围着一只蜜罐一样，麇集到德黑兰。而伊朗人则围绕着宫廷及其帮闲排成长龙，以求得到他们自己的那份点心。经纪人增多了。他们仅从介绍外国人同负责实施国王野心勃勃的计划的达官显贵认识，就能

勒索到巨款。许多欧洲籍的前宫廷人员，由于有权进入宫廷而为欧洲制造商们取得一些大宗合同。

面临空前经济困难的西方政府和商界，指责国王在石油输出国组织提高油价的决定中起了关键作用。

油价上涨一个星期之后，美国驻联合国大使约翰·斯卡利在联合国大厦走廊里抓住我问道：“为什么你们要搞这个鬼？这是难以忍受的。此事竟出自一个朋友！”一九七四年三月的一天，当我走进科特·巴斯克餐厅时，看见航运界巨头奥纳西斯坐着同五个人谈话。我无意中听到一句：“至于国王嘛，只有一个——”他发现我，突然顿住，挥手向我打了个招呼，接着又说：“此事我们以后再谈。”他是否在策划发动一次反击？

不管反击是否是奥纳西斯和他的朋友发动的，但它以一种奇怪的方式出现了。西方国家采取严厉的步骤“节约”石油。与国王的乐观预计相反，黑色金子的出口并没有增加，而与此同时，他的宏伟计划和武器采购却吞掉了石油收入的增加部分。国王拒绝修改他的需求，打算出售更多的石油，但是主顾们却不热情。五年计划不得不再次全盘修订。

可是尽管有困难，我哥哥的政府还是设法设立一笔一百二十亿美元的储备。要达到这一数目，必须加上对国际银行和一些国家的贷款。（新政权一直在利用这些贷款的偿付款项维持国家的生存。）

即使如此，尽管我哥哥一再坚持，国王还是拒绝削减军事开支而指令社会福利部门实行节约。他并没有抛弃幻想。

一九七五年夏，当我向他谈到伊朗需要留在第三世界国家行列中时，他打断我的话，粗暴地说：“我们不再是一个不发达国家了！”他已经在考虑进一步提高石油价格，以弥补由于出口下降而减少的收入。

但是，一九七六年底出现的财政困难迫使他改变了调子。在此之前，他一直喜欢的口号是“富起来！”一九七六年十月，在一次他自己仓促安排的同《世界报》记者的谈话中，他广义地解释道，为了不“辜负”他们新的地位，人民必须尽更大的努力：“（在此之前）我们并没有要求人民作出牺牲。而是我们把他们放在蜜糖罐里。事情现在要起变化了。每一个人必须更加努力工作，为了国家的利益准备作出牺牲。复兴党接受了（向人民）反复灌输这种思想的任务。”^①显然，这样的计划不可能使政权更得人心。

伊朗，璁沙尔，一九七七年八月五日

国王穿着短袖衬衫，在一间建在桩子上的用作宫廷接见室的木头小屋里，接见了哥哥。国王直截了当地告诉我哥哥，他决定以阿穆泽加尔取代他，让阿米尔·阿巴斯当宫廷大臣。他说，宫廷有许多工作要做。阿米尔·阿巴斯没有受骗，他知道，国王实际上已将他解雇。当然，宫廷部是一个得到信任的岗位，但那是另外一码事了。正在这时，王后走

^①一九七六年十月三十日伊朗《世界报》国际版。——作者

了进来，国王把他的打算告诉了她。

“胡韦达是我们的人中的一个，”他说道，“他能象我们希望的那样安排宫廷部的。”

法拉赫微笑道：“是的，假如你给他一把打扫巢穴的扫帚，把占据巢穴的全部腐化人员清除干净的话！”

阿米尔·阿巴斯感到松了口气。那一年年初的一天，他对清晨来访的一位朋友说：“每天夜里我上床睡觉的时候，总要作祷告，希望在梦中真主把我召回。我已经受够了。国王已使国家之船超载。他要我来牵引，但是我干不了，船太重了。”

从心理上来说，阿穆泽加尔同我哥哥有天壤之别。他容易激动，脾气又坏，与同事和公众关系疏冷。他不打算象阿米尔·阿巴斯那样老练地处理这些关系。阿米尔·阿巴斯总是努力处理好这些关系，以便使伊朗各派势力保持平衡。对于阿穆泽加尔，经济优先于政治。他周围是一批年轻的专家，有经验的政治家被排斥在外。

从此以后，他又犯了一系列严重错误。就这个政权的性质而论，显然不能把责任扣在阿穆泽加尔头上。事实上是国王决定改弦易辙。他觉得我哥哥对反对派太软了。阿米尔·阿巴斯通过诸如前首相的儿子戈兰·摩萨台和一个同宗教阶层有联系的人（他的名字鉴于人所共知的理由不便透露）等私交穿针引线，与反对派的许多成员都有接触。他同仅有的几个大臣一起，甚至还建议国王同反对派对话。再加上他“着了迷”似地向显贵们的腐化行为开战，惹怒了国王。国

王在改组政府之前一个月对他说：“只靠忠诚是不够的。”他认为必须采取一条更强硬的路线。阿穆泽加尔在复兴党政治局讨论关于一九七九年一月九日群众示威（我在本书第一部分已经介绍）的一次会议上发表的讲话，反映了国王的意愿。在经济领域里亦然。他的急躁情绪驱使他操之过急，例如，他要把通货膨胀降到零。

所以，阿穆泽加尔紧缩信贷，并大量削减公共开支（军备和国王的私人领域当然不在其内）。小制造商和商人，特别是市场上的店主，受到了停止发放低息贷款的严重影响。强迫减租的立法，丝毫改变不了拥有大量房地产的阔佬们的地位：他们干脆不出租，因为他们可以依靠资本过活。但是中产阶级可就捉襟见肘了。他们常常拥有两套公寓，自用一套，出租一套，所有的房租作为孩子留学国外之用。突然，他们发现自己不得不在黑市上借高利贷了。开展反对土地投机买卖的斗争非常激烈，以致这方面的所有交易都停止了。这样建筑业就遭难了。

阿穆泽加尔在无情地削减开支的运动中，悍然取消了每年一千一百万美元的宗教事业费。这是我哥哥专设的。这笔钱——被指控为首相的秘密预算——用于资助维修清真寺和古兰经学校，以及其他开支。我哥哥此举是企图补偿教士们由于土地改革而遭受的损失。土地改革涉及了传统上是他们管理的一些土地。这些拨款是为了使所有的教士受益，其中包括霍梅尼的支持者。

如果说这还不够瞧的话，阿穆泽加尔又宣布实施一项在

德黑兰减少交通拥挤的计划。这项计划包括修建一条贯穿德黑兰市场的南北高速公路。市场上立即谣言四起，说国王要毁掉商人的店铺，将他们驱散。

阿穆泽加尔政府大幅度削减开支和宣布上述计划之后，在宗教界、中产阶级以及市场商人中间，不满情绪开始蔓延。这位新首相还由于自己的傲慢举止而开罪了政权的支持者。好多次，他未得到议会批准，就根据政府的决定干了起来。有一次，议员巴尼—艾哈迈德就大不里士骚乱一事提出质询，他要司法大臣代他回答。许多议员感到这是侮辱。在他控制的复兴党内，他还同党内的三派领导人争吵，认为他们是把时间花在煽动普通党员批评政府上。

新政府就职仅短短几个月，游行示威又爆发了，并且规模越来越大。军队和警察向人群开枪，造成许多伤亡。^①

总之，没有人理解政府更迭的原因。如果国王要安抚日益壮大的政治反对派，他本应当任用一个较得人心的人物。加之，阿穆泽加尔连续十六年来在历届内阁，包括我哥哥的内阁，担任要职，因而如果说要负什么责任的话，他也有份。他发表讲话，或报上引用他的讲话，批评上届政府的做法时，他不可能产生任何信用。

国王开创的“新”政策，没有在任何领域里收效。在大约一年的时间里，经济停滞，投资暴跌，社会问题恶

^①我在这里必须指出，现在的伊斯兰法庭发表的“处死人”名单中，提到了除阿穆泽加尔和陶米尼以外的所有前首相。——作者

化。①

危机的根源

如果说，上面提到的三件事——尼克松一九七二年访问德黑兰、石油景气和在一九七七年改变政策方向，可以说明为什么危机加速的话，那么，它的主要根源是政权本身的独裁性质。国王自己作出了大部分决定，并且竭尽全力向批评者泼冷水，即使他最亲密的顾问也不例外。在这种情况下，大臣们与其惹他发怒而自讨苦吃，勿宁事无巨细都事先请示他。我在这里只想引用许多事例中的一个。卫生大臣一九七七年告诉我，出于对日益增多的野狗的担心，他向国王提交一份报告，得到允许将它们除掉。但是，他正准备发布必要的指示，国王把他叫去，对他说：“眼下暂时按兵不动。我妹妹是一个动物迷；她已听到风声，搞得我下不了台。不过她下个月要去欧洲，届时你可以动手。”国王认为，即使是鸡毛蒜皮的事，也要向他请示，这是理所当然的。

①在对阿米尔·阿巴斯的假审讯中，他向伪装的所谓法官问道：“你们是否反问过自己，为什么国王一九七七年解除我的首相职务？为什么又在一九七八年解除我的宫廷大臣职务？”如果有时间，他会做出解答，但是不给他时间。连续解职的原因在于他在一些问题上，特别是关于在上层、在国王家庭和随从中反腐败运动 and 同反对派对话等问题上，与国王的意见越来越相左。他亲自对我说，一九七八年九月初，他反对国王下令向示威者开枪。这成了他“辞去”宫廷大臣职务的原因。——作者

他的君主制度观念可以追溯到很久以前。关于这个问题，他有一次曾写道：“伊朗君主制度的特点意味着，正如克里斯滕森所说，这个国家的一个真正国王，不单是国家元首，而且同时又是人民的引路人和导师。”^①这个观念在他思想上是那么根深蒂固，以至在一次记者采访中情不自禁地脱口而出：“从根本上说，在我们国家里，国王是三权——行政、立法和司法——之首。”^②也就是说，在路易十四死后三个世纪，伊朗国王竟然宣布：“朕即国家。”

有一天，我听他对一个随从说：“我雇用当官的，我也可以把他们解雇。”在我哥哥于一九七八年被捕之后，我考虑离职之时，有机会证实了这种残酷无情的做法。一个萨瓦克分子（此人我认识，虽然不知道他为谁干事）喊住我，说道：“你话说得太多了。要小心为妙。你哥哥已经下狱。你得为家庭和孩子着想。”

政府里的政府

伊朗在国王的领导下，政府不是单一的，在国王庇护下，存在着几个势力中心，大臣们同国王直接接触。

因而，截至一九七七年八月一直担任宫廷大臣的埃米尔·阿萨杜拉·阿拉姆，得到国王的同意，采取了有关发展民族经济的决定，并自己开始执行。伊朗国家石油公司经理埃

①引自《走向伟大的文明》。——作者

②奥利维埃·瓦兰著《狮子和太阳》。——作者

格巴尔博士同样如此。军队也享有很大程度的独立性。至于萨瓦克，只是名义上隶属首相府。

在这些条件下，要协调全国的各种活动是不可能的。整个制度被封建割据破坏了。我哥哥企图依靠一些亲密的合作者，在逆水中行舟。可是，国王越来越变得独裁，不顾忠告，自行其事。他尚能听听我哥哥的抱怨（不过根本不加理会），可对其他人的批评则反应强烈。这就成了一九七一年解除参谋长德贾姆将军职务的原因，当时这位将军批评国王在同伊拉克的冲突中所采取的战术计划。

国王的首创性

国王在同外国来访者谈话中，常常心血来潮随意作出一些决定。例如，一位美籍伊朗人有次向他提到“农商”，他立即得出结论。这种形式会使伊朗一举提高产量水平，成为粮食出口国。他马上下令在伊朗南部大水坝周围地区实行“农商”组织形式。农民们发现，他们必须把刚领到的地契换成有名无实的股票，然后在这种新的集约农业企业中成为领薪水的职工。当然，他们的幻想全破灭了。对这些刚从中世纪黑暗的封建主义中过来的人，土地是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而“股票”仅仅是一张纸头。除此之外，当农民发现自己在为某些不露面的“农商”干活的时候——这些“农商”代替了由于伊朗土地改革而被赶走的大地主——他们产生一种重新回到一无所有境地的感觉。一下子被拉进政府办的合

作社的农民，产生了同样的灰心丧气情绪。他们由于不能自由地表达他们的不满，就离开村庄，到城里去寻找工作，以此来反对“现代化”这个舶来品。国王的计划很快遇到了麻烦，农业产量并没有如他预期的那样取得长足进展。

在工业方面也是这样，国王的急躁情绪和宏伟想法遇到了困难。重工业、石油化学工业和核电站，都需要专门技能，但是在国内找不到。国王聘请太多外国技术人员，解决这一难题。

在这个政权倒台前最后几个月里，常常有这样的说法：现代化计划速度太快，使国王丢掉了王位。实际情况是，他的根本错误在于付之实践时的方式方法。

腐 化

五十年来，每一届伊朗政府都把同腐化作斗争写进施政纲领之中。但是，在一九七四年石油赚大钱之后，腐化之风膨胀到不可收拾的地步。我记得一九七六年八月有一次去看我哥哥，当时我问他，为什么伊朗的商人和工业家不捐款发展文化和艺术？他回答时声音里夹着愤怒：“我们不需要他们的钱。他们可以做的最大贡献是停止偷盗！”接着我又提出一个不可避免的问题：“为什么你不把他们送交法院？”他丧气地看了我一眼。“我不把他们送交法院？我恰恰是把他们送交了法院！可是这有什么用？这场运动得从上边开始，从国王的家庭和随从开始，否则毫无意义。再说，只拍

苍蝇，不打老虎，也不公平。”

腐化之风在王室的心脏里盛行。国王的兄弟和姊妹，靠充当中间人，赚取高昂合同佣金。他们常常是通过他们掌握多数股票的公司进行的。这个问题后面还要谈到。眼下，有充分材料可以说明，王室的这种状况，是毒害社会各阶层的万恶之源。在签订合同时他们就攫取了巨额财富。这类丑闻层出不穷。美国参议院的一次质询中透露，许多人，其中包括国王的姻兄弟、空军参谋长以及阿什拉芙公主的长子，都得到了大笔贿赂。后来发现，海军司令拉姆齐·阿泰上将，在签订军事合同时把三百多万美元装进了自己的腰包。

一位副卫生大臣在一九七七年告诉我，国王的私人医生是一位高级军官，他在政府中不任职，却硬要他担任监督进口和国内生产全部药品的工作。在国王的命令之下，卫生部为在全国建立医院而设立一所银行，在分配合同时，王室成员从中施加影响。

也是在一九七七年，国王搞了一个免费向学生供应膳食的计划，由王后的母亲进行监督执行。一位朋友告诉我，在里海边的一座城市中，向某一学校运送食品的卡车驾驶员，把食品在市场上转售牟利。

国王面对迅速蔓延的腐化之风，在一九七六年春决定采取严厉措施。一批大商人和大工业家遇到了麻烦，但是，尽管进行了几次洋洋大观的宣判，公众仍抱怀疑态度。这是因为，早在一九七一年（在企图谋杀摩洛哥国王之后），国王同意了我哥哥关于严厉处理他自己家庭成员的请求。他甚至

一度把他的一个外甥处以流放。但是，几个月之后，这个外甥又故伎重演了。

我哥哥组建了一个特别调查委员会，调查外国公司对身居高位的人私下里的贿赂情况。因为其中一家公司的一个高级官员恰巧当时在德黑兰，他被传到场，并不准离开伊朗。但是这个有问题的人没有到委员会报到。我哥哥后来获悉，他坐宫廷的汽车到机场乘飞机溜了（王室成员无须到海关和警察局办理手续）。至于这些事件涉及到的伊朗大人物，他们已经到欧洲长期度假了。

鱼龙混杂。每一个人都把许多人的名字加进谣言工厂，要么是为了消遣，要么是出于恶意，然后这些名字就成了公共谈论的对象。

在这种情况下，向腐败开战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法国《世界报》记者甚至说，这是“一项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请记住国王本人在这方面并不是两袖清风。”^① 据一位美国专家说，国王创建的巴列维基金会，成了王室发财的一个公开途径。^② 由于王子和某些地位高的人士惩治不了，公众很难相信国王的诚意。总之，国王在这个问题上抱着一些十分古怪的想法。我已经援引了他告诉我哥哥的话。奥利维埃·瓦兰向国王说：“据说，一些人象自己的随从也不能排除有贪污行为。”国王回答道：“各种事情都可能发生，但是在这个特殊问题上，他们不会有贪污行为。他们完全象所有

①一九七八年十月三日法国《世界报》。——作者

②美国《武装部队杂志》一九七九年一月号。——作者

别的人一样行事。换句话说，象其他有权工作和做生意的人一样，象其他在同样的情况之下，会被认为有十分合法的资格谋生的人一样。”^①

镇 压

我已经说过，萨瓦克只是名义上隶属于政府。实际上它独立行事，并从国王本人那里接受命令。它的活动是极其秘密进行的。它竭力造成一种恐惧气氛。这种气氛从上到下毒化了社会。没有人敢公开讲话。当我的朋友们要告诉我一件秘密时，他们引我到花园里，把声音压得低低的。我不时获悉反对派成员被捕，于是，我就利用我哥哥从中斡旋，向国王做工作，努力拯救他们的生命。告密者真是多如牛毛。

大赦国际和其他国际组织开展活动，揭露了伊朗存在任意进行逮捕和拷打人的严重情况。我通过我哥哥安排他们的代表前来访问。这就使大赦国际、红十字会和国际律师协会等组织的代表，得以参观监狱。他们的报告导致了拷打现象的停止和任意捕人事件的减少。

检查制度是严厉的。有的以前允许出版的书，又被萨瓦克没收，这已司空见惯。《哈姆雷特》和《麦克佩斯》^②被禁止演出，原因很简单，就是因为剧中有一个国王或者一个

^①引自奥利维埃·瓦兰著《狮子和太阳》一书。——作者

^②《哈姆雷特》和《麦克佩斯》都是莎士比亚的名剧。——译者

王子被谋杀了。我有一位朋友叫埃布拉希姆·戈莱斯坦，他拍的一部电影被禁演，这部电影是关于一个暴发户的虚构故事，因为可能会引起同石油景气之后的国王情况相比较。一位作家在萨瓦克的一所监狱里蹲了几个晚上，唯一的原因是，一个政权的反对者在被萨瓦克截获的一封信中，引用了作家写的一本书上的一句话。

拷打犯人的现象终于被国王禁止了。不过，这成了一个话题，不时引出国王一些玩世不恭的话来。一九七六年十月二十四日，美国电视播放了迈克·华莱士采访国王的情况。华莱士问他：“如果进行拷打证明是必需的，你是否还用它？”国王回答道：“不是旧意义上的拷打，而是扭曲几下手臂，诸如此类。不过，当今有审问人的明智手段。”

通常是先斩后奏。国王不认为游击队是“政治犯”，而是彻头彻尾的“恐怖分子”。对于毒品走私犯，有特别法律授权当即处决。因此，浸沉在悲哀之中的家属，对国王抱有强烈的怨恨。一九七六年末，一位来访的外交部同事在纽约对我说：“国王的心变得越来越冷酷了。”

毒 品

伊朗人特别蔑视国王在制裁贩毒问题上的做法。国王的一个兄弟马哈茂德·礼萨，一直被允许种植罂粟，出售鸦片。（事实上，据德黑兰流传的小道消息，每年他都声称收成不佳，可是他囤积大量鸦片，以高价在黑市出售。）人们对

一九七二年在瑞士发生的一件臭名远扬的丑闻记忆犹新。当时国王的一个随从埃米尔·胡桑·达瓦卢因贩卖毒品，受到传讯，他却从当地法警手中逃脱。国王亲自驾车送他上等候在苏黎世机场的飞机，警察眼巴巴地看着，毫无办法。这件事当时引起瑞士和欧洲报界议论纷纷。新闻检查员不让这个消息传到国内。但是人的嘴是封不住的。老百姓纳闷，为什么一些小走私犯遵照国王的命令被枪毙，而同一个国王，却把他的朋友从瑞士监狱中救出？我还记得那年春天，我哥哥向国王表示抗议，提出辞职，并回到他在里海边的宅邸，好几天闭门谢客。但是国王拒绝他辞职。至于埃米尔·胡桑·达瓦卢，只躲了几个月未露面，后又出现在宫廷，照样为所欲为。

王子和公主的随从里也有“大烟鬼”。对此，国王不时地大发脾气，而罪犯会偷偷地躲到别处去过瘾，当国王怒气渐消时再回来。

不 道 德

王室和上流社会成员中，某些人的公开生活，起码可以说，既不尊重国教的圣训，甚至也不尊重最基本的道德。

国王在他的宫廷大臣阿拉姆和他的帮闲的鼓动下，甚至同意在伊朗设立赌场和“娱乐场”，冠冕堂皇的动机是为了吸引海湾的首长们，既有经济上的考虑，也有政治上的考虑。赌博机构如雨后春笋在几个城市出现。王室成员有时也

参加聚赌。波斯湾的基什岛，成了亿万富翁花大钱寻欢作乐的中心，盗用的资金严重外流。（有谣言说，法国航空公司的协和式班机，用来进口巴黎著名的克洛德夫人挑选的美女。）这个交易是在“鼓励旅游”的借口下进行的。但是，当耗资超过原定指标，没有实现发起人的希望时，就企图强迫伊朗国家石油公司和伊朗国家航空公司，买下在基什岛上的不动产。但此举没有成功。我的一位朋友参加了有关出售这些设施的会议。他告诉我，伊朗航空公司负责人要求研究一下这项事业是否有利可图，却受到国王的奚落。

读者只要想到伊斯兰教禁止饮酒和赌博，就会明白这些活动对人民群众造成多么大的破坏性影响。除此之外，德黑兰流传着阿什拉芙公主在外国赌场赌输了的谣言。还有传闻说，莎姆斯公主改变宗教信仰，成了一个罗马天主教徒。

首都被分成了两个城市：北半部是富人的都会，豪华的西式别墅，坐落在饭店、舞厅和夜总会之间；南半部是一个贫穷不堪的城市，狭窄的小巷，污染的空气，蜚居着穷人。

由于进口先进技术，外国民用和军事技术人员随之流入，加速了大城市生活的“西方化”。西方影响渗透到每一个领域。为了在德黑兰中心建设一座现代化城市“巴列维城”，准备修建高达六十层的摩天大楼，光制定这项计划就花了数百万美元。（由于大量贪污，这项计划只好被放弃。）甚至国王的治国之道中也模仿美国人的办法：国王一九七八年解除纳西里的萨瓦克头子职务，派他出任驻巴基斯坦大使。正如尼克松在这之前任命前中央情报局局长理查德·赫

尔姆斯为驻伊朗大使一样。

巨大的军火库

从一九五〇至一九七一年二十一年间，伊朗向美国购买的武器不超过十亿美元。而从一九七一至一九七八年，达到一百九十亿美元的天文数字。^①

这种形势不能不触动苏联，特别是国王允许美国人在靠近北部边境地区设置侦察发射火箭的电子监视网。

一九七六年，我哥哥从蒙古访问回国的路上，在莫斯科停留，同苏联部长会议主席阿列克谢·柯西金进行了会晤。这位苏联总理激烈攻击伊朗购买武器。在这之前，紧接着尼克松一九七二年访伊之后，国王应勃列日涅夫的邀请，对苏联进行一次私人访问。陪同访问的一位官员告诉我，在一次秘密会谈中间，苏联人要求国王停止军备竞赛，受到国王的拒绝。会谈完全陷入僵局。

同年九月，当我们的外交大臣在纽约会见安德烈·葛罗米柯时，这位俄国人略带幽默地对他说：“你们正在用所有武器装备起来，这使我们想——”

我们的大臣打断他的话说：“这纯属伊朗的防务问题。我们的政策不是针对我们北方的伟大邻邦。不管我们做什么，我们决不可能同你们的力量相匹敌。”

^①一九七八年，防务、炼钢厂、原子能和石化工业占总支出的百分之六十五。——作者

“当然了”，葛罗米柯继续说，“但是我们想了解这是为什么，是针对谁，是伊拉克吗？可那是一个小国；（海湾）酋长国吗？军事上还不够格；沙特阿拉伯吗？对伊朗没有威胁。那么，究竟为什么呢？”

我们的大臣被问得张口结舌。他只好改变话题。

第二年，在联合国大会的一次会议上，一位苏联高级外交官对我说：“直到最近几年之前，你们一直奉行一条平衡的政策。这对发展我们之间的关系有利。我们知道你们同美国发展特殊关系的立场，我们接受这一点。但是，由于你们追求先进武器，这样，你们就正在打乱这种平衡。”

由于不顾力量均势，军费开支这个无底洞，必然吞掉伊朗石油收入的大部分。购买武器考虑不周，置伊朗经济于危险境地。由国王本人主持的最高经济委员会的报告表明，我哥哥和他的几位大臣，试图减少国王的胃口。但是，他沉湎在把伊朗变成一个军事强国的梦想之中，不能自拔。^①

一九七七年夏天，我同我哥哥讨论了这个问题。“不要以为一个首相对伊朗什么都知道，什么都看得到，”他对我说。“有一些方面的问题，国王根本不让别人知道，如萨瓦

^①一九七九年在同《屋檐》杂志记者的谈话中，《七九年的崩溃》一书作者保罗·厄尔德曼，不同意把国王的倒台归结于推行现代化计划的速度。他说：如果国王不把国家资源浪费在军费开支上，如果他满足于自己拿十亿美元，他的将军们拿十亿美元，把其余的钱用于发展经济，他的儿子本来会继承王位的。不用厄尔德曼说得那样绝，可以这样说，军费开支是造成这个国家经济问题的主要原因之一，其结果加速了政权的垮台。——作者

克和军队。他签了军事合同之后才告诉我们，并逼着我们削减其他计划。以干预阿曼为例：我是在听到关于我们军队参战的宣布之后，才知道此事的。”他看我沉默不语，继续说道：“你听着，我本人问心无愧。我在职时没有发财。我也从未下达罪恶的命令。我的双手没有血迹。尽管我处在非常困难的条件下，但是我相信，我是在为我的祖国效劳。”

经济恶化

随着国家日益繁荣，越来越多的伊朗人开始往外跑。不仅是阔佬，中产阶级也开始到欧洲和美国购买财产。一九七六年我访问尼斯^①，对那儿伊朗人越来越多感到吃惊。我甚至想，他们应当把“英国人散步场”的名字，改为“伊朗人散步场”。我哥哥和他的经济专家，敦促国王采取步骤，限制资本输出，国王充耳不闻。他固守的防线是：“他们自己挣的钱，他们有权愿意怎么花就怎么花。”国王本人不也在瑞士购买了财产吗？总之，有关的人只是仿效王室成员，而王室成员在欧洲和美国拥有大量财产。

高昂的生活费用，优厚的伊朗企业利润，以及普遍的财政骗局——所有这些，损害了中产阶级下层和工人阶级的利益，而使“新”的中产阶级上层变富。强迫向工人出售百分之四十九的股票，又使老板们感到沮丧和烦恼。

^①尼斯，法国的地中海游览胜地。——译者

一九七七年五月，美国新任驻伊朗大使沙利文，参加在纽约举行的一次商人讨论会。在讨论过程中得出结论，伊朗要从一个以石油为基础的经济，转变成为一个全面的工业国，其希望微乎其微。会议参加者认为，伊朗缺乏必要的物质和人力基础，以便担负国王进口的先进军事和工业技术。讨论会甚至建议大使冒宣布为不受欢迎的人的风险，坦率地向国王讲清这一点。^①

对伊朗庶民来说，经济恶化在日常生活中意味着经常停电、食品短缺和黑市增加。

一党治国和“不参与”政策

但是，比混乱的经济状况更致命的是，在决策过程中没有深孚众望的人参加，这就是人们一致起来造国王政权的原因。没有哪一个社会部门，没有哪一个生活领域，能摆脱国王的控制。国王的阴影笼罩整个国家。其结果是普遍产生离心离德的情绪。我在一九七五年二月九日的日记中写道：“我对‘不参与’的政策，憎恨到如此程度，以至失去正常的思维……一切似乎都是虚假的。我突然有一种印象，那就是我们都是幽灵，在虚幻的舞台的前面游游荡荡。认为家乡正在进步的感觉——这一度使我激动——正在迅速消失。我们是一出悲剧中的演员，昏昏然不知所终。”

^①一九七七年五月三十日《纽约时报》，——作者

一九七五年解散政党，建立单一的复兴党，这实际上是最后一根救命稻草。许多负责人，其中包括我哥哥，都认为国王犯了一个大错误。可是，那是他的权势所在，任何人都得让步。

国王把他的单一政党，看作是一种工具，引导不满的人，并给予批评者在国王本人监督的场合下发表意见的机会。他还打算使它成为对人民进行政治教育的一种工具。可是，这个党是从上而下办起来的，没有群众基础。伊朗人被邀请围绕在它的周围，他们照着做了，这是因为他们担心，如果不这样做，就有引起别人注意之虞。我清楚地记得外交部关于此事所下达的指示。我接到寄来的一张登记表，用来填写大使馆“希望”入党的成员的名字。所有的人都默默地签了名，表情闷闷不乐。在私下里，他们都表示不快。

当然，国王有他想问题的方法。他提倡一种“有引导的”逐步的民主。可是，强迫人们表忠，人们勉强照办，又有什么用处呢？公众要求参加决策；国王提供的东西是辩论实施“他的”革命方法的机会，而不是伊朗存在问题的基础。他关于“参与”的定义，同人民的想法不一致。曾两度担任复兴党总书记的贾姆希德·阿穆泽加尔，一九七七年十一月四日对美国《华尔街日报》记者说，鉴于伊朗人口有三千四百万，而且在二十五年至三十年内要翻一番，国王认为，没有一个人能凭自己的力量统治六千万人。因而，人民必须学习如何参加政府的工作。记者问，为什么人民不能现在就开始参加呢？阿穆泽加尔解释道，百分之五十五的人口

是文盲，假如把担子交给对政府事务一无所知的文盲，其结局不是动乱就是无政府状态。这种傲慢的杰出人物统治论，自然会造成“下层”阶级特别憎恨他们的“上司”了。

除此之外，国王一方面答应在他单一政党内有辩论的自由，同时他又说不希望有任何反对派。这些自相矛盾的说法，进一步削弱了这个压根儿就没有真正群众支持的组织。因此，几乎在各个领域都发生如火如荼的动乱，这也就不足为怪了。所有的伊朗外国来访者，都承认伊朗所取得的物质进步。但是，他们也强调指出，这个国家缺少热情和人民参政。

一九七五年九月二十六日，我给一位朋友写信道：“现在伊朗存在的大问题，不是经济问题，而是文化问题。一个松散和不完全的文化基础，贴上一个西方外表是不牢固的。伊朗正在走向灾难。物质保障越多，玄学的问题越重。”

不折磨知识分子的时候，就完全忽视知识分子的作用。这个政权是在鼓励碌碌无为。文化部在国王姻兄弟的把持下，扼杀了创造精神。至于王后搞的文化活动，尽管出于好意，也不能打动群众。在王后的外甥指导下，王后于一九七七年创建的现代艺术博物馆，批评家安德烈·费尔米吉埃写道：

一些国家不是追逐西方——西方也在拚命寻找自己的民间传说和美术明信片的原始风格，而是更加努力与自己过去特点结合起来。在使蓝色更鲜艳之前，他们应当调和自己已经有的颜色。

……石油生产国成为艺术品的大进口国，对某些陈列馆无疑是个恩惠。伊朗绘画却并不因此而增色。^①

检查制度和限制作家言论自由，根本不能鼓励伊朗社会开明。它把知识分子的精华驱赶到反对派的行列。

宗 教 骚 乱

一九七一年春天我在亚兹德市场漫步时，看到一些小字报宣布：“（躲藏的）伊玛姆回来的日子即将到来。”这句话使我突然想到这是一个警告。但是躲在象牙之塔的国王，却丝毫不注意正在增多的信号。他不象（埃及总统）萨达特，从来不进清真寺同信徒一起祷告。

总之，教士们同政权之间的关系，从来没有亲密过。即使在国王父亲的时代，也从来没有特别关心过宗教设施。有一次，他进入在库姆的法蒂玛陵墓时，没有脱鞋，还动手威吓大胆批评他的毛拉。

国王奇怪地低估了教士的影响。当奥利维埃·瓦兰问他是否仍然同毛拉们有芥蒂时，国王回答道：“也许他们不时地发发牢骚，可是没有什么作用。”接着，他又声称，霍梅尼在伊朗没有追随者：“这儿除了恐怖分子之外，没有人关心他；所谓伊斯兰马克思主义分子可能有时念叨他的名字，如此而已。”他继续说道：“毛拉保守知识秘密以便维护他

^①一九七七年十月二十七日法国《世界报》。——作者

们控制权力的……传统，现在已完全消失了。”^①

今天，特别是鉴于在古兰经学校和清真寺出现的对政权提出的大量批评，国王上述的话听起来令人吃惊。霍梅尼继续从流亡地纳杰夫发出教导，许多神学学生对他进行秘密拜访，回来后在伊朗传播他的信息。

但是，即使在纯宗教阶层之外，伊斯兰运动自六十年代中期以来，也是一种重要的政治影响。因此，马什哈德大学社会学教授阿里·沙里亚迪，使什叶派思想反映最新时代的要求，并让它为革命和反帝斗争服务²，在全国各地的学生中，产生了热情的浪潮。

事实上，自从一九六三年发生悲剧事件^②导致霍梅尼流亡以来，宗教界的不满情绪从来没有减少过，而所有怀抱推翻政权想法的人，肯定都向阿亚图拉们讨教。因此，萨瓦克鼻祖特伊穆尔·巴赫蒂亚尔一九六七年也访问伊拉克，同霍梅尼进行了接触。会晤是在伊拉克当局帮助之下进行的，当时伊拉克当局与国王存在争执。但是，萨瓦克分子还是成功地把巴赫蒂亚尔暗杀了。

公平地说，是宗教骚乱敲响了这个政权的丧钟。是在什叶派的旗帜下，伊朗人民集中了推翻巴列维独裁统治所必须的力量和一致性。在罢工和艰难困苦的许多月份中，是宗教

①奥利维埃·瓦兰著《狮子和太阳》。——作者

②一九六三年，国王提出“白色革命”，实行土地改革，取消妇女面纱，遭到宗教势力的强烈反对，霍梅尼领导反政府示威，遭到血腥镇压。——译者

给人民以力量，经历不正规的生活。

他们的宗教了不起，他们的青年人亦是好样的。在一九七七年，全国人口几乎有一半不到十六岁，三分之二不到三十岁。年轻人是示威者的中坚，他们赤手空拳地面对全副武装的军队。

宗教和青年人混成一体，理应受到极大重视，因为这对国王来说是致命的。任何人回忆起殉难者在什叶派中所起的关键作用都会明白，“垂死的力量”远比“致死的力量”强大。下面是法国哲学家安德烈·格吕克斯芒对这个问题的见解：

同通常的见解相反，最伟大的力量……并不出自于一支枪，而是出自于准备去死。垂死的力量，也是一种集体的力量，信奉各种知识……垂死的力量是各国人民、各种文化和文明凝聚起来息息相通的手段……从长远看，是垂死的力量改变世界，是垂死的力量构成社会运动的动力，而不是军事方面致死的力量……^①

自一九七八年六月开始，每隔四十天举行一次集会，纪念德黑兰示威的受害者。对这种规模越来越大的集会来说，上边的那些话特别贴切。

国际形势

外交政策是国王的另一个私人王国。他最害怕苏联。一九七〇年，他对印度与苏联的和解感到焦虑。当印巴战争导

^①一九七九年六月十一日法国《新观察家》周刊。——作者

致一九七一年建立孟加拉国时，他确信北方邻国打算掀起某种巨大的包围伊朗的运动。这一想法在一九七二年之后成了国王的心病。这是他努力要把伊朗全速地转变成为一个军事强国的原因。这也是他对关于实行温和政策的建议充耳不闻的原因。

假如你注意到伊朗总是外国策划阴谋的舞台这一事实，国王的忧虑是可以理解的。沙皇时代，伊朗受到北方俄国人的沉重压力。伊朗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一直是英国的一个保护国。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英国在俄国人同意之下占领伊朗，伊朗成了向红军运送武器的天然通道。在那些日子里，我是贝鲁特法国公立中学的一名学生。一九四一年，礼萨国王退位之后，他的几个孩子前来黎巴嫩上学。其中一个叫艾哈迈德·礼萨，他有一天介绍他父亲的情况，我当时也在场。显然，英国人答应老国王旅居印度。但是，当轮船到达孟买海面时，他得到通知将被送往南非。老国王怒发冲冠，又诅咒又咆哮，大声喊道：“我早就知道，英国人不可信！”

外国影响是如此之深，以至到了今天，许多伊朗人仍然相信，若不是外国影响，国王倒台是不可能的。显然，他们心里想到的是，一九五三年中央情报局策划的政变。这次政变导致推翻摩萨台政府。当然，国王在最后几年针对西方的激烈言词和傲慢批评，是西方国家领导人感到恼火的一个原因。同样明显的是，他在石油输出国组织中扮演鹰派角色，也使他同大石油公司的关系疏远了。再者，可以理解的是，

由于他在购买武器问题上考虑不周，而惹恼了邻国，特别是苏联。但是，要说从这些方面就可以推测，存在一个或者几个外国阴谋，那未免牵强附会。也许是两方面都鼓励左派或右派不同政见者。（虽然卡特发起的人权政策，制造了一些反对派，无疑也是事实。）我不相信国王的亲密的顾问，特别是美国大使（国王每天要同他见面），蓄意引诱他犯错误。国王自己犯了足够多的错误。

尽管如此，还是有些人认为，伊朗革命是一个旨在把整个地区搞乱的庞大计划的第一步。这一论点我以后再谈。

即使如此，正如我已经指出的那样，国王的“民族独立政策”，已经在两个超级大国之间建立起一种相对的力量平衡。他一九七一年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同古巴和东德建交，使人们对他的外交政策更加信任。但是，一九七二——一九七三年之后，事情起了变化，平衡被打破了。

国王突然决定扩大他的防御范围，干预佐法尔的革命，支持索马里反对苏联。他一如既往，不屑于向他的亲信解释他这一决定的动机，更不用说对他的臣民作解释了。与此同时，正当黑非洲开始在国际舞台上发挥一定重要作用的时刻，他偏偏加强了同南非的关系。在我给国王的报告中和我进见国王时，我多少次提醒他注意采取这种政策的不良后果。可是他不愿意听。他对阿拉伯人的傲慢态度同样使人恼火。鉴于我在阿拉伯国家渡过了自己的童年，我不仅看不出我们同阿拉伯人之间有什么两样，反而感到我们之间存在着一种密切的文化联系。

有一次，我甚至提及了大赦国际。那是在一九七〇年。这引起他对我大发雷霆。“他们是共产党！”他声色俱厉地说道。但是，当对徒手的人们开枪酿成屠杀时，我向国王汇报了这次袭击。在我哥哥的帮助下，我设法为马丁·恩纳尔斯的来访打开了大门。

一九七六年，当阿德希尔·扎赫迪过度铺张的招待会受到美国报界的非议时，国王召见我说：“我不知道它们是否有害。总之，扎赫迪可以任意支配所有的美国议员。”对这样的断语我还能说些什么呢？

让我们回过头来谈现在的情况。似乎是为了挑逗苏联，国王一九七八年四月七日宣布破获了属于我们北方邻国的一个间谍网，这引起了巨大混乱。几周之后，一位年迈的退休将军，因卷入间谍案，被行刑队处决。我们国内问题正在恶化，为什么此时要搞这么一手？在阿富汗发生的共和政变使国王感到震惊，害怕被苏联包围的心情死灰复燃。

一位通常消息灵通人士认为，这次间谍事件被用来向美国国会施加压力。许多参议员反对向伊朗出售装备有空中预警和控制系统（一种极其先进的电子侦察办法）的飞机，担心它会落入苏联之手。国王是为了向他们表明，他的反间谍机关工作是多么卓有成效。

考虑到示威者喊出的口号，勿庸讳言，外交政策的变化，对政权的倒台确实产生了影响。当然，毫无疑问，外部势力也的确尝试利用国内的不满情绪——但愿是通过宣传。利比亚和巴勒斯坦解放组织领导人咒骂国王，亲共的伊朗派

凯电台抨击他最近的政策。至于西方报纸和非政府组织，它们发动反对镇压的运动。显然，许多特务机关也在幕后进行活动。

但是，无风不起浪；危机恰恰出自这个国家的内部。以上对这个政权最后几年的粗线条回顾表明，推翻这个王朝所必需的各种因素正在汇聚到一起。这种变迁本来在一九五三年就可能出现。中央情报局安排的政变只是推迟了这一天。

一九七八年七月的德黑兰

我哥哥正同一些朋友吃饭，忽然有人给我哥哥打来电话。根据国王一位妹妹的命令，帝国卫队刚抓了她建公寓大厦的一个外国合股人。这位公主觉得这个搭档得罪了她，而她又不屑于按法律程序办事，于是就自行其是。这位合股人被交到警察手里，为了获释，不得不向公主交付一百万美元。

我哥哥打了无数个电话之后，回到位子上，倒在一张扶手椅里，自言自语地说：“政权从里面烂掉了。”

是的，这个政权的命运已经注定，了解其迅速倾覆，就可以帮助更好地认识体现这个政权的那个人。在一定意义上说，国王是他自己失败的真正制造者。他性格的演变也说明了这一点。

第三章 变化中的国王

在我的祖国，我依赖法律和把我同我的人民结合在一起的特殊精神纽带，已经担任了最高职务，掌握了最高权力。

——引自穆罕默德·礼萨·巴列维著《走向伟大的文明》一书

波斯波利斯，一九七一年十月十五日，星期五

夕阳的余辉把波斯波利斯王宫的柱子染成金色。卫兵打扮得象阿契美尼德王朝^①的武士，头发和胡须卷曲着，列队站在宽大成双的楼梯上。他们的长矛闪闪发亮。在著名的王宫遗址脚下的巨大讲坛上，一些国王、总统和总理簇拥在伊朗国王和王后的周围。

前一天从德黑兰出发到达这里的一连骑兵，现在正朝着讲台走过来，上尉翻身下马，向君主呈上手写的羊皮书。这是民族的效忠信。身着华丽贴身军服的国王，致了答词。他单调的声音，通过复杂的扩音系统，在恭候的人群上空回

^①公元前六世纪，居鲁士大帝建立了统一的波斯帝国，称为阿契美尼德王朝。——译者

响：

“为伟大而尊严的伊朗人民、我们光荣历史的创造者和建立者而欢呼。

“为波斯帝国的缔造者、人类历史上不朽的英雄居鲁士大帝而欢呼……”

“在这个历史性的日子，当全国重申忠于自己的光荣的过去之时，敌人，伊朗国王，请历史作证，我们——居鲁士的子孙——履行二千五百年前的诺言。我们忠于我们的使命，我们把我们的文化变成了和平和仁爱的工具……”

“大流士^①——伟大的王中之王——在这里墙上依稀可见的铭文中宣告：‘让这个帝国永远免于邪恶和欺骗；让权力和正义永远是它的指南；让强者不再虐待弱者；让人们禁止伤害别人……’”

国王——雅利安人的太阳、巴列维王朝二世——的最后几句话，淹没在颂扬国王的和声之中。

接着，他对伊朗过去不同时期的帝国卫士进行了令人难以置信的检阅。这些武士包括：一个史前的斗士、阿契美尼德王朝“不朽者”、一个有轮的围城高塔、一艘张满帆的三层桨战船、帕提亚王朝骑士、萨珊王朝弓箭手、沙法维王朝步兵和现代军队，以及各路发展“大军”的代表。观众恍惚进入了梦境：在广阔无垠的大平原上似乎在上映塞西尔·德

^①公元前第三、第四世纪，波斯三代国王均用“大流士”的称号。——译者

米尔^①导演的绚丽多彩的史诗影片。

前一天，国王在帕萨尔加迪居鲁士大帝空荡荡的陵墓之前吟诵道：

“居鲁士，伟大的国王，王中之王。允许我，伊朗国王和我的人民，为你欢呼！”

“……我们在这里，此时此刻，重申对历史所作的保证，向你，历史上不朽的英雄、世界上最古老帝国的缔造者、空前的伟大解放者、人类的好儿子，表达全体人民的无限感激之情。

“居鲁士，我们站在你的安息之地庄严保证：请永远安当地长眠吧，我们在守卫着，我们会继续守卫你的光荣的遗产。”

检阅结束之后，贵宾们随着主人，走进法国专家建造和布置的豪华的帐篷村。在招待参加庆祝活动的元首和其他贵宾的膳宿方面，花了数百万美元。在伊朗，除了国王的贴身侍从和职业拍马者之外，普遍批评国王的这种做法。然而，人们只是在家里小心翼翼的私下交谈中才敢讲。一个发展中国家，怎么能掏尽腰包，搞这种“化装宴会”，或者至少可以说是一场“声光表演”，而不把钱用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呢？（七年之后，在中非皇帝博卡萨一世加冕典礼时，世界各地也发出了同样的批评。）

国王气冲冲地说，他的开销并不是没有成果的。它加速了国家计划的实施——建立了更多的学校，发展了农村电气

^①塞西尔·德米尔，美国当代著名电影导演。——译者

化，扩建铁路和电信网，等等。不管怎么说，帐篷还可以放在那儿供其他场合使用。再说，还有伊朗的威望嘛！难道这不值得吗？波斯波利斯连续三天成为一个国际首都，外国元首们在那儿进行会晤，并解决他们之间存在的问题。然而最重要的是，伊朗人民记住了他们光荣的过去。

与历史的约会

穆罕默德·礼萨·巴列维，向所有来访者强调了这个节日的深刻意义，证明了新伊朗——阿契美尼德帝国的子孙和拥护者——的活力。在这次活动中，通过让人民回忆自己的历史，恢复了他们的信念。“我们的白色革命不仅从居鲁士统治获得鼓舞，”他对自己的随从说，“而且要同它相媲美。”他想使波斯帝国二千五百周年的庆祝活动，成为全国复兴的信号。他通过引导人民用自己历史进行约会，寻求赋予人民以古伊朗的精神力量。

然而，十分奇怪的是，仪式上看不到人民群众。他们被波斯波利斯大平原上的警察和军队隔离开来。此外，这种“敬祖”活动，引起了教士们的反感。他们除了伊斯兰先知的教导之外，不相信任何戒律。

国王在对印度记者卡朗吉亚^①发表谈话时说：

“我们古老的祖国、文明的发祥地，诞生了世界上

^①卡朗吉亚，印度《闪电》周刊主编。——译者

第一个帝国。现在她正处于光荣复兴的阵痛之中。我们的白色革命，植根于二千五百年前居鲁士大帝一次同样不流血的革命之中。居鲁士建成了他的帝国，并且在一代人的时间里，把它铸成一个文化和社会经济的实体。这个实体是为了建立一种完全新型的、有道德的、人道主义的和文明的生活和价值。”

卡朗吉亚接着问国王：“居鲁士节预示着出现某种复兴——那就是重新发现和复活伊朗失去了的雅利安人的社会气质，这样推断对吗？”国王回答道：

“当然是一次重新发现和一次复兴了。不过，为什么你要说‘失去了’的社会气质呢？真的，伊朗从未失去过。尽管发生过挫折、倒退，甚至民族灾难，居鲁士的遗产——我们雅利安人光焰四射的火炬，一直保持明亮，并且在历史上一代一代传下去，把过去同现在联系起来，并保护未来。”①

一九七一年之后，国王在他的讲话和答记者问中，一再提起伊朗的雅利安人祖先。在一九七七年出版的《走向伟大的文明》一书中，他甚至写道：

伊朗文明——伟大的文明将是它最完美的形式——是雅利安人文明的一种突出表现……它朝着尽善尽美前

①引自卡朗吉亚著《一个国王的心》（伦敦艾伦和昂温出版社：一九七七年出版）第一页至第三页。——作者

· 进步的步伐从未停止……如果说我们的民族不断在雅利安人文明中探索，那是因为它创造性的天才，同其根本原则持久地连结在一起。大流士大帝通过把自己说成是一个雅利安人和雅利安人的儿子，说成是一个伊朗人和伊朗人的儿子，实际上提到了反映“雅利安人的”和“伊朗人的”这两个形容词的无数的优良品质。

· · · · · · 这个文明，从其最深刻的意义上说，是建立在生活和创造性基础之上的。在这中间，光体是创世的最高表现，因为所有的美的东西和创造性的力量，盖源于此。

· 阅读国王这本书，人们有些吃惊。它的一些特点使人回想起另一个看着自己帝国崩溃的独裁者。它也使人莫名其妙，为什么国王无视他的人民信仰伊斯兰教的强烈要求？国王在位的最后几年，越来越多地提起伊斯兰教以前的信仰，这注定引起什叶派教士的惊恐。一九七七年，国王修改了历法，不从回历算起，而从居鲁士大帝缔造波斯帝国时算起，这成了他垮台的一个因素。

· 追 求 合 法 性

· 国王或许真的相信雅利安人种品德和价值的长处。他关于这个问题所说的话，从心理分析意义上来说是合理的，包藏着比较深刻的动力。他寻求的是，通过在他自己与过去伟大国王中间搭桥，使自己合法化。对合法化的要求，已支配

他很长时间了，这可以从他要求为自己举行盛典中判断出来。波斯波利斯庆祝活动的念头，在六十年代初就有了。他把这些活动看作是建立伊朗历史的连续性，建立当今世界上君主们眼中的君主政体的一贯性。今天世界上的国家元首、总统或君主，相对来说不都是历史短暂的国家代表吗？而他，穆罕默德·礼萨·巴列维，是居鲁士大帝的衣钵继承人！他的生身父亲在起祖先姓名“巴列维”时，就想着把这个新王朝同遥远的祖先的年月统一起来。

为了理解这种消费需要，人们只要看一看国王的身世就知道了。当礼萨·汗登基时，他才七岁。这个家庭开始地位低下。他童年时流传一个故事，说他父亲曾经是一个牧人。但国王却在做一个富有魅力的血统高贵的美梦。他把祖先追溯到巴万兹部族。这个部族在古伊朗人摇篮马赞达兰高原生息。他还说他祖父和曾祖父是“老波斯军”的军官。

实际上，礼萨·汗出身卑微。巴列维国王对他父亲十五岁在波斯哥萨克旅订婚之前的家史故意含糊其辞。礼萨·汗一九一六年晋升中尉之后，同一个富裕地主的女儿结婚。随着丈夫肩章上星的数目的增加，她从恺加王朝最后一个国王那里为丈夫取得了“塔杰·埃尔·莫卢克”（王中之王）的头衔。后来，她在谈起礼萨·汗时说：“他的双亲是道地的农民，而他也没有受过教育。由于他意志强悍，参军后从一个目不识丁的大头兵，在军阶上一步一步向上爬。”^①

^①巴黎《秘闻》杂志，一九六八年第一〇九四期。——作者

礼萨·汗一九二一年任卡兹文卫戍司令，进驻德黑兰，把当时的首相一脚踢开时，他穿的是上校军服。艾哈迈德·沙赫·卡贾尔把他提升为将军，并授与他萨多达尔·塞佩（陆军司令）的头衔。他一登上王位，就没收了一批庄园，由此而成为伊朗最大的地主之一。那时，贵族是以占有土地多少来衡量的。经过这番巧取豪夺，他无疑是企图使自己名正言顺。但是，作为一个职业军人，他继续过着简朴的生活。

他的儿子，可能感到父亲的贫寒出身太刺激人了，要设法使自己的显贵无可置疑。他以一种贵族式的姿态，把他父亲弄来的土地，分给在这些土地上干活的农民。他努力建立自己的权威，并搞全国性的庆祝活动，收买人心：一九六五年庆祝登基二十五周年（他让国会授与他雅利安人的太阳的称号），一九六七年加冕，一九六九年庆祝登基三十周年，一九七一年庆祝君主制度二千五百周年，一九七六年庆祝巴列维王朝五十周年，等等。

由于在波斯波利斯举行庆祝活动，他俨然以波斯帝国缔造者继承人的身分，出现在专程前来的各国元首面前。伊朗历史的连续性在国王身上人格化了。他终于具有了合法性。

如今，许多人说，国王性格的深刻变化，发端于这些庆祝活动。这些庆祝活动，也引起人们对伊朗宫廷豪华和浪费的注意。我那时常常说，最使我感到惊奇的是，国王根本不需要搞这些耗费巨大的庆祝活动，来提高权威。事实上，他已通过自己提出的发展计划，赢得了合法性。发展计划的第

一批成果已给全世界和伊朗人民留下了印象。不到七年时间，他的国家已经摆脱了落后状态：贫困在消失，工厂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农民成了土地所有者，失业下降，国民收入增长。你只要在这个国家到处走一走，就会感到它的深刻变化。虽然缓慢，但却稳步地改变了整个社会。他决心使加冕为人们所理解。他等了二十六年才这样做，也可以为人们所认可。他本人提出一种显然合乎逻辑的解释：他等到了他的人民的生活水平得到改善。难道这不是合法性的一种形式吗？为国效劳在先，加冕在后。因为人民赏识可以被称之为君主作用的东西，所以才提议给他戴上王冠。实际上，他那时可以制定一条扎根于传统的新路线：由人民的一个代表赐与他，而不要自己动手。一个真正的领袖应当是挑选出来的，或者是由选举产生的。

毫无疑问，如果通过使国家机构民主化，来突出君主政体二千五百周年的庆祝活动，而不是搞如上所述的诸多礼仪，可能是更明智之举。早在七十年代初期，这个政权物质和社会方面的成就，就使自由化完全成为可能了。当穆罕默德·礼萨·巴列维转而依靠盛大的礼仪时，他——雅利安人的太阳——就失去了同人民接触的机会。他由于把合法性建立在遥远的过去的基础上，从而开始切断了自己同现实的联系。

我第一次会见国王

国王在一九四八年八月对巴黎进行正式访问期间，我第

一次会见了。他看起来，仍然非常年轻。这使我想起一九三八年匆匆见过一面的那个腼腆的青年。当时他前往开罗，同埃及国王法鲁克的妹妹芙吉娅公主结婚，在路过贝鲁特时稍作停留。国王访法时，我是伊朗驻巴黎大使馆的一名随员。由于我懂法语，所以交给我各种吃力不讨好的任务：陪同来访者去机场，同凯道赛^①讨论经济事务，写信，打电话向饭店订菜，等等。国王到达一个星期之前，阿里·苏赫里大使——一位老政治家和前首相——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

“国王和他的先父一样，”他对我说，“对新闻报道十分敏感。你还记得战前喜欢发表讽刺文章的《骨髓报》和《鸭鸣报》上刊载两则报道，在外交上导致同法国的分裂吗？好吧，我要你去查看所有的报纸，以避免任何不合时宜的玩笑。”

我就这样开始了工作。这个差事看来并不太难，因为那时还没有萨瓦克，伊朗还上不了(巴黎)报纸的头版要闻。再说，大部分报纸的编辑部都有我的朋友。但是左翼报纸不特别喜欢国王，因为在苏联占领军撤走之前于一九四五年在伊朗北方建立的短命的阿塞拜疆共和国垮台之后，国王解散了伊朗所有进步政治组织。《鸭鸣报》我没有一个熟人，可是法国外交部的一位朋友接手了这件事。这家报纸登了一则几行字的报道，根据记忆引述如下：“电话铃声响了，一位大人物警告我们，不要对来自帝国的客人有任何不尊敬。当我

^①凯道赛，法国外交部所在的大街，法国外交部的代称。——译者

们抗议这种侵犯言论自由的作法时，他问我们外出度周末自己是否有汽车。‘难道波斯没使你想起任何事情吗？’他问道，‘想到石油了吗？’他以父亲般的口吻建议我们想一想我们需要多少汽油！”（那时，法国实行燃料配给。）

国王在那些日子看来并不非常自信。他的随从尽管当面毕恭毕敬，但却传话给他。大使遵守礼宾规定，但却象对待小孩子似地对待他。国王外表非常腼腆。他注意倾听别人的意见，犹豫不决时就向熟悉的面孔投以求援的一瞥。他有一两个晚上空闲，就在夜总会中与朋友介绍来的妓女消磨时光，他给这些女人的口袋里塞满了高级礼品。在几个月之后举行的一次招待会上，我遇见了一个同国王一起鬼混的女人，她骄傲地展示了国王送给她的钻石。

他在一九四一年继位。他父亲的出走，就象打开了潮水的闸门，政客和教士奔涌而来。他们蜂拥着他，向他提出建议，小心翼翼地使他处在一个完全受人尊敬的地位。自由选举使封建主义者和他们的盟友取得了多数。他们打算自主行事。国王对这种形势表示愤恨，但却束手无策。

伊朗曾被英国人统治过。它出产石油却所得无几，极端贫困。英国占领伊朗南部，俄国人占领伊朗北部，使伊朗又回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的状况。议会挑选的大臣都是名士。他们重视同大国的关系，置国王于严密监督之下。

年轻的国王受到窒息。他需要漂亮的一击，以便在公众中改善形象，并重新取得自信心。这个机会同阿塞拜疆问题结伴而来。俄国人并不急于从阿塞拜疆省撤走，那儿已经建

立起一个亲苏的自治政权。由于受到国王的压力，俄国人最终撤走了。国王本人亲自挂帅，于一九四七年重新占领了这个地区。

从一九四九年的暗杀企图到摩萨台的倒台

一九四九年，国王赢得了勇敢勋章。在一所大学的开学典礼上，一个摄影记者走近国王，连开数枪，擦伤了他的面颊、耳朵和肩膀。国王奇迹般地死里逃生。多年之后的一九六五年，一个卫兵端起自动枪向他瞄准，他又一次大难不死。这就产生了关于他的“不屈不挠的勇气”和“受到神的保佑”的两个共生的传说。

国王的随从中间有人认为，由于议会的至高无上，议会内多数派的变换和政府的软弱无力，有利于共产党的发展。这些人利用这种事态，鼓励国王踏着他父亲的脚印，谋求个人权力。他们指责左派政党对未遂的暗杀事件负责，并借机禁止了他们的活动。封建势力被告诫要同国王站在一起，以便制止“颠覆活动”。英国及其石油公司英伊石油公司——该公司合同即将期满——打国王这张王牌，因为只有国王才能够同它再签合同。

国王则尽最大努力把军队拉到他的身边。一九五〇年初，他看来控制了形势。但是，政府同英伊石油公司的谈判，此时正进入一个关键阶段，主要集中在公司是否给伊朗政府增付费用的问题上。在议会里，一个以穆罕默德·摩萨

台为首的民族主义组织，抨击这些交易，要求对油田实行国有化。摩萨台通过公布处于微妙阶段的谈判情况以及英伊石油公司的阴谋，掀起了一场抗议风暴，特别表现在市场上。与此同时，什叶派教士也担心伊朗会重新回到礼萨国王的时代。国王以自己新的权威为武器，要军队的铁腕人物拉兹马拉将军行使权力。几个月之后，一九五一年三月七日，正当他在国王清真寺参加葬礼时，一个狂徒开枪打死了他。国王立即让他的一位支持者侯赛因·阿拉接替。当煽动者威胁要继续大干时，国王最后屈服于压力，尽管国王痛恨摩萨台，也只好任命他为首相。（有几次我在场时他把摩萨台说成是为英国人卖命的“走狗”。）

摩萨台迫使议会一致同意支持石油国有化，并让国王签署这项新法律。这就在全国掀起了一股热情的浪潮。他的吸引人的品格，虚弱的身体，以及穿着睡衣卧在床上接见最重要客人的习惯，使他名声大噪。爱德华·埃里奥特那时在谈起摩萨台时说：“他的身体非常糟糕。”

一些伊朗观察家怀疑，鉴于外国势力在幕后操纵，世界市场上非英国高级公司，正在推动伊朗中断同英伊石油公司的合同。尽管如此，当民族主义甚嚣尘上时，伊朗统治阶级和许多外国，变得紧张起来，再次转向支持国王。当时，中央情报局提出了发动政变的想法。一九五三年，克米特·罗斯福访问德黑兰，研究发动政变的可能性，并找到了一个可能的候选人。他发现法兹洛·扎赫迪将军很中意。阴谋策划者们让国王签署任命扎赫迪为首相的法令之后，就安排他离

开伊朗。为了搜罗一支文职人员组成的突击队，以便同军队一起行动，扎赫迪用中央情报局提供的金钱，收买了著名的“祖尔汉”（一家传统体操俱乐部）的班主沙班一比一马赫（照字义是讨厌的沙班的意思）。他们在一九五三年八月采取行动，不到一天就解决了问题。然后，国王凯旋而归。那些追随摩萨台直到最后一分钟的人，也都匆匆赶到机场，匍匐在国王面前，亲吻他的靴子。

尽管美国人自己透露了这些事实，国王还是喜不自胜地认为，一九五三年政变是一次“群众革命”。这次“革命”给了他对人民的委托统治权。显然，他后来总是相信他自己的这番宣传。国王已经表现出歪曲事实真相的倾向。这把他推向同这个国家现实隔绝的极点。

走向专政

但是，国王一九五三年的胜利，还留下一些事情有待完成。这次胜利并非万事大吉。法兹洛·扎赫迪开始成了一个令人讨厌的人。腐化之风再次横行。镇压，特别是对人民党内的共产党人的镇压，达到了难以想象的程度。此外，国王发现在许多方面又受到了束缚——这种局面很不中他的意。他企图除掉他的这位首相。在这个节骨眼上，扎赫迪将军的儿子阿德希尔——他在准备和实施政变过程中起了重要作用——爱上了芙吉娅所生的莎赫纳兹公主。他父亲鼓励这门亲事。他们结婚了。国王利用这一局面，任命他的女婿为驻华

盛顿大使，取代阿里·阿米尼。

扎赫迪将军患了心脏病。他被要求辞职，由宫廷的一个马屁精埃格巴尔博士接替。埃格巴尔在给国王的所有公文中都签上“准备牺牲生命的奴隶”几个字。一些无礼的公众给他起了个外号叫“带耳环的奴隶”。

扎赫迪将军成了伊朗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的常驻代表。他没有抱怨——他喜欢日内瓦及其附近的赌场。国王给他买了一处庄园，他可以邀请朋友们到那儿聚会。除了递交国书的那一天之外，他从不踏进国联大厦半步。（他的这项任命说明了这个政权的一个典型特征：使用“官职”作为罢免或犒赏那些为国王效劳的人的手段。）

阿德希尔对父亲被解职当然感到恼火。一位要求不公布姓名的朋友向我讲了下面的一件事：一天晚上，阿德希尔喝醉了。他在几个人的面前侮辱国王，骂他是一个“忘恩负义的人”。我的朋友说，阿德希尔还说，他偷偷地在瑞士银行存放对国王有害的文件，将在适当的时候取出来。

与此同时，国家的经济形势继续恶化。摩萨台被赶下台之后，石油开采交给了一家西方公司财团，它们付的钱比过去多了（利润的百分之五十）。可是贪污和无能，常常消耗掉这个国家的收入。伊朗再一次处于破产的边缘。

新贵阶级同封建地主的权力发生冲突。不动产投机，产生一种不健康的气氛。伊朗全靠美国的补贴才得以生存。因为没有银行，缺少流动现金的生意人就向市场上的商人借债，利息高得使人不敢相信。失业在增加。社会和政治动乱

在增加。由于形势所迫，又受到美国的压力（美国另一方面又答应提供进一步援助），国王把政府交给了阿里·阿米尼。阿米尼不打算把实权留给国王。他的农业大臣阿桑贾尼制定了进行土地改革的第一步措施。这只能招致大地主和财产投机商的敌视。阿米尼政府寿命不长。他被国王的一个忠实支持者阿萨杜拉·阿拉姆所取代。

从此之后，通向专政之路被廓清了。余下要做的，不让有独立思考能力的人担任关键职务就是了。国王制定了一个草率的土地改革计划，基本内容以阿米尼内阁所进行的调查为依据。现在，他的随从和政府里的“老班底”，认为他太“革命”了，提醒他不要匆匆忙忙搞现代化，而国王干脆打发他们退休，扫地出门。

一九六三年，教士和市场上的商人，试图煽动暴乱，但是遭到血腥镇压。霍梅尼鼓动骚乱反对土地改革而被逮捕，接着又被流放。在伊朗南方，卡什凯部落的首长带头造反把矛头指向军队，遭到失败，也走上了流亡之路。

现在，国王感到家里安全了。在一次公民投票中，他的土改计划受到百分之九十五以上多数人的赞成。为了避免“老班底”卷土重来的可能性，国王委托政府组成一个年轻技术人员组成的小组，由阿里·曼苏尔牵头。

国王使挡住他前进道路的每个政治和社会组织保持了中立。他从军队中清除了全部有嫌疑的自由思想家，并象一切独裁者一样，依靠一支强大的、矢志不渝的军队、一支残忍的秘密警察、一批由他牢固控制的政客和一批只关心技术的

官僚。

就这样，他除掉了持有不同观点的合法的代表。他撤换了在各级的一切有嫌疑的敌手，封住了知识分子、政界人士、报界和议会——事实上是全体人民的口。

从此之后，他的绝对权力是不容争辩的了。但是，鉴于他有一个进步的计划和一套实施的办法，大多数人民给予他的，如果说不是信赖的话，那么，至少可以说他们认为国王是清白的。事实上，他刚开始时，并不滥用他的权威，而且行为象一位专制而又“开明”的君主。在那个引人注目的恢复时期，我在法国两次见到国王。

我同国王的第二次和第三次会见

一九五九年，国王应戴高乐将军的邀请访问法国，我第二次见到了他。那时，我脱离外交部多年，正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工作。可是，我却陷入王室来访的双重礼宾活动中。第一，我应我们驻法国大使纳斯罗莱·恩蒂扎姆的要求，为国王起草了若干讲话提纲。第二，我作为法伊协会副主席，应邀出席宴会。一天，我必须陪同协会的筹备指导委员会的法国成员，出席国王的接见。国王当然没有认出我，他象对其他人一样，同我握手并用法文同我讲话。我没有透露我的身分。国王同大家讨论法国和伊朗之间的文化关系的重要性。当我们离开时，国王转向恩蒂扎姆大使，用波斯语沾沾自喜地说：“我的关于文化的讲话，真的把他们说得困

团转，不是吗？”

我第三次会见国王是在一九六二年，当时他前来巴黎主持伊朗七千年艺术展览会开幕式。这次他由法拉赫王后陪同。我作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一名伊朗官员，由该组织总干事介绍给国王，并且在他念我给他起草的讲话稿过程中，一直奉陪到底。我还出席了他招待戴高乐夫妇的宴会，但没有同他讲话。同前两次会见他时相比，我觉得，他看起来自信多了。鉴于我只是从这个远离祖国的地方观察伊朗事务，我当时还不知道他正准备实施他的改革，并且就要建立起他对政府的完全权威。但是，他的举止意味着他总的作风有了巨变。

我回到外交部后，在私下接见和正式接见的场合中，我常常有机会见到他。尽管他处于无可争辩的领导人地位，他仍然允许提出不同意见，甚至表现相当和蔼可亲。但是，从七十年代开始，国王的性格起了变化。在他统治的末期，本性终于暴露了出来。

一九六五年的宫廷

国王笃信他的“白色革命”。一九六五年二月，我回到德黑兰几天之后见到他时，他以听起来令人信服的话语对我说：“我们必须都忘掉过去的分歧，团结起来，把国家从不发达的状态下拯救出来，并保证为子子孙孙创造一个光辉的未来。”他坐在他妹妹阿什拉芙公主别墅的一张大理石桌子

旁，双手垂放在大腿下，小腿来回摆动。“我要比左派还要走得快，”他保证道，“你们都必须跑步才能跟上我。所有旧的经济和政治封建主义都已经过去，完蛋了。每一个人都应当直接从他自己劳动的成果中获益。这就是我进行土地改革的目的。对工人来说，我们将规定利润分成。”他站起来，重新又去打桥牌。接着他又补充道：“所有的年轻人都必须（从国外）回来，参加我们伟大的工作。”他的谈话用词，在很大程度上都同任何一个共产党领导人毫无二致。

在那些日子里，阿什拉芙公主做了一件特别的工作，就是号召左派分子浪子回头。在青年人方面，他们由于多年没有活动而感到沮丧。他们看到国家得到西方支持，最近又受到东方的追求，象别的人一样，相信政权稳定。他们觉得没有别的选择，只有参加运动，希望从内部实现民主化。

宫廷生活自然带着某种简朴的色彩。国王的兄弟姊妹举行的自助晚餐，同德黑兰或世界上任何一个城市富裕中产阶级成员举行的宴会，没有什么两样。饭后，有些人打扑克，其他人看电影。我要补充说明的是，这些表现是相当缺乏文化修养的。我作为《电影手册》的前评论员，对国王特别爱好反间谍惊险电影或者路易·德·菲奈斯^①的喜剧，感到吃惊。

一天晚上，放映科斯塔—卡伏拉斯^②的电影《Z》。这

①路易·德·菲奈斯，法国名喜剧演员，主演过《疯狂的贵族》等影片。——译者

②科斯塔——卡伏拉斯，法国电影导演。——译者

是一部关于一个希腊上校发动政变的虚构的故事片。我记得是在法蒂玛公主（她丈夫是空军司令）的家里看的。不到半个小时，愤怒的国王下令停映。当然，这部电影从未公映过。电影发行人总算避免惹起一场大祸。

在这些招待会上，客人们常常在手臂下夹着文件卷宗前来出席。他们等国王的赐见。同国王在私下里呆上几分钟，出来时喜形于色，估计国王已经授与他们需要的“上方宝剑”。我对这种马马虎虎处理国事的做法，常常感到愕然。

尽管在王室成员之间表面看起来是一派团结，实际上并不互爱。他们并不都是一母所生。在宫廷内部，他们差不多是公开互相中伤。我经常发现他们在聚会后背后相互说坏话，开始时觉得开心，后来想到他们之间的争斗影响国家大事时，又感到心情沮丧。每一个王子和公主都有一个小宫廷和一大帮佣人。就象一块石头投进水池泛起一层层涟漪，敌意在廷臣中间蔓延开来。

至于做生意，王子和公主当然一开初就有份，但规模不大，而且是在私人部门，同许多人一起合作。国王只是对他们保持警惕。但是这种情况渐渐发生了变化。石油价格的突然上涨，刺激了胃口，难以遏止。“上梁不正下梁歪”。伊朗一九七七年的情景，就象一群饿鼠吞噬一块肥肉一样。

国王的弱点

国王对他家庭成员表面上的严厉态度，慢慢地软了下来。

今天，我在回首往事时，国王的许多弱点相当清晰地浮现在眼前。例如，我感到他性格中有一种强烈的嫉妒成分。一九六一年，他憎恨阿里·阿米尼的成就。阿米尼虽然已被解职，但他仍保持同国内外政界人物的联系。一九六七年，德黑兰一下子出现大量谣言，说他重新掌权已近在眼前。我在国王的一次接见时把这些谣言告诉了他。他耸了耸肩膀，并拉长了脸。“阿米尼不是一个真正的政治家，”他对我说，“我任命他当首相，他第一次公开讲话就宣布伊朗破产了！一个政治家不能那样说话。这只能引起人们不必要的惊慌。”他皱着眉头，又说：“此外，我那时访问美国，无论到哪儿，人们总是一个劲地打听我的首相健康情况——好象我本人无足轻重似的！”

国王总是抓住无关紧要的琐事不放，然后让人们痛恨这些事情。一九六八年，我们讨论将于五月在德黑兰召开的联合国人权会议。我提名纳斯罗莱·恩蒂扎姆为伊朗代表团团长。他耸耸肩膀说：“有什么不行呢？”停了一会儿，他又说：“是的，但是，这些人不知天高地厚。一九五〇年，他当联合国大会主席。我到联合国时，他觉得自己是联大主席，就可以免去吻我的手的义务。”

他讨厌纳赛尔，纳赛尔在讲话中攻击过他。每逢他在场时，只要提到这个埃及总统的名字，他就感到紧张。他批评美国民主党人；批评罗斯福，是因为罗斯福在一九四三年强迫国王去见他，而斯大林却不辞辛劳前来看他；批评肯尼迪，是因为肯尼迪瞧不起他。伊朗是世界上设有“战争部”

的唯一国家，其原因是：摩萨台当政三年期间，把名字改为“国防部”，而国王不能忍受他的这位前首相的一切。

对于深得众望有前途的人，他都不能相容。德黑兰有些人士觉得，国王对一九六五年十二月曼苏尔被暗杀，并非真的感到不快。曼苏尔是一个雄辩家，太出类拔萃了。在石油国有化以后，摩萨台同群众一起取得巨大成就，这使国王大为光火。他甚至妒忌自己的妻子。他妻子天赋的人情味，博得人们爱戴。一九七三年的一天，王后发表一次非常成功的演说，抨击阿谀奉承，赞成言论自由，电台进行了广播。国王指示我哥哥：“告诉我的妻子，她不能那样讲话。”我哥哥把这件事告诉了我。“我可怎么办？”他问我。“我怎么能和他们中间进行干涉呢？他本人不敢做的事，就推给别人。”

除此之外，在他性格的其他方面还可以观察到一连串的矛盾，所以人们听到有关他的各种各样的看法。迪安·腊斯克认为，如果说他不是天才的话，那么至少是世界上仅次于美国总统的消息最灵通的人。亨利·基辛格认为，他是一位专断而开明的国王。威廉·西蒙（当时任美国财政部长）认为，他是一个“怪人”。辛西娅·赫尔姆斯（前中央情报局局长和驻德黑兰大使的夫人）认为，他是一个复杂的人，充满矛盾^①，等等。

对所有这些判断，还可讨论。不过，为了做到客观，我

^①一九七九年一月十七日《纽约时报》，——作者

必须说明，他性格中的消极因素，直到他统治的末期，特别是最后八个月，才暴露出来。

事后再回过头来看，我感到，他的最大弱点表现在他同家庭成员之间以及同朋友的关系上。他的兄弟姐妹，外甥和侄儿，弟媳和妹夫，常常是为所欲为，而他朋友的行为举止，也损害了国王。但是，国王总是宽恕他的家庭成员以及贴身随从。加之，他虽然不害怕自己的文官武将，但他却不敢为这种关系制定法规。这项任务总是推给别人。例如，有一天他出席观看陆军演习，他发现他的弟弟古拉姆·礼萨满脸都是连鬓胡子。他转向当时的宫廷大臣阿拉姆，要他告诉他弟弟，要么把胡子刮掉，要么辞去陆军中的职务。

另一件事牵涉到他的前礼宾首脑。有报道说，此人正在出售装饰品，以换取漂亮的“礼品”，生意兴隆。国王命令将他解职，并提出起诉。但是，当王后母亲立即干预时，国王就把他放了，只是说了一句这个人以后最好别在他眼皮底下出现了事。

几年前，他参观一所新建的医院，由我的一个叔叔陪同，当时他在宫廷工作。所有的病床都住满了，医生和护士在忙忙碌碌地照料病人。当他们即将离开时，我的叔叔返回去拿他忘在病房里的帽子。他发现病床空空如也，那些所谓的病人已无影无踪。他们都是为这次参观专门雇来的。当我叔叔向国王汇报这件事时，他只是耸耸肩，说道：“不要打扰我，别说它了。”这里，他完全不象他的父亲。礼萨有一次命令所有的省长，在他们所管辖的地区植树。事情是这样

的：一天，他看见阿巴丹路旁沙漠中有一处棕榈林。他停下车队，向陪同旅行的该省省长表示祝贺。然后，他脱下军帽，深深地吸了一口气，靠在一棵树上——这棵树立即给压倒。为了使礼萨·汗获得深刻印象，这位省长只是把棕榈树临时插在沙子里。国王拿着手杖把他赶跑，后来又将他解职，关进监狱。但是，在许多方面，父亲和儿子又很相似。

有其父，必有其子

礼萨国王同时有三个老婆。他的儿子先后有三个老婆：芙吉娅、索拉娅和法拉赫。关于前两个，我所知道的一切都是别人告诉我的。她们都憎恨丈夫不忠诚。据说，一九四四年，芙吉娅当场抓住正在同情妇作爱的国王。从那以后，他们之间的关系就发生了龃龉。一九四五年春天，芙吉娅借口回埃及探亲，离开了伊朗。她再也没有回来。过了一些日子，宫廷发表一项公报宣布他们离婚。

一九四六年，我被派往伊朗驻巴黎大使馆工作，再也听不到德黑兰上流社会的小道消息了。一九四九年，莎姆斯公主和她的丈夫来到巴黎，随身带着一大群狗。公主由一位长着一对明亮的大眼睛的羞怯的少女陪同。同往常一样，我在机场给他们办手续，我从护照上知道她的名字叫索拉娅·伊斯凡代尔·巴赫蒂亚尔。只是在后来，大使才传出消息说，她将是国王的第二个王后。她母亲是德国人。我接到指示要给她买德国最佳小说的选集。在我寄往德黑兰的书中，有一

些是托马斯·曼^①写的小说。不久，我被惊慌失措的大使召去。“你干了些什么事呀？”他咆哮着说，“你寄的是一个共产党作家写的书！”我进行解释，但是没有用——世界文化对伊朗上流社会没有多大用处。

婚礼是在古利斯坦宫举行的。光彩夺目的场面，可以同《一千零一夜》描绘的相媲美。当一九五八年轮到索拉娅从德黑兰出走时，她身后留下大量谣传。有的说，国王娶第二个老婆是为了将来把王位传给他的儿子，以保证王朝香烟不绝^②；也有的说，她当场发现了国王的丑事。因为国王的私生活不值得我费神，所以我不关心索拉娅的故事和宫廷的流言蜚语。

只是到后来，我才听到关于宫廷奇遇的一些反映。一天，我正在外交部，阿德希尔·扎赫迪大臣要我和其他几位同事，陪一个非常漂亮的欧洲人去吃饭。这些同事告诉我，扎赫迪和阿拉姆（当时的宫廷大臣），擅长给他们的客人安排娱乐。我从未设法核实这件事。但是第二年在纽约，我碰巧遇见一位女朋友。她在德黑兰教过一段时间英文。她告诉我，在德黑兰期间，阿拉姆邀请她到他家里参加鸡尾酒会。他接待十分周到殷勤，把她领到一间休憩室，结果房间空无一人。阿拉姆告辞，再没有露面。突然一扇门打开了，进来的竟是国王。经过一番尴尬乏味的谈话之后，这个年轻女人请求让她离开。

^①托马斯·曼（1875—1955），德国著名小说家。——译者

^②国王的第一个妻子没有生男孩，第二个妻子没有生育。——译者

对于法拉赫王后，我所认识的人，没有一个人不说她好。人们对她的钦佩，不仅是由于她的美貌，也是因为她的聪颖和正直。他们说，正是她，向艺术和文化打开了王宫的大门。一九六五年我回到伊朗之后，我很快证实了我听到的东西。我甚至常常想，她生活在难得有人翻翻书、艺术遭到鄙弃的环境之中，究竟有何感觉？虽然她不再作为一个知识分子，但是她知道，让一个文化或科学人才得到发展的机会，是多么重要。但是国王难得认真地听取她的意见。

穆罕默德·礼萨·巴列维身上，也有他父亲性格中的其他重要特点，例如守纪律和努力工作，以及主要对军队的组成和组织感兴趣，等等。人们发现，他们父子有时富有同情心，有时又极端残忍。礼萨国王有时会把自已从前的伙伴关押起来，把他们杀掉，其他人被流放。而他偶尔又表现仁慈。有许多次，他的儿子答应了有人提出的予以宽恕的请求，但是对处决人同样并不过分感到不安。他在位时处决人比老子在位时更平常。当然，在他的统治结束时，他的每一个同事，又都落入了刽子手的掌心。

巴列维国王象礼萨国王一样，也日益变得与世隔绝，甚至同他的家庭隔绝。除了各种外国人之外，他只同为数极少的人交谈。这就使宫廷的礼仪变得越来越沉闷。

巴列维的财富

礼萨国王对财富并不是不喜欢的。我前面已提到没收了

庄园。他儿子怎么样呢？他有多少财产？报纸上提到了一些近乎天文的数字。例如，记者安·克里坦登认为，根据银行界人士说，国王的个人有价证券超过十亿美元。过去两年中，属于王室的二十亿至四十亿美元中的相当大部分，从伊朗转移到了美国^①。而据谣传，国王财产最重要的来源是“巴列维基金会”。它被认为是国王的个人封地。

去年秋天，一个持不同政见组织写了一份报告声称，“巴列维基金会”和王室成员，在伊朗大部分商行中拥有股份。这个报告——显然我没法核实——附有一份投资表。我姑妄信之。报告说，基金会和王室成员，在十七家银行和保险公司、二十五家冶炼厂、八家矿业公司、十家建筑材料厂、四十五家建筑公司等，拥有相当大的股份。

王子和公主通过他们建立起来的各个公司，抽取大量佣金或利息。一九七八年十二月末，德黑兰流传一份名册，详细披露了这些活动。这份名册特别揭露了阿什拉芙公主（或者她的儿子），在同国际GNPS财团签订的合同中，在政府全部购买的达索公司的“神秘20式”飞机中，在由布朗·鲍威尔公司承建大型热电站的合同中，在向沙哈尔巴哈尔港提供设备的合同中（由布朗和鲁特公司承包），抽取佣金。这份名册还揭露：卡拉杰公路决定改道，是为了穿过莎姆斯公主经营的房地产，她准备把这块房地产出售给私人买主；伊朗“红狮与太阳会”付给莎姆斯公主旅费；马哈茂德·礼萨

^①一九七九年一月十日《纽约时报》。——作者

得到特许种植鸦片，在黑市上出售；古老姆亲王在德黑兰南部拥有建造公寓的地产；阿卜多雷扎亲王因帮助日本公司而获得佣金，他还卷进了纤维纸板厂和德黑兰地下铁道工程的丑闻，等等。当然，我不可能去核实所有这些说法，但是公众特别愿意相信。

一九七七年，我哥哥给我看一些证明王子们进行非法商业活动的文件。我说“非法”，是因为在一九五九年，国王禁止公务人员和他的家庭成员从国家事务中获取财政利益。我哥哥把他知道的情况告诉给国王，但是，照例他的手还是被束缚住了。一九七一年，有一次国王的确允许我哥哥关闭一些不动产机构。这些机构属于王子或者宫廷中身居高位的其他人。但是，这一次行动的结果是短命的，而且导致整个王室竭力反对我哥哥。阿米尔·阿巴斯被任命为宫廷大臣之后，他对开办赌场感到震惊。他想禁止，先从阿什拉芙公主拥有股权的一家赌场开刀。一九七八年八月，在他辞职前几个星期，他把建立这个赌场合同的影印件送交法律审查，寻求通过正当法律程序将它关闭的途径。赌博是违反伊斯兰教法规定的。他认为，如果允许赌博，不仅对国王，而且对全国，都会带来危害。他的离职意味着这个问题不了了之。

总之，王子和公主在他们的商业交易中，获得巨额利润。这在全国已是公开秘密。这种新闻对国王的声誉损害很大。我在一些美国朋友的家里碰到一个印度人，他对伊朗问题很熟悉。他说，王宫垄断的最好的赚钱机会，太多了。王室把私人部门的所有人变成了敌人。他们发现，赚钱的机会

都被王室抢走了。他说，这种情况同桑贾伊·甘地^①的商业冒险相似。

家长作风

家长作风是国王性格中的另一个因素。一九六九年秋天他访问纽约时，我有机会目睹了这种作风。他在我们大使的华道夫托尔斯的宅邸举行私人午宴，招待当时的联合国秘书长吴丹。当时我在纽约，是伊朗出席联大代表团成员。我同外交大臣阿德希尔·扎赫迪一起前往赴宴。

扎赫迪显得很高兴，午宴上万事如意。国王感到愉快，并向我们祝贺。可是在甜食上出了问题。我知道陛下不喜欢吃糕点，而喜欢吃冰淇淋，所以我悄悄地给胡玛（我们大使夫人）递了一张纸条。但是他们只给国王上了冰淇淋！这没有关系。吴丹不在乎。可是侍者头儿没有给国王和吴丹同时上菜——我后来告诉了他们应当同时上菜。除此之外，一切安排顺利。国王表示满意。但是我们得找一些更时髦的侍者。当我问起餐桌上的谈话时，扎赫迪有些不知所措。他一直注意的只是如何搞好这次招待！

（扎赫迪会成为一个顶呱呱的侍者头儿。他的市侩作风甚浓。一九七〇年一月，我陪他和其他各位同事去见国王，讨论巴林问题。扎赫迪受到国王好一顿挖苦。国王对他说：

^①印度总理英迪拉·甘地的次子，一九八〇年死于飞机失事。
——译者

“你什么也不懂。你就象堂·吉诃德以为可以用木剑进行战斗！”接见结束时，扎赫迪忧郁地对我说：“他说我象堂·吉诃德，是什么意思？此人是谁？”）

后来，瓦吉勒大使来了，他宽慰地笑着：“你们知道吗？国王向我祝贺。他告诉我，他对我的工作表示满意。”

接着，我们驻纽约的领事也过来了。他喜出望外：“你们猜猜国王说了什么？陛下就领事馆提供的便利向我表示祝贺。他认为我满中意！”

我好象是回到了幼儿园了。孩子们因为父亲在自己的头上拍了拍而欢喜雀跃。听了父亲一句慈爱的话，他们会跑上一英里。到王宫去恍如回到了童年，国王的家长作风远远超过宫廷本身的界限，已经扩大到社会上。（奇怪的是，新政权也盛行家长作风。阿訇如果不是人民的引路人和父亲，那又是什么？这毫无疑问起源于我们祖先的传统。在伊朗的传说中，不象希腊奥狄浦斯^①神话，而是英雄鲁斯图姆杀死自己的儿子。换句话说，他不让他儿子长大成人，成为掌握自己命运的主人、一个不受约束的人。正是反对依赖这种令人窒息的家长作风，伊朗青年起来造反了。我们的青年人能屈服于一种新的家长作风吗？）国王没有看到这种迹象。他的自由化政策是在自己与人民之间已经有了一条鸿沟的时候实行的。因此，人民对待自由化政策，不是表示怀疑，就是完全冷漠，因为六十年代末在他性格中发生的变化，勾销了人

^①误杀父亲并娶母亲，发觉后自刺双目而死。——译者

们对这一行动的所有信赖。

巨大变化

到现在为止，我一直试图用事实和依靠我自己的记忆，来描述国王性格中的某些特点。其结果是一幅力量、勇气和软弱三位一体的图画。总的来看，他同别的人并没有非常大的不同之处。他除了自命不凡之外，多少还是以正常的方式对待自己的坎坷生涯。他的境况并不总是那么顺利，但是在七十年代初期之前，他处理出现的任何问题，似乎没有多少困难。同所有的人一样，他也有喜怒哀乐。自然，鉴于他所处的地位，这种变化事关国家事务，不过这种情况在任何地方都会发生。他不允许拉拉扯扯，倾向于同别人保持距离，甚至同他的朋友和家庭成员也是如此。考虑到他的地位，这也是可以理解的。

现在清楚了，国王的性格在著名的波斯波利斯庆祝活动之后，产生了深刻的裂隙。要准确地说出产生裂缝的日期，是困难的。尼克松一九七二年来访可能是关键性的。另一个关键时期是一九七三年至一九七四年，当时石油价格上涨四倍。但是，在这些日子很久以前，就有明显的迹象了。

国王性格中的变化如何确定呢？我是从他决策时的僵硬，与现实的脱节，以及对人情因素的冷淡来确定的。无疑，这常常使掌权时间很久的独裁者或政治家苦恼——例如佛朗哥和晚年的斯大林。可是国王相对来说仍然年轻。是过

早的动脉硬化吗？还是权力狂？我说不准。

一九七四年之后，他多次对记者发表讲话，有时使人毛骨悚然。他怎么能承认要用心理压力的办法，代替人身拷打呢？为什么要尖刻地谩骂西方颓废呢？为什么讲一些毁谤妇女和教士的话呢？又为什么指控摩萨台是英国的一个“十足奴才”呢？同时，在讲话中，用同一个国家元首地位不相称的粗鲁方式，也使他的话开始失去分量。他不再注意人们对他接见所产生的感情，也不再注意公众舆论。他越来越使人感到他是生活在他自己的空想之中。

是精神分裂症吗？是妄想症吗？是夸大狂症吗？我写这几页的目的，不是为了诊断国王的病，而是为了强调他性格的变化，把事情弄个明白。

早在一九六九年，国王就发表了一些异乎寻常的声明。查看我的日记，我发现如下的记载，日期是一九六九年十月二日：

现在国王看起来有点被他自己的梦想冲昏头脑了。他生活在他为现实设计的“宏伟蓝图”之中。两天之前，他向军官团讲了一次话，大意是，一旦发生敌人侵袭，我们就实行“焦土”政策，因为如果我们在一九四一年就这样做，我们本来不会遭到入侵。伊朗那时能烧光什么呢？盟国进入伊朗不是为了占有它，他们需要的是—条补给线。他甚至把过去的现实，转变成他的宏伟蓝图。他肯定，头脑清醒的人侵犯了他的权利，他不能容忍同他的梦想相抵触。家长作风的影响越来越大。转

向注重排场和礼仪……可是他没有先父的权威。这个民族大家庭将会四分五裂，把许多各种各样的元素都粘在一起的结合剂将会失去效用。这是第三世界公民的普遍社会问题，伊朗也不例外：他们发现自己处在既希望自己独立成长，又想要一个父亲来保持国家统一的夹缝之中。

我相信，我在一九六九年的分析特别适用于目前形势。我在一九四五年写的一篇文章中指出，伊朗的全部历史，反映了封建主义和中央集权两个原则之间的长期斗争。这种斗争产生了暂时的力量平衡。这种平衡每隔差不多有规则的时间，就不可避免地被打破。我提出了如下的问题：“过去四十年中出现的这种新平衡，也一样脆弱吗？或者恰恰相反，会演变成一个牢固的综合体，代替过去的形式，终于带领我们沿着进步的道路前进，从而弥补几个世纪的耽误吗？”（文章的标题是《伊朗封建主义的危机》）而在一九六五年，我真的相信，国王正带领我们沿着正确的方向前进。那时看来，他似乎对我二十年前提出的问题正在作出积极的回答。那就是为什么我和许多朋友决定，尽管我们的政治观点不同，还是回来参加国家的经济发展工作。不幸的是，国王性格的变化和他幻想建立一个新阿契美尼德王朝，使他改变了正确道路。

还是回到国王与日俱增的狂热的主张问题上来。让我们从他的最后一本书《走向伟大的文明》中，任意摘录几段。这种例子书中俯拾即是：

如果超出君主命令的范围，在我们国家不可能发生深刻变化。

君主政权作为灵魂、精髓、实体、力量的源泉和国家主权和统一的根基，是伟大的文明的坚实基础，是它的所有价值、进步以及物质和道义利益的强大保卫者。这个政权将在伊朗人民最辉煌的阶段引导和保护他们的命运。

我领导我的人民，沿着这条美妙的命运之路前进，因为我感到，唯有这条路才能保证他们的尊严和幸福。由于对这条路有绝对信心，我有责任为国家制定这样一个目标。我不仅是作为对国家命运负责的人，而且也是作为父亲、引路人和每一个伊朗人的朋友。

三十七年以来，我把自己全部精力献给了我们的人民。只要神的意旨承认我的使命，我将坚持不懈。多亏神的恩惠，我开创的路将在我百年之后继续向前伸展。除非人类文明彻底毁灭，否则，没有任何东西能阻止伊朗人民沿着自己的道路前进。

人民参加处理国家的全部事务，人民管理人民的政府，现在已是各级社会生活的现实。伊朗人民自由地选举合作社、农村委员会、地方法院、城镇和地区议会和仲裁委员会的代表。在更高一级，人民直接参加复兴党的选举和派代表参加议会两院。象真正的民主要求的一样，他们通过各级党的机关报以及通过报纸和宣传工具，完全享有自由表达意见的自由。

为了认清国王在他当政的最后几年，在多大程度上陷入他自己想象的那个世界，整本书都应该读一读。令人震惊的事情来得更引人注目，这是因为不可能从更高的角度看到他有时采取的大大超过犬儒主义的政治现实主义。因此，在一九七五年，他突然决定放弃库尔德人，以至基辛格和他的同事都感到震惊。在分享阿拉伯河水这个伤脑筋的问题上，在同伊拉克发生多年冲突之后，国王在阿尔及尔参加石油输出国组织会议过程中，一夜之间就同邻国的铁腕人物萨达姆·侯赛因达成了妥协。一夜之间，他抛弃了库尔德叛乱领导人穆拉·穆斯塔法·巴尔扎尼的支持者。当世界舆论指责他走回头路时，他只是耸耸肩膀，若无其事地解释说，库尔德人不想打了，他们太累了！

这个故事清楚地展示了他处理国家事务的做法。他单方面作出自己的决定，甚至不屑于向国内或国外的舆论预先透一点信息。他从心底里看不起自己的同事，正如他看不起整个世界一样。他接见记者时，常常把他的同事说成是“我手下的人”。他的个人利益——他欣然同意与国家利益搅和在一块——第一，至高无上。根据他无限的利己主义，国王作决定，其他人只得服从。

伟大中的伟大

石油价格上涨之后，国王感到有资格随心所欲了。他的举止开始象世界上的“伟人”一样。他常常去偏僻的避暑胜

地考虑未来，回来时带着全盘计划。他就这样在一九七六年想出了“伟大的文明”。关于“伟大的文明”，他在自己写的书中是这样概括的：“它最大限度发挥人的学问和见识，以便确保所有伊朗人的最高物质和精神标准。”简而言之，他重新复活了使伊朗跻身于世界最发达国家行列这个转瞬即逝的念头。这个目标是他的宿愿。一九五九年他对法国《费加罗报》记者吹牛说：“给我十年时间，我将使伊朗再次成为一个大国。”^①

他的狂想超越了国家的现实。中央情报局一九七六年的一个秘密报告说他是一个卓越而危险的夸大狂。他是一个夸大狂，这一点越来越清楚了。他所作的决定证实了他是危险的。

几乎直到他完蛋之前，他一直喋喋不休地宣称，他要在（波斯历）三千年开始之前，把伊朗变成“五大工业国”之一。他的“伟大的文明”，将作为第三世界和西方的样板，而对西方的“颓废”继续表示痛惜。在他性急地建设技术先进的工业过程中，他破坏了整个经济的平衡。他的军事欲望，吞掉了国家的石油收入，不是为了再生产。

他的盲目自信，建立在危险的简单化的看法基础上。有两点经久不变的想法迷住了他的心窍：有钱能使鬼推磨，伊朗的收入将不断滚滚而来。我哥哥和经济专家不同意他的观点，他就发脾气。

^①一九五九年七月九日《费加罗报》，——作者

他的夸大狂日益严重，态度变得僵化。人们对此感到不安。他认为反对派不足挂齿。他在一九七六年三月二十二日对《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记者说，反对派转而使用暴力，是因为他们通过宣传成不了气候。国王向人民摆明了自己的哲学。因此，他说，马克思主义者正在变得绝望。他毫不犹豫地对迈克·华莱士说，在美国，犹太人“院外集团”势力太强，它控制了报纸和宣传工具^①。他对伊朗舆论越来越置之不理。一九七六年夏天，我哥哥陪同国王乘直升飞机飞越里海附近的查卢斯上空。我哥哥指着下面的别墅说，那是萨瓦克负责人建造的，将以高价出售。“城里很多人在议论这件事，”我哥哥说道。“没有关系，”国王回答道，“这毕竟是投资嘛，那就好。”原来萨瓦克头头的土地是国王本人赐与的。

我哥哥俭朴的生活方式也使国王不快。有一天国王对他说：“你喜欢住在一只鸽子笼里！”

谈到人权问题时，国王有他自己的看法。这种看法与通常的国际概念是格格不入的，因为它不适宜使用“颠覆者”、“恐怖分子”、“卖国贼”和“赘疣”等字眼。一九七六年之后，世界上对伊朗政权监禁反对派，爆发了一片抗议声。可是，国王美梦犹酣，听不见。我记得，一九七七年夏天，王后在一次主要接见知识分子的场合就人权问题发表了讲话。所有在场的人都鼓掌欢迎。可是有几个人问我：“为什

^①迈克·华莱士文章《六十分钟》，一九七六年十月二十四日《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作者

么要对我们讲呢？她最好对她丈夫去讲！”

这就是发生导致国王倒台的那些事件几个月前的国王的
思想状态。他与现实之间真正存在一块铁幕。他使自己沉于
一种田园诗般的幻想之中，禁锢在马屁精充斥的宫廷之中。

一九七六年，他轻率地宣称，他已经荡涤了腐败之风。
当奥利维埃·瓦兰问他是否认为在伊朗搞共和政体已不可
能，他斩钉截铁地回答：“历史将遵循它自己正常的道路发
展。它在三千年和平与平等的局面下没有发生，甚至在共和
政体仍然时髦、代议制和民主意味着稳定的日子里，也没有
发生。那么，今天，我真的不相信，会有什么东西能使一个
波斯人相信，政权更迭会给他带来好处。”他不厌其烦地对
愿意听他讲话的人说：“反对党就是他自己本人。”

一九五八年，我在拍一部关于伊斯法罕的电影时，领着
摄影师登上了阿里——加普宫的房顶。在中心广场装潢华丽
的围墙后面，建筑物是用粗糙的纤细树干支撑起来的。即使
在阿巴斯王朝的沙法维大帝时代，君主看到的也仅仅是门
面。

他们垮台得更惨

同现实的脱离，加上笃信自己的黄粱美梦，使国王越来
越僵化。他坚信自己处于神的保护之下。在童年时代，他有
一次生病，第一个伊玛姆、先知穆罕默德的女婿阿里出现在
他的面前，救了他。后来，他被一匹马甩了下来，圣·阿巴斯

出现了，抓住他的胳膊，使他没有摔在石头上。再后来，他甚至见到了隐形的伊玛姆。“没有人能够伤害我”，他喜欢对人们这么说。他感到，作为君主，需要他深居简出和高高在上，通过情报机构保持消息灵通。对他来说，反对派的抗议仅仅是微弱反抗的毛毛雨，不过如此。他感到万事如意，人民高兴跟着他走。

他对自己命运的盲目自信和思想的僵化，使他无视温和的反对派达成妥协的每一个机会。当他终于决定寻求妥协的时候，已经来不及了。

当反对派在一九七八年加紧活动和扩大队伍时，他无动于衷。这是对他关于现实的看法的一次更猛烈的打击。现在，他的梦想既然已经破灭，他又感到空虚，无力作出反应。他有时心情沮丧，继续在他各种行动方针之间举棋不定，只好向他的贴身随从和美英两国大使求教。他通过把责任推诿给他的合作者，并寻求外国保护，很快把他多年形成的傲慢情绪丢得一干二净。

现在人们一致认为，在国王统治的最后八个月里，国王已经不起作用了。他听来访者讲话，但却没有入耳。他已经有很久一阵子保持沉默和不发布指示了。国家没有一个领导人能够对局势作出判断，并作出相应的对策，而这是一个更加严重的欠缺之处。因为王室专政，习惯于不让高级官员发挥自己的创造性，所以即使在最关键的时刻，他们也要等候指示，而这些指示却姗姗来迟。因为国王在建立他的最高统治的过程中，已经把他的随从中所有“难弄的”人排除掉，

所以现在没有人能接他的班。

这种事态在政府和军队里造成了混乱。而另一方面，反对派却越来越趋于联合，加强自身的团结。面对日益增长的反对力量，国王无可挽回地变得更加软弱了。曾经是伊朗无可与争的领袖的国王，突然成了一个摇摇晃晃的木偶，他的顾问们牵一牵线，他就动一动。巴赫蒂亚尔的一位朋友告诉我：没办法，王后不得不出来主持关于组成新内阁的谈判，国王退居一旁。总之，到一九七八年十一月，他的倒台已经是确定无疑的了。

一月十六日，在一个极端虚弱的时刻，他离开了国家，把大多数合作者——他们是在国王的指示下被逮捕的——丢在他的敌人手中。伊朗驻伦敦大使帕尔维兹·拉吉——此前是阿米尔·阿巴斯首相的首席私人秘书——告诉我，我哥哥有一次指着国王的像说：“他是一个自私自利的人。一旦他意识到你对他不再有用处，他没二话就把你抛弃！”

在这个政权存在的最后几天里，国王在摩洛哥，一些人感到莫名其妙的是，将军们从德黑兰给他打电话，向他请示他们应当采取什么措施。他拒绝同他们讲话。当国王的出走已成定局，我们的一位阿米尔·阿巴斯不认识的亲戚，通过一位中间人给国王去了一封信，要求把阿米尔·阿巴斯也带上飞机。但是国王没有回答，而让一个为他效劳十四年之久的人活活地被新政权谋杀了。他在被杀害的那一天，国王一声不吭。当他在三个星期之后动口时，不过是企图用蓄意编造的谎言为自己开脱而已。国王离开伊朗之前，没同我哥

哥联系。这我知道得很清楚，因为直到我哥哥决定向新政权投案之时，我一直同他保持着联系。事实上，国王并未提出把我哥哥救出去，而是我们的一些亲戚朋友，组成一支突击队，准备劫狱，把他偷运出边界。但是当我哥哥得到这个消息时，他火了。“我不想那么不光彩地逃走，”他说，“我不是一个胆小鬼。我献身于我的国家。我打算公开为自己辩护。”我哥哥和沙普尔·巴赫蒂亚尔共同的一位朋友，还告诉我们，国王在离开伊朗之前，批准了最后一届内阁首相提出的行动方针。为了挽救君主制度，巴赫蒂亚尔想说服议会批准实施刑法第八十二条（规定违反宪法者可以判处死刑），以便制裁国王要爱资哈里政府逮捕的那些人。在这个得到国王批准的方案中，巴赫蒂亚尔准备以滥用国王托付的权力为理由，要求判处我哥哥死刑。他天真地相信，这样就会使人民满意了，并且能使君主制度继续下去。我没有理由怀疑我哥哥和巴赫蒂亚尔的这位朋友的话，特别是，法国记者埃里克·鲁洛在一篇文章中，援引了“一位著名的法官和人权委员会成员”的话，也证实了这种安排。这个人在谈到巴赫蒂亚尔的打算时，对这位记者说：“他选择的这项程序，将使西方文牍主义者满意，而阿米尔·胡韦达会照样被枪决。”^①

关于国王长期统治过程中性格的演变问题，我就此煞笔。虽然我恨他有我个人的原因（他对我哥哥的死负有责

^①一九七九年六月十三日法国《世界报》。——作者

任，这是无可争辩的），我仍要保持尽可能客观。不管他最后的作法，对我，对其他人，造成的后果多么悲惨。但在过去，积极的一面，是不应当抹煞的。

对他不管还能说些什么，穆罕默德·礼萨·巴列维性格的发展，在六十年代初期，明显地显示出趋于成熟。一九六三年，他不怕任何危险和各种障碍，提出了一项革命改革计划，迅速改善了伊朗的物质形势。但是在前进道路上，他忘记了他原来的目标，他被初期取得的成功冲昏了头脑，他没有恢复从一九五三年政变以来暂停实施的宪法。他变得那么脱离现实，以致从一九七六年往后，他在处理国事中犯了严重错误，破坏了他自己为之奋斗而建立起来的平衡。

第四章 最后垮台

从国内角度来看，幸运的是，我没有什么可担忧之处。

——引自国王一九七六年十月三十日对伊朗《世界报》国际版记者的谈话

伊朗阿莫尔城，一九七八年十月二十九日，星期日

这个坐落在里海之滨的小城，被一片片柑桔林所环抱。这个城市群众的情绪越来越激愤。自从十月七日举行示威，警察开枪，许多人被打死以来，五花八门的谣言到处流传，紧张气氛不断加剧。阿巴丹雷斯电影院被焚毁事件，一直在这座城市的居民的脑海中打转转。现在，已肯定同萨瓦克挑衅分子有关。十月二十七日，人们悄悄地相互咬耳朵，说萨瓦克正在计划放火烧市场，于是，学生和青年人手持棍棒走上了街头，准备保护市民。成年人没有积极鼓励他们这样做，也没有作出努力制止他们。这个行动的突然发生，使当局大吃一惊，陷于混乱之中。一些萨瓦克分子被抓住，送交给地方行政长官。年轻人在这座城市的所有入口处，都设置了岗哨。他们在大街上巡逻，指挥交通，实施宵禁，等等。

虽然军队在十月三十日星期一包围了城市，把骚乱镇压下去了，可是，阿莫尔事件标志着事情已发展到骑虎难下的地步。示威游行现在已呈现出明显的革命特点。它已不再仅仅是个危机问题，或者是人民被激怒，发展成为群众抗议的问题，而是一次彻底的革命运动。在十个月的时间里，国王的敌人利用了普遍的不满情绪，并把它引导到决定性的方向。国王随从中有一部分人被吓坏了。他们大吵大嚷要抓“莫斯科之手”，其他人则推测说，这是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的影响和卡扎非的代理人造成的。

不管怎样，国王当时仍有可能要么退位，要么进行决定性的一击保住王位，至少暂时保住王位。阿莫尔事件表明，军队仍在他的控制之下；美国人放手让他干，或至少看来如此；俄国人在一旁观望，宣布不干涉伊朗内政的必要性；中产阶级受到暴力的震动，十分渴望有人牵头，以便有所遵从。可是，正如美国财政部长布卢门撒尔访问伊朗之后所说的，国王已经不起“作用”了。他太紧张、疲劳了，恢复正常后，还是优柔寡断、犹疑不定。他取消了以往每年都要举行的祝寿招待会，向霍拉桑地震受难者捐款，但宣布的这些措施，同所发生的事件风马牛不相及。

他继续失去自己的机会。他在同反对派进行磋商时，那样踌躇不决，以致让民族阵线领导人桑贾比有时间到巴黎去见霍梅尼。他们会晤之后发表的公报表明，桑贾比完全同意了这位阿亚图拉的立场。

与此同时，国王的一些顾问，由于阿莫尔事件而感到震

惊，催促国王采取强硬路线。宫廷的一位朋友告诉我，阿德希尔·扎赫迪在谈论一种“智利式”的解决办法，即为了制造恐怖气氛，进行大逮捕和大屠杀。同时，为了表明国王决定使政权自由化，他建议牺牲尽可能多的替罪羊。一位接近扎赫迪的人十一月间告诉我，扎赫迪回到德黑兰之前，在华道夫—阿斯多里亚饭店的休息厅，当着几个人的面说，几个“肇事者”应当立即处决，其中包括我哥哥。另一个在场的人，也证实了这位驻华盛顿大使嗜血成性的话。我在这儿提到以上事实，是因为这些事实说明，尽管情况危险，内部争吵继续使统治阶级分裂。这个政权的成员不是象霍梅尼支持者那样进行联合和加强团结，而是放任他们的个人野心，从而分散了他们的力量。扎赫迪的个人野心是当首相。许多年来，他对阿米尔·阿巴斯抱有刻骨的仇恨。

阿莫尔事件引起了全国范围的反响。国王受到沉重压力，要他解除谢里夫—埃马米的职务，让一位强硬的军人取代他。事实上，这位首相已被指控对反对派的要求让步太多，因而造成了一种极端危险的形势。总之，群众把他们得到的一切好处都归功于霍梅尼。

越来越多的人谈论要成立一个军政府，但是，不是已经在实施由鹰派将军奥韦西执行的军事管制法吗？国王已经山穷水尽。他想扮演佛朗哥的角色吗？而他又仍在迷恋胡安·卡洛斯实行自由化的成功做法。他对何去何从仍然举棋不定。谢里夫—埃马米了解“鹰派”及其阴谋，并且企图进行抵抗。最终，他还是屈服于军方。

德黑兰，一九七八年十一月五日，星期日

当罢工扩大到全国，特别是蔓延到油田的时候，军队在德黑兰市中心突然见不到了，为示威者腾出了地方。他们推翻车辆，焚烧建筑物，其中包括英国大使馆办公楼。“处死国王”的口号声在各地响彻云霄。一场全面的骚乱发生了。

美国大使就伊朗日益恶化的局势，向华盛顿发出了警告，可是卡特总统拒绝授权从伊朗大批撤走美国侨民，以免使国王难堪。他继续公开支持这个政权——几天之前，他大肆张扬地接见了在扎赫迪陪同下的礼萨王储。接见时，这位美国总统重申，他欣赏国王为实现国家民主化所作的努力。赛勒斯·万斯也宣布，美国支持国王为恢复秩序所采取的措施。

当我阅读这些报道时，我打电话给一位身居要职的美国朋友，问他：“你们是否真的下了决心抛弃国王？”他吃了一惊，问我这是什么意思。“再也没有比加紧表示你们的支持更好的办法来推翻他了。就伊朗人来看，国王已经是你们的一个代理人。”事实上，从春天以来，示威者就一直称他为“美帝国主义分子手中的傀儡”。

十一月五日晚，谢里夫—埃马米在政府任职两个半月之后，终于带着灾难性的记录，同意辞职。几个星期之后，他先把资产换成现钞，并尽可能多地转移到国外，然后就偷偷地溜出了这个国家。

国王在会见美英大使之后，一面同阿里·阿米尼和其他政治家磋商，一面任命他的参谋长爱资哈里将军为新首相。与此同时，他发表电视讲话，保证改正过去的“错误”，向腐败之风开战，补救不公正的行为，并在结束军政府之后，恢复公民自由。他在结束讲话时说：“你们的革命信息我已理解。我深知你们为什么要献出自己的生命。”这里，国王（或者他的顾问）再次忘记了他以前曾作过的同样的保证——例如在一九七六年，提出要荡涤腐败之风；一九七七年，答应要举行自由选举。他已经失去了信用。国王迟迟采取的行动，只能使错误继续下去，而从麻烦一开始起，他就没有停止过犯错误。

一次公开的忏悔有什么用呢？假如他想通过自己的坦率和勇气，来重新获得大家的尊敬的话，他应当公开解释他的动机，强调他在位时所取得的积极成就，承认他的错误，并由他个人承担全部责任——这终究是同这个政权的现实情况相吻合的。搞一个军政府又有什么好处呢？假如事关恢复秩序问题，他应当解散残缺不全的议会，并表明决心进行自由选举。恰恰相反，军政府却在设法得到议会的批准和寻找替罪羊上下功夫。

总之，政府改组一经宣布，军队又重新占据街头。（谢里夫—埃马米的支持者声称，军队在十一月四日从街头调走是别有用心的，目的在于鼓励示威，逼首相辞职。）

德黑兰的风潮停止了，但在其他几个城市骚乱仍在继续。美国再次公开表示支持国王。国务院发表的一项公报解

释说，国王使用他自己的权力委任一个军政府，是因为情况清楚地表明，在举行选举之前，没有希望组成另一个文官政府，以便恢复必要的公共秩序。这里提到的“文官政府”，指的是阿米尼在王宫和反对派之间的穿针引线和反对派坚持只要国王还掌权，就拒绝参加组成任何联合政府。

平心而论，国王当时本应退位，允许组成一个联合政府。即使反对派要求举行公民投票，他也有可能挽救君主制度的原则。无论怎么说，他是可以拯救许多人的生命的。但是，由于他自私擅权，由于他的谋士们各怀鬼胎，因此国王就看不清潜在的现实情况。

同时，在诺夫勒勒夏托，霍梅尼运动继续高涨，并指导国内的革命活动。这位年迈的阿亚图拉重申他的不妥协，并威胁说，如果政治示威的力量不足以推翻国王，他就要动员群众发动一场“圣战”。

没有人相信国王抱有诚心。我与德黑兰市场的一位有影响的商人交谈，他因健康原因前来纽约。他问道：“我们怎么能够相信国王呢？他要拆掉我们的商店。他增加了银行和大商店的数目，把我们的大部分生意抢走了。”事实上，在搞经济现代化之前，这种市场控制了伊朗大部分商业，贷款的利率比国家财政制度要求的还高。

在世俗反对派之间，人们希望美国人压国王退位，让给他的儿子，还希望完全实施一九〇六年宪法。但是国王在扎赫迪和军方的支撑下，拒不退位。他采纳了坏的主意，再加上他不愿意在适当时刻作出必要的决定，这就迅速减少了他

的回旋余地。

替罪羊的解决办法

爱资哈里在十一月五日晚接到对他的任命之后，立即同扎赫迪以及新任参谋长加拉巴古举行了一次秘密会议。根据我听到的说法，他们在讨论中，扎赫迪说服了这位新首相，为了拔掉对国王个人的攻击的引信，需要逮捕一批公众人物。接着，他们就草拟了一份著名人物的名单，其中包括我哥哥。他们通过把全部责任加在这些人的头上，并且立即进行审判，希望再次把国王的过去一笔勾销。

次日，爱资哈里得到了国王的同意。十一月七日，他宣布，有十四个人因腐化或滥用权力而被捕，其中包括前萨瓦克头子纳西里。十一月八日，还是在国王的同意之下，监禁了阿米尔·阿巴斯，但是没有向他提出任何具体的指控。

据我所知，国王坚持要抓紧进行审判，以转移公众的视线。但是，司法大臣认为，现行的法规没有在议会的范围之外为审讯前首相提供任何途径，除非他们被告发侵吞公款或者贪污腐化。然而关于阿米尔·阿巴斯的案子，他炮制不出一份起诉书，而议会要安排一次政治审判得好几个月的时间。国王于是指示司法大臣起草一项非常法，尽快提交议会。

当时流传的谣言说，国王和王后提出，假如我哥哥想保驾的话，就应当由他来承担全部责任。我无法肯定这些传闻

正确与否。可是，这个政权正在寻找替罪羊，这个事实却是清楚的。

关于逮捕阿米尔·阿巴斯，国王后来对法国《世界报》（一九七九年四月二十七日）记者说：“除了胡韦达之外，我接受了这份（捕人）名单。我十一月七日把胡韦达召进宫内……我开门见山，要他立即乘一架私人飞机离开伊朗，假如他不得不这样做的话。我感到他的生命处于危险之中。他听完我的话后随即简单地回答：‘不存在逃离我自己祖国的问题，我本人无可指责。假如你认为把我抓起来是你的职责，那么就抓吧，你有供你使用的手段……’我预料他会这样回答的，胡韦达从来不是一个推卸责任的人，而且我知道，对他，人们不存在任何怀疑。”

我哥哥有离开伊朗的机会，但他拒绝离开，这是真的。（其他五位首相——阿米尼、阿穆泽加尔、谢里夫—埃马米、爱资哈里和巴赫蒂亚尔——都走了。）可是，如果说国王要他出走，那是前国王富有想象力的一大发明。况且，如果说他知道人们对我哥哥“不存在任何怀疑”，那么，除非是为了寻找替罪羊，否则，为什么还批准逮捕他呢？如果说他担心“他的生命处于危险之中”，那不正是因为他知道，在即将进行的表演中，阿米尔·阿巴斯注定要扮演什么角色吗？^①我已经提到扎赫迪炮制的关于我哥哥的残忍建议。无论如何，我那时同阿米尔·阿巴斯一直保持联系，我

^①见本书第三章。——作者

知道，国王曾告诉他，他的被捕只是为了拯救王位的一个权宜之计。他可以为自己辩护，事后将成为“一个伟人”。我当时就要阿米尔·阿巴斯发表一项声明，公开作答，指明国王的责任，并揭露这种利用替罪羊的做法。他断然拒绝，说这只能增加国家的困难。第二天，我们的一位亲戚从德黑兰打电话来，警告说，我哥哥的生命处于危险之中，并敦促我三缄其口。

国王在对法国《世界报》记者的同一次讲话中声称，他于一九七九年一月十六日离开伊朗时，曾给我哥哥提供一个“悄悄离开伊朗”的机会，这是一个弥天大谎。在那些关键日子里，同阿米尔·阿巴斯有联系的所有人，都强烈否认这种说法。我于一月十六日同我哥哥通过电话，我知道他没有接到这样的提议。一位女亲戚甚至向国王和王后发了一个电报，恳求他们让阿米尔·阿巴斯上他们的飞机。既然戏已经演完，国王当然可以把那些根据他的指示抓起来的同事一起带走。如果那样做，将有补于恢复他的败坏了的形象。他选择了逃跑。在宫廷历史上，对他会自有公论。

还是在那一次谈话中，国王声称，那些逮捕对“平息暴民”是必要的。众所周知，此举对群众并未起到那种作用，因为群众要的是国王的脑袋，不是我哥哥的脑袋。退一万步说，为什么桑贾比和其他反对派成员被捕几天之后就予以释放，而不同样也释放我哥哥呢？

不管国王说什么，平静并没有恢复，罢工和示威在继续。报纸为了抗议军政府实施的新闻检查，干脆停刊。

军政府的战术

新内阁决定向反对派施加压力。他们逮捕了桑贾比和他的一名副手，威胁要把工人罢工，特别是油田工人罢工的“魁首”投入监狱。政府的如意算盘是吓唬反对派，使他们同意与国王进行谈判。它的目的是为了发动尽可能多的力量，支持国王的反对者原来提出的要求，即完全和严格实施一九〇六年宪法。

这一招根本不会奏效。反对派自九月份以来，发展得更强大了，对小规模的冲突并不十分害怕，此其一。（就在下一周国王命令释放桑贾比时，他也很快就意识到了这一点。）第二，军政府的摊牌使它失去信用。整个反对派阵营现在都知道了，政府只是表面上强硬，下面正在谋求妥协。他们强化了自己的态度，国王被认定更加软弱。他们还认为，美国人不打算以内战为代价来保护君主政体。

所以，新生的爱资哈里政府发怒了。此外，十一月十日，警察同示威者在阿瓦士和阿巴丹发生了暴力冲突。三万五千名石油工人要求增加工资和释放全部政治犯，而政府命令他们回去上工，威胁说，如果他们不服从，就要向他们开枪。桑贾比的民族阵线号召在十一月十二日星期天举行总罢工。许多被迫回去上班的石油工人采取了磨洋工的战术。

十一月十六日，军队在南部地区的贝赫巴汉，东北地区的马什哈德，中部地区的伊斯法罕和靠近里海的萨里，向示

威群众开枪。一些示威者被打死，许多人受伤。

当反对派的力量继续壮大，在群众中扩大影响的时候，宫廷反而作出更多的错误估计。因此在十一月十七日建军节，军队在德黑兰游行，国王破天荒第一次没有出席。惊慌害怕是公众对国王心理状态得出的自然而然的结论。大多数观察家觉得，他应当装得大胆一些，在那个节日公开露面，从而证明他自己有决心，至少可以鼓舞军队的士气。

十一月十八日，王后前往什叶派在伊拉克的圣地纳杰夫和卡尔巴拉朝圣。官方的说法是，她是应伊拉克政府的邀请，但是，事实上，这次访问背后的动机是再清楚不过了——这是一种姿态，表明王室对国教的感情。但是，这种姿态来得太晚了，群众的反应不是无动于衷，就是露骨的敌视。假如王后一如原来的计划，于七月份前往朝圣，她或许会得到一些同情，可是，访问推迟了，就是因为那时霍梅尼在纳杰夫居住。

十一月十八日，爱资哈里将军仍然向议会提交了政府成员名单。对那些认为议会下院是一场木偶戏的公众来说，这不过是一个笑柄。很难发现有谁会相信它。新政府已经失去了它的“军事”性质。

出人意料的是，同一天，莫斯科在伊朗问题上第一次打破沉默。勃列日涅夫宣布，整个事态是一个严格的国内问题。他警告不许外部进行干涉，因而引起卡特总统的尖锐反应。

十九日，国王作出一种和解姿态，释放了二百一十名政

治犯，而军队在全国各地同示威群众相对峙。

显而易见，自从危机开始以来，国王政策的基础没有一点改变。他只是不断地挥舞大棒和胡萝卜。如果说德黑兰市场确实又开门营业的话，那只是为了弥补罢工时造成的损失。大多数商人说：“假如政府认为我们放弃了战斗，那它就错了。”

事实上，在大城市的示威中发生了暴力行动。十一月十九日，士兵在设拉子向群众开枪。二十三日，马什哈德发生冲突之后，军队侵入医院，野蛮地杀死了受伤的群众。二十六日，工人响应宗教领导人和民族阵线的号召，抗议马什哈德事件。全国范围的罢工和示威包括了石油工人。

一九七八年十一月底的形势

在经过为时三个月的持续动乱和罢工之后，经济已处于瘫痪的边缘。银行只是时断时续地营业，普遍缺少现款。由于海关官员的罢工，进口物资——其中许多是易腐品——堆放在港口和边境入口。工厂工人怠工。公务人员有时呆在家里，有时来上班也无所事事。资本继续外流。

正在这时，在社会上流传着一份知名人物的长名单（包括王室成员），他们被指控在前几个月把资产转移到国外。这份名单是中央银行参加罢工的雇员公布的，没有署名。在一百四十四个人名中间，有阿穆泽加尔、扎赫迪和许多其他官员。被援引的数字看来明显是夸大了。他们当中有些人到首相那儿要求对事实进行调查。但是，政府出于自身的原

因，没有同意。就公众而论，不需要证据。

所以，反对派的战术看起来奏效了。他们正在利用他们所能使用的一切手段，竭力使尽可能多的国王支持者被牵连进来和名誉扫地。爱资哈里逮捕知名人士受到嘲笑，而不是喝采。“国王迷了路，”他们说，“所以，他正在试图诱过于人。”反对派看到国王在自己队伍内制造倾轧，损害自己的地位而无比高兴。

然而，这个政权的支持者和敌人，都抱着担忧的心情，等待伊斯兰教历第一个月（公历十二月开始）即宗教哀悼月的到来。他们预料十一日将有一场决定性的对抗。十一日是纪念先知的孙子、伊玛姆侯赛因殉难的哀悼日。“效忠（国王的）分子”认为，如果国王设法渡过难关，他就有救了；反对派则确信，这一天将一劳永逸地摧毁君主制度。

阿亚图拉霍梅尼在诺夫勒勒夏托的老巢，加紧作宣传，向记者发表谈话和进行诽谤、咒骂。伊朗宫廷人士以及各国首都，都对法国政府允许这位流亡教士煽动叛乱，感到惊讶，因为这同国际上对待政治难民的惯例背道而驰。事实上，当霍梅尼从纳杰夫来到法国的时候，法国政府同国王进行了磋商，并且收到了关于不要把他拒之门外的请求。

在华盛顿，当布热津斯基继续鼓励国王的时候，政府的其他成员则估计国王存在的机会“接近于零”。在国王的思想里，也浮现了对美国人真正意图的怀疑。

在伊朗，一些军人感到爱资哈里政府软弱无力，开始考虑在时机成熟时发动政变。

但是，十月一底客观形势的演变表明，无论是诉诸镇压，还是寻求建立一个立宪政权，都不可能挽救君主制度。在九月甚至最晚到十月底，国王和他的顾问还是得到一些机会的，可是他们都失掉了。

爱资哈里政府命运已经注定了。

穆罕拉姆月^①

十二月一日至二日夜里——宗教哀悼月的前夕，信徒们按照习惯的做法，在清真寺度过了夜晚，然后象潮水般地涌上街头。他们无视根据军事管制法颁布的宵禁，高呼“真主伟大”的口号。在这个城市的南部地区，他们受到了聚集在房顶上的平民的欢呼。军队没有作出反应。第二天，数千人裹着白布，在宵禁之后走出家门，士兵向他们开枪，打死六十余人，打伤更多。成千上万的工人和公务人员举行罢工，表示抗议。

国王几乎与世隔绝地生活了一个星期。除了一小批密友——他们负责同反对派中的温和分子或美国大使进行磋商——之外，他闭门谢客。据他的一个随从透露给我的消息说，国王害怕对抗。他渴望组成一个文官班子，从军政府手中接管权力，因为军政府证明无力“平息暴民”。他们作不了主，事无巨细都来请示国王。国王不会承认，恰恰是他本

^①穆罕拉姆月是什叶派教徒的一个斋期，又称哀悼月，时在伊斯兰教历第一月最初十天内。——译者

人多年来的训练，使他们不能独立工作。也正是他，把他们拴在国家生活的一个角落，防止他们受到自由主义思想的沾染。而现在，他却要请他们管理国家事务。爱资哈里对我的朋友、经济部的一位高级官员透露：“大臣们不断请我作决定，但是我对这些经济问题一窍不通。我是一个当兵的！”一位刚从德黑兰回来的外国外交官对我说：“国王完蛋了。他再也不可能挽回一点点信用。逮捕你哥哥使他失去了支持者对他的信任。军队中也是一片抱怨声。大多数军官感到，如果说他连自己最好的仆人和朋友都抛弃了，那么，对他们更不会两样。”

阿德希尔·扎赫迪赶到德黑兰“给国王打气”。我的一位朋友嘲笑说：“有这样一个顾问，国王非垮台不可。”那时候，说话随便多了。没有人再害怕萨瓦克的监视。这个政权已接近垮台，这已不再有人怀疑。我的同事们都纷纷公开批评君主制度。他们拒绝同我们出席联合国大会代表团团长阿什拉芙公主发生任何关系。她一直小心翼翼地呆在她在市内的私人住宅中。

外国观察家第一次公开议论伊朗正在发生一场革命，而不是一次危机。美国人通过“私人”使者，向霍梅尼伸出触角，美国前任司法部长拉姆齐·克拉克、教授福尔克和佐宁，访问了诺夫勒勒夏托。伊朗许多政治家也同阿亚图拉接触，力图延缓这个政权垮台的时间。华盛顿表面上仍正式支持国王，但也已开始重新估价对伊朗的政策。帝国制度“忽刺刺如大厦倾”，世界各国政府都在讨论这个再明显不过的

问题。病入膏肓的国王，顶得住吗？军队会保持对他的忠诚吗？

我不时地听到关于我哥哥的情况。当然，我们不能公开交谈，我们也用不着互相通风报信。尚未对他提出起诉，而原定的审判早已过期。为什么他不提出书面辩护呢？他不想使国王难堪。我把我所了解的国王情况告诉了他——国王消沉沮丧、犹疑不定，可是我哥哥仍不相信我。我第一次开始为他的生命担忧。

同时，在连续两个晚上发生流血示威之后，出现了暂时相对的平静，只发生一些孤立的事件。爱资哈里企图隐瞒屠杀的规模，而反对派估计有七百余人死亡。他把责任归之于外国颠覆和很久以前就被禁止活动的人民党（共产党）。可是，每个人都承认，如果没有毛拉传递霍梅尼的暗语，就不会有人踏上征途一步。现在阿亚图拉已在号召士兵开小差。

十二月三日，国王在军队的压力和王后的鼓动之下，装出若无其事的样子，作了几个星期以来的第一次公开露面，访问了空军学员训练中心。他强颜作笑，以掩盖由于紧张而憔悴的面容。

一方面，政治事件和示威在爆发，另一方面，石油产量迅速下降。爱资哈里在他举行的第一次记者招待会上，声色俱厉地宣布：“每一个真正的伊朗人都得拥护国王！”他承认，在国王统治的三十七年间，发生了一些“坏事”，但是伊朗在道路和码头建设、教育和福利方面，取得了巨大发展。他接着说，得花“两个小时”才能讲完国王取得的“巨

大成就”。（当我浏览有关这次记者招待会的报道时，我感到好象是在做梦。一个人怎么竟然如此脱离事实呢？）

华盛顿仍旧支持国王。但是，政府请肯尼迪和约翰逊两届政府的副国务卿乔治·鲍尔研究伊朗局势，并提出建议。（鲍尔在报告中，谴责国王的政权，并坚决主张立即恢复文官政府。）与此同时，美国开始悄悄地撤离在伊朗工作的美国人员的家属。

十二月七日，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卡特总统暗示要改变调门。他在回答一个记者的提问时说，美国宁愿国王继续起重要作用，但是这个决定要由伊朗人民来做。舆论界马上得出结论，国王正在被抛弃。宫廷出来进行干预，于是，总统十二月十二日又收回了他的话，坚持说，他支持国王的政策保持不变。

与此同时，政府为了表示诚意，释放了桑贾比。但是，桑贾比还是拒绝同国王的“非法”政权进行任何合作的可能性。

看来事情并没有完结。国王对哀悼节可能发生大规模对抗的前景感到惊恐，急忙打退堂鼓，允许拟议于星期日和星期一（即十二月十一日和十二日）举行示威。为了避免发生实力较量，他签字让出他的王国。平民百姓意识到了自身的力量，而军队则士气不振。

“他害怕了，美国人也没有那个胆量，”人们都这样想。军方宣布，军队在示威路线上不设防，只有一旦发生骚乱时才会出来干预。示威的宗教和世俗组织者们，要参加者

保持平静。

塔舒阿节和阿舒拉节①

全世界的什叶派教徒，在伊斯兰教历第一个月的第九天（即伊玛姆·侯赛因被害前夕）和第十天，都举行悼念仪式。

十二月十一日星期天是塔舒阿节，数十万人（有人说多达上百万），在德黑兰市中心游行，队伍进入沙赫礼萨大街，朝沙赫亚德广场前进。在沙赫亚德广场上，国王在一九七一年为庆祝君主政体二千五百周年建造了一座纪念塔。在这一次空前大示威中，在群众头上飘扬的旗帜表明，示威不仅是为了悼念牺牲在卡尔巴拉②的烈士，而且出于政治目的。群众高举着霍梅尼、摩萨台和沙里亚特的巨大画像。反对国王的口号声随风传播——“处死国王！”“处死美国杂种！”“国王是卖国贼！”“有真主神助，我们将杀死邪恶的国王！”“胜利就在眼前！”“霍梅尼是我们的领袖！”等等。游行队伍中人们可以发现，参加者来自各界——工人、知识分子、市场商人、戴或不戴面纱的妇女、缠着黑色、绿色和白色头巾的教士、孩子、青少年、穿西服的富人

①塔舒阿节和阿舒拉节分别是穆罕拉姆月的第九天和第十天。这两天是什叶派最盛大的纪念日。——译者

②卡尔巴拉，伊拉克地名。公元六八〇年，伊玛姆·侯赛因在反对哈里发贾西德的斗争中，死在卡尔巴拉城门前。——译者

和衣衫褴褛的穷人。这股洪流中人们的纪律性和镇定，使所有的旁观者都为之惊叹。

第二天，数百万伊朗人民，象潮水般涌上主要城市的大街。除了在伊斯法罕发生暴力冲突之外，他们都同样镇定，同样守纪律，特别是都抱着同样的决心。

国内最著名的宗教权威阿亚图拉沙里亚特—马达里对一位记者解释说：“由于没有出现挑衅，人们的抗议是非暴力的。示威的这种规模表明，全民族都支持我们的要求。”

但是，国王和他的顾问却没有认识到这些事件的深刻意义。他们认为，由于回避了实力较量，他们赢得了一次喘息机会。他们设想的解决办法依然如故：在一九〇六年宪法范围之内，组成一个有反对派参加的联合政府。可是，教士以外唯一有效的候选人桑贾比表示，只要国王还在，就拒绝参加联合政府。而国王不仅拒绝退位，而且决心保持对军队的绝对控制。在高级军官和扎赫迪的支持下，他决心干到底。在王宫内发生的事情令人难以想象。当群众正在要求国王下台、霍梅尼的态度更趋强硬、反对派巩固力量的时候，国王和他的顾问们却躲在门口有重兵把守的尼亚瓦兰宫密室中，讨论军队的指挥和研究早已落后于形势发展的计划。伊朗又成了一个彻头彻尾的拜占庭^①。

在这一时刻，只要国王退位，任命由世俗和宗教反对派

^①拜占庭，即东罗马帝国。公元三九五年，东西罗马帝国正式分裂。公元四七六年西罗马帝国灭亡。东罗马帝国后来也逐渐衰落，延续到一四五三年，为奥斯曼土耳其人所灭。——译者

成员组成的摄政委员会，解除军队内外对血腥镇压示威群众那怕负有一定责任的所有人的职务，就可能至少挽救君主立宪的原则——如果说不是挽救这个政权的话。但是，国王和他的顾问们，被他们生活中的虚幻世界蒙住了眼睛。他们在原地转圈子。他们的基本设想是，君主必须呆在王位上。可是这种设想已经被反对派所摒弃。在哀悼节示威之前，大规模使用武力，或许会使国王成为另一个皮诺切特^①。军队仍旧是团结和强大的。可是，一经决定军队不干预示威者之后，事情就起了变化。当人民感到自己有力量的时候，军官却开始对士兵的忠诚产生了怀疑。伊朗人把国王的深居简出归之于害怕，而他们通过两天的宗教悼念活动，已经以胜利者的姿态出现了。

从那时以来，威胁和让步又接着交替出现。日复一日，由于国王顾问们的错觉，保证一个君主立宪制度的机会——甚至没有国王和他的王朝——都更加渺茫了。

我哥哥的境况

我已说过，我哥哥偶尔打电话给我，但是我们不能相互交流重要情况。他同国王没有联系。而国王呢，据宫廷的朋友讲，甚至从未询问过他。若有重要事情，我就利用一位女

^①皮诺切特，智利总统。一九七三年九月十一日，以皮诺切特为首的军人发动政变推翻阿连德政府，建立军人政府。军政府解散议会，停止一切政党活动，镇压反对派。——译者

亲戚帮忙。她得到允许可以一个星期去探视我哥哥一次。我们两人都认为，国王已没有可能再存在下去。正是他，造成了自己王室的困境。我哥哥也知道扎赫迪的花招。他说，他掌握足够的情报，可以使扎赫迪无能为力，但是他现在还不愿意披露，免得给国王增加麻烦。“我知道很多事情，”阿米尔·阿巴斯说，“但是现在我不讲。的确，国王对我不好，然而我不是那号在最后一分钟背叛的人。我将在回忆录里说明这一切。”

天哪！他们不给他这个时间。至于监狱看守为什么迫不及待地将他害死，至今对我还是一个谜。为什么不对他进行公审？为什么拒绝给他一个月写回忆录的时间？据一位在我哥哥受到假审判时在场的见证人说，阿米尔·阿巴斯认出了两个戴着假面具的所谓法官。据这位见证人说，一个是亚兹迪（巴扎尔甘的一位部长），另一个是加拉巴古（国王的一位将军）。这样的审判怎么得以收场呢？目击者说，他们甚至连行刑队都免了，就在牢房里把他杀害了。

这个人还说，“宫廷”曾扬言，将给我哥哥写回忆录的时间，但是十五分钟之后，经过同“上级”磋商，决定把他干掉。为什么？他们害怕什么？是因为我哥哥的披露可能有害于新政权吗？是因为我哥哥的披露可能对与霍梅尼接近的人有影响吗？或者是因为要保护倒台的国王？是不是这些旧政权的人员同新政权又是一伙？

其他令人烦扰的问题也历历在目。例如，亚兹迪的女婿、伊朗驻华盛顿大使馆的负责人，声称发现了泄露扎赫迪

和许多美国要人秘密的文件，怎么不公之于众呢？据说桑贾比从巴扎尔甘政府中辞职，就是因为这件事，亚兹迪的女婿拒不寄给他这些有问题的文件。现在这些文件在哪儿？谁把它们藏起来了？是美国人，还是扎赫迪？

但是，除了我哥哥之外，在德黑兰的黑名单上，还有其他人也可能透露耸人听闻的东西。纳西里将军和帕克拉万将军都曾是萨瓦克的头子。他们了解国王的保安警察同以色列间谍机关和中央情报局之间的关系，可能供出各方面关键人物的名字和情报。同样，前外交大臣哈拉巴里了解国王外交政策的内幕。按说，应该让他们都谈出来，但是实际上好象是不让他们开口。那么，要掩盖什么呢？掩盖伊朗历史上那一时期的真实情况，为了谁的利益呢？

还有别的重要问题。国内外受到扎赫迪任命或支持的人，为什么还在台上？为什么新当局对阿穆泽加尔一声不吭？在他主持政府时，许多示威者被军队打死。我并不是说我知道这些问题的答案，但是事出有因。在一九六〇年的总统选举中，扎赫迪支持尼克松反对肯尼迪。（这就是为什么肯尼迪当选之后，他不得被调到伦敦的原因。）有谣传说，当时任外交大臣的扎赫迪，通过特别外交信使带进美元，支持尼克松一九六八年的总统竞选。姑且把猜测放在一边。我哥哥的文件会有助于理解伊朗当代历史上许多黑暗的方面，这是毫无疑义的。

我在本书这个问题上扯得远了一点，是为了说明，这个政权的迅速崩溃带有许多不解之谜。这些不解之谜中，我们这

位驻华盛顿的大使起了非同小可的作用。我从美国朋友得到权威的证据表明，华盛顿的决策者并不十分赏识扎赫迪的政治才智。一位在拉巴特见过国王的法国记者告诉我，国王也不信任他的这位前女婿的能力。而现在报纸上却充满了这位大使来往于华盛顿和德黑兰之间的报道。他是否对推翻君主政体作出了自觉或不自觉的贡献？

历史学家们要弄清谜底并不容易。我提出了自己不能解答的一些问题。有一点可以肯定，到十二月中旬，穆罕默德·礼萨·巴列维——雅利安人的太阳、巴列维王朝二世——的戏已经演完。随着哀悼节示威的爆发，君主制度的寿命，显而易见已经屈指可数了。

垂死挣扎

伊斯法罕示威的消息，一天之后人们才知道。反对派的游行，象在德黑兰和其他城市一样，开始也是和平进行的。但是后来有一群示威者冲击、袭击并焚毁了当地萨瓦克总部。他们被警察挡了回去。然后，他们又聚集到这个前首都①的主要街道查哈尔—巴格大街，打碎银行、电影院和警察局的玻璃。他们还推倒了国王和他父亲的塑像。从市中心撤走的军队现在又大批返回，向骚乱者开枪。第二天，“效

①伊斯法罕是伊朗第二大城市，是公元十一至十二世纪塞尔柱王朝的都城。公元十六至十八世纪，沙法维王朝也在此建都。——译者

忠(国王)分子”试图把塑像放回基座时，他们又开始了行动。

与此同时，大部分石油工人都在哀悼节之后进行了罢工。

阿亚图拉霍梅尼在接见记者时，威胁要对支持国王的国家断绝石油出口。他无视法国当局的警告，继续发表政治性讲话，呼吁伊朗人民把下星期一作为哀悼日，纪念在伊斯法罕被杀害的人。

十二月十三日，军队在伊斯法罕举行了一次支持国王的游行。塞满了士兵和农民的卡车、公共汽车和小汽车通过大街，一路高呼“国王万岁！”的口号，并强迫汽车驾驶员在汽车挡风玻璃上，贴上王室成员的画像。在其他城市也举行了同样的示威。

在以后的日子里，宗教和世俗反对派，在大多数大城市中又积极开展活动。而国王却还在努力坚持组成一个联合政府。

罢工破坏了经济，打击了政权，这比群众示威还厉害。爱资哈里首相说，骚乱给国家每天造成六千多万美元的损失，政府开始缺钱用了。

十二月十五日，美国第一次宣布，在希望不干涉伊朗内政的情况下，它的代表已在试图帮助国王成立一个文官政府。此举是根据乔治·鲍尔的建议采取的。阿米尼提议建立一个摄政委员会，可是，扎赫迪和军事管制长官奥韦西，都建议国王拒绝这种解决办法。

在这种情况下，国王慑于美国的压力，起用摩萨台政府的一位大臣古拉姆·侯赛因·萨迪吉担负一项探索使命。

在军队中也发生了骚动的迹象。十二月十八日，在大不里士，军队拒绝向示威者开枪。几天之前，士兵们闯进德黑兰一座兵营的军官食堂，随意开枪杀人^①。在马什哈德和库姆，征募来的新兵开了小差。高级军官对下一步何去何从意见不一。这种情况使美国人和国王周围的人感到惊惶。

十二月十八日，星期一，全国各地都遵照霍梅尼的指示举行了悼念日活动。这一天在德黑兰平静地过去了，但在大不里士和库姆，发生了冲突。

十二月二十日，国王夫妇到德黑兰附近滑雪。这是国王在三个月之中第三次冒险公开露面。他的随从们想给人们造成国王仍然冷静并有信心的印象。

萨迪吉未能说服反对派成员参加组成一个联合政府。十二月二十二日，他威胁要放弃这个尝试。德黑兰到处流传的谣言说，军事政变已迫在眉睫。

国王和王后回到了王宫。厄尔布尔士山的阳光和新鲜空气，使国王的两颊恢复了一丝红晕，但是他们的士气都下降到了最低点。他颇象希特勒卷缩在地堡中的情形，躲藏在尼亚瓦兰宫的围墙之内。间或有零碎的消息传来，唤起他短暂的希望——卡特总统重申表示支持，在库尔德斯坦和伊斯法罕举行了支持国王的示威。其他时间他都是满面愁容，没

^①据通常可靠人士的消息说，被杀的军官属于帝国卫队中的一个派别，他们决心阻止国王出走。——作者

有人知道他是在冥思苦想，还是已进入梦乡。

事实上，在他神志清醒的时刻，他就觉察到末日已经来临。他的妻子和顾问，向他汇报关于他们同包括巴赫蒂亚尔在内的反对派成员进行秘密谈判的情况，希望这有助于他摆脱沮丧心理，而结果反倒增加了他的绝望情绪。仅仅在几个月之前，他还骂桑贾比和巴赫蒂亚尔是卖国贼。曾几何时，他不得不求助所有这些他最痛恨的人。对于一个在八月份还是无可争辩的独裁者来说，这毕竟是奇耻大辱。

同时，人民中反美情绪日益高涨。在南方的阿瓦士，一个美国公民——某一国际财团的业务主任——在一次伏击中被打死。在德黑兰，学生们在美国大使馆外面举行示威，高呼“处死吉米·卡特！”警卫大使馆的美国海军陆战队，施放催泪弹，才把他们驱散。

桑贾比对霍梅尼亦步亦趋。他在民族阵线的一次会议上说，国王不走开，平静就不能恢复。石油生产下降到每天七十万桶，黑市上资本抽逃加剧，美元在黑市上售价大大超过官方兑换率。取暖油短缺，政府实行配给。

十二月二十七日，德黑兰发生一整天暴力行动。这是由一个年轻教师的葬礼引起的。这个教师是被站在高教部大楼房顶上的士兵开枪打死的。虽然送葬得到官方的许可，但是送葬者突然把矛头指向军队，接着举行了示威游行。把在伊朗工作的美国人撤走的工作加速进行。在以后的一些日子，骚乱继续发生。

看来，在这个阶段，国王的顾问们自始至终希望，暴力的再起，石油的短缺和经济的瘫痪，会使人民感到厌倦，从而相信君主制度是恢复秩序的唯一希望。每一个观察家都认为，这是十足的幼稚想法。

情况既已如此，萨迪吉于是只好在十二月二十九日放弃了他的努力。国王又吁请民族阵线副主席沙普尔·巴赫蒂亚尔进行组织政府的尝试。经过同王宫几个星期的磋商，他准备接受这一要求，明文条件是：国王应当成立摄政委员会并离开这个国家。已经升任为公认的国王顾问和发言人的阿德希尔·扎赫迪否认国王打算离开伊朗的报道。他还批驳了关于王后母亲离开的谣传。可是第二天，她带了一大帮随从到达美国洛杉矶。

华盛顿宣布，总统已经命令“星座号”航空母舰离开它在菲律宾的基地，准备在需要时开往波斯湾。（这艘航空母舰很快返回了它的母港。）

三十一日，美国大使沙利文否认正在大规模撤走美国侨民，同时，他又建议他们“暂时”回美国。

那天晚上，爱资哈里将军政府提出辞职。国王请求他照管眼前事务，直到组成一个文官内阁。

在岁序交替之际，形势看来已经控制不住。总罢工使整个经济处于瘫痪。中央银行的关闭，使所有的交易中断。已经停业的商店继续停业。成千上万的人，为了取暖煤油不得不在配给中心外面连续排队几个小时，以领取他们那一份。示威在继续，并且可以在一些地方听到枪声。

王宫是一个幻想的温床。一位发言人对记者说，人民对这种混乱已经受够了，他们抗议那些出于政治原因而给他们带来困苦的人。国王的顾问们仍然希望，群众会起来反对那些反对派。

事实上，工人和公务人员，坚定不移地决心继续罢工，直到国王滚蛋。十分奇怪的是，食品供应照旧不变。

在诺夫勒勒夏托的霍梅尼和在德黑兰的桑贾比，都表示反对组成任何忠于国王的政府。

在德黑兰和其他大城市继续发生暴力行动。石油出口完全停止，机场关闭。

在这种情况下，悲剧的最后一场的幕布徐徐拉开了。

国王的出走

军队内高级军官中间一片混乱。他们知道，他们的个人前途仍同国王的前途拴在一起。他们对国王流亡的前景感到担忧。强硬派同扎赫迪一起，竭力劝阻国王，其他人把自己的财产和家属纷纷转移到国外，以求保险。

一九七九年元旦，正在拼凑内阁的巴赫蒂亚尔公开重申，一旦新班子组成，国王必须离开国家。扎赫迪立即把记者召到尼亚瓦兰宫同国王见面。所以，政权内部的矛盾仍然存在，并阻止被任命的首相从国王的诺言中得到最大的好处。这非但没有产生什么惊人的效果，公众的怀疑情绪反倒进一步加深。面容憔悴的国王，勉强露出一丝苦笑，让摄影

记者拍照。他说，他感到非常疲倦，表示希望一旦“形势许可”，就去度假。

罢工和示威继续使这个国家瘫痪下去，空军人员取代了德黑兰机场民用航空管理人员，全国各地还在零星地发生暴力行动，外国在加快撤离侨民。在这个时候，议会两院批准了巴赫蒂亚尔的任命。华盛顿坚决表示“继续支持国王”，而莫斯科则安排新闻战役报道，为伊朗政权的崩溃准备舆论。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一位重要成员，化名博里斯·韦斯宁在《新世界》月刊上写道，在伊朗发生的事件是“民族爱国主义觉悟的一次明显的爆发。我们这里论述的是这样一个发展过程：不久前还不积极参与政治的大批群众，现在却自发地参加这一历史性的活动。”

在马什哈德、卡兹文、古尔甘、克尔曼沙阿和其他地方，一些军官自行决定对群众进行惩罚性的讨伐。

正在全国开始的暴力趋势，看来预示新首相的情况不妙。

关于军队发动政变的谣言，不胫而走。看来，效忠国王的狂热分子霍斯鲁达德将军和其他高级军官，计划在国王出走之后，推翻巴赫蒂亚尔，夺取政权。他们甚至设想到了发生全面内战的可能性，把希望寄托在正规军，特别是帝国卫队身上。这些谣言使美国人感到不安。一月初，他们派遣北大西洋公约组织部队副司令休塞将军，身负劝阻军方不要发动政变的使命，前来德黑兰。他一到，就同军方领导人进行紧急讨论，而华盛顿此时正在劝国王长期去国外休假。

一月五日，卡特总统、西德总理施密特和英国首相卡拉汉，应法国总统吉斯卡尔·德斯坦的邀请，飞抵瓜德罗普岛，举行四国首脑会议。据我自己得到的情报，西德总理和英国首相强调，必须不惜一切代价支持国王，而卡特和德斯坦感到，在当前情况下，那样做已不可能。然而，他们就如何保护各自在伊朗的利益，设法达成了协议。曾让霍梅尼避难的法国，希望能充当同伊朗反对派打交道的中间人。

据接近法国总统的人士透露，在这次会议上得知，原本美国人自十一月份以来一直认为霍梅尼获胜是理所当然的了，并鼓励——如果说不是怂恿的话——同阿亚图拉和他的随从进行“私下”接触。他们多次表示支持国王，主要目的是为了哄骗沙特阿拉伯人，以证明美国不准备放弃它的朋友。

在伊朗，关于休塞将军使命的大量谣言，公开流传。一些反对派人士认为，他是来估价发动一次政变的可能性和办法；其他人则认为，他是来负责拆除美国的秘密设施，以免落到苏联人之手。还有人散布谣言说，休塞是要伊朗空军把自己所有的F-14飞机运往沙特阿拉伯。

美国正式表示打算同巴赫蒂亚尔在任何时候组成的新文官政府合作。实际上，一切迹象表明，美国人对组成新班子的前景，并不抱多大希望。无论如何，巴赫蒂亚尔就组成他的新内阁事宜，在缓慢地进行最后的磋商，而国王和王后却在德黑兰附近的地方滑雪。

一月六日，星期六，国王回来，接见巴赫蒂亚尔。巴赫

蒂亚尔呈上他的专家内阁的十四名成员名单。没有一个宗教或世俗反对派成员愿意参加。霍梅尼立即在一封信中——此信在许多清真寺中宣读——谴责巴赫蒂亚尔，并要求公务人员不让新大臣进入他们的办公室。他命令星期一为哀悼日，纪念最近示威中的受难者。

不出所料，在发生军事政变的一片谣言声中，骚乱继续发展。巴赫蒂亚尔继续同国王磋商，以便建立摄政委员会。华盛顿一再劝告国王暂时离开伊朗，建议军方打消政变的念头，支持巴赫蒂亚尔。

一月十三日，由忠于君主的人组成的摄政委员会成立。霍梅尼以牙还牙，任命了一个小组，处理关于建立一个伊斯兰政府的预备工作事宜。随着新闻自由的恢复，报纸又都复刊。

一月十六日，国王出走的新闻引起人们在德黑兰大街小巷载歌载舞、尽情狂欢。电台广播这条消息几分钟之后，首都差不多全体居民都涌上街头，高呼：“国王滚蛋了！”他们相互拥抱，汽车喇叭齐鸣。反应的规模之大和全体人民自发的欢天喜地的情景，给每一个外国观察家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示威者把国王和他的父亲的塑像打翻在地时，群众同士兵亲切交谈。口号声响彻每个角落：“我们的党是真主的党，我们的领袖是霍梅尼”，“最后的胜利是伊斯兰共和国”，“国王倒了，下一个该轮到巴赫蒂亚尔了”。

在机场上，形容枯槁的国王对巴赫蒂亚尔说：“你的政府得到我的完全信任。我希望，政府成员的爱国主义，会

使他们每一个人成功地完成困难的任务。”

他所谈到的任务，就是恢复秩序和拯救君主制度。巴赫蒂亚尔要军队负责秩序问题。为了拯救君主制度，他准备牺牲在爱资哈里政府期间由国王决定监禁的那些人。假如他们处死一位前首相、一位前萨瓦克头子以及一大批大臣和官员，国王就会洗刷掉他的罪恶，然后他就可以回来。^①所以，国王才对跪在地上乞求他留下的帝国卫队军官们这样说：“不要担心，我不会长久离开的。”可是，他又在自欺欺人了。国王的支持者和有产阶级，并没有上这些甜言蜜语的当。他们知道历史的这一章正在结束。他们收拾行装，不声不响地效仿国王的樣子从事。

埃及总统萨达特以国家元首的礼遇迎接国王。国王说，他要在埃及短期度假。

伊朗驻国外所有大使馆的工作人员都开了会，决定加入反对派。他们取下王室的肖像，并向驻在国外交部通报了他们的意图。在纽约，我的同事发表一项公报说，他们不再承认阿什拉芙公主是出席联合国大会伊朗代表团团长。

在德黑兰和伊朗其他所有城市，群众庆祝可恨的国王的出走，要求霍梅尼立即回来。“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万岁！”的口号声响彻四面八方。

十七日，人们仍然沉浸在欢乐之中。反对派不承认巴赫蒂亚尔政府，示威者要求他辞职。正象阿亚图拉所命令的那

^①见本书《替罪羊的解决办法》一节。——作者

样，政府大多数部的职员把新大臣关在门外。

巴赫蒂亚尔试图保持镇静和使局势恢复正常。他指望军队给予支持，国王毕竟嘱咐他的将军们要支持他。但是，军官们感到，国王已把他们丢下不管。因此，他们对国王耿耿于怀。

君主制度寿终正寝

在诺夫勒勒夏托，沉着镇静的霍梅尼祝贺伊朗人民，并要求他们在一月十九日星期五举行反对“卖国贼”巴赫蒂亚尔的示威。他拒绝了卡特总统关于同新政府进行合作的呼吁。

十九日，数百万伊朗人民在德黑兰和其他大城市举行游行，高呼“处死国王！”的口号。当天晚上，首都群众一致通过决议，发誓要继续战斗，直到建立伊斯兰共和国。这项决议还宣告，巴赫蒂亚尔政府是非法的，要求议会和摄政委员会的所有成员统统辞职。

首都传播着一个谣言，说军队同霍梅尼的支持者正在进行谈判。军官团中的强硬分子，仍在讨论发动一场政变的可能性。阿亚图拉宣布他马上回伊朗，并要求修订同外国缔结的全部契约。

在华盛顿，扎赫迪向报界宣称，国王在目前情况之下前来美国，可能会被解释成为一种退位行动。因此，他在最终回到伊朗之前，将继埃及之后访问另一个国家（摩洛哥）。帝国卫队和精锐部队，在他们的德黑兰军营里举行了演习，以显示他们处于应变的机动状态，并同伊朗驻华盛顿大使的

话相呼应。

一月二十三日，在伊朗首都，巴赫蒂亚尔提出，如果阿亚图拉推迟回国，并让人民去决定未来政权的性质——共和国还是君主政体，他表示可以辞职。但是，国家安全委员会自行决定关闭机场，以阻止这位流亡者返国。二十五日，政府组织了一次支持宪法的集会，五万人聚集在巴哈里斯坦广场，支持巴赫蒂亚尔。

可是第二天，霍梅尼的支持者举行了另一次示威。军队向群众开枪，大约十五人被打死。

二十八日，巴赫蒂亚尔提出去巴黎会见霍梅尼，同他讨论这个国家的前途问题。阿亚图拉坚持他必须先辞职。

在以后的日子里，示威继续进行，并发生了一些暴力冲突。死亡和受伤的人数在增加。最后，巴赫蒂亚尔山穷水尽。他作出一种和解姿态，决定重新开放机场，允许阿亚图拉回国。

二月一日，这位宗教领袖搭乘一架法国航空公司的包机，在流亡十四年之后，又回到伊朗。他的到达，受到了发狂般的欢迎。他乘奔驰汽车所经过的一路上，数百万人夹道欢迎。群众高兴至极。车队朝贝赫奇泰·扎赫拉公墓开去。在那儿，埋葬了一大批人。霍梅尼在雷鸣般的欢呼声中登上讲台，用缓慢单调的声音说：“议会和政府是非法的……我要封住他们的口，任命一个依靠人民支持的政府……如果巴赫蒂亚尔不辞职就要被逮捕……”他攻击美国，呼吁军官同人民携起手来。

此时，国王离开埃及前往摩洛哥，埃及学生抗议他呆在埃及。

巴赫蒂亚尔的末日

巴赫蒂亚尔没奈何，只有正式批准举行支持阿亚图拉的示威。他还宣布了几项措施——修订同外国签订的合同和停止向以色列和南非出售石油，等等。

巴赫蒂亚尔一上台，他就成了重大事件的俘虏，并且同国王一样，日益成为乱世之秋的牺牲品。他得不到群众的支持，军队的服从也很勉强。他确实一次又一次地采取措施，可大多无人理睬，例如，他公开宣布召回驻华盛顿大使扎赫迪，但是没有通知美国国务院，因而这位前大使实际上继续任职；他宣布被捕的人将受审，却是只听楼梯响，不见人下来。他给人的印象是一个弱者，无力制定一项明确的方针。

二月五日，阿亚图拉霍梅尼作为事实上的国家元首，采取了第一项措施。他颁布一项法令，任命迈赫迪·巴扎尔甘为伊斯兰共和国临时政府总理，授命他组阁，并抓紧组织一次关于创立一个新共和国的公民投票。他借机发表讲话，号召“全国人民举行和平示威，支持这个合法的伊斯兰政府”。他说，那些反对他的人将有受到“真主的惩罚”的危险。他们作为“伊斯兰法规的破坏者”，将受到宗教法律程序的各种严厉的制裁。他还强调说，人民通过举行团结一致的示威甚至牺牲生命，批准了他为国家元首。

委托巴扎尔甘主持政府的敕令，开头是这样的：“根据革命委员会的指令……”这是第一次提到那个委员会，其人员如何组成，迄今仍是一个秘密。

巴赫蒂亚尔次日反驳说，他不承认阿亚图拉建立的所谓“政府”，并表示，即使议会全体人员都应霍梅尼的要求而辞职，他也要留在岗位上，直到下一次选举。他向议会提出两项提案，一个是解散萨瓦克，另一个是建立一个陪审团，对被指控腐化或滥用职权的官员进行调查。在外交政策方面，他宣布，他的政府打算退出中央条约组织。

在霍梅尼呼呼的支持下，巴扎尔甘以群众宣布的支持为后盾，同军队和巴赫蒂亚尔进行对抗：十多万人在德黑兰举行了支持他的一次和平的、秩序井然的游行，其他城市的示威群众则高呼“霍梅尼万岁！”“巴扎尔甘万岁！”和“处死巴赫蒂亚尔！”的口号。武装部队在游行队伍上空出动飞机和直升飞机，以强调他们的存在。可是同一天，亚兹迪宣布，几支部队已经倒向新生的伊斯兰政府。他还宣布，二月八日将在德黑兰和其他城市举行大规模游行示威，推动这一局势的发展，而巴赫蒂亚尔预定在同一天举行记者招待会。

这时在德黑兰，关于即将发生军事政变的谣言公开传播。美国大使鼓励他的下属同宗教领导人进行接触。二月八日，一百多万人在德黑兰举行示威，要求巴赫蒂亚尔辞职。巴赫蒂亚尔发誓，他决不会被人牵着鼻子走，谴责霍梅尼的计划是“中世纪的”。

二月九日，又发生暴力行动。帝国卫队分子包围了正在

举行支持霍梅尼示威的机场技术人员，五十多人被杀害。

在国王出走几天后也离开德黑兰的一位朋友告诉我，他感到帝国卫队在一群高级军官的领导下，正在策划一次政变。

二月十日，局势恶化。帝国卫队袭击了支持霍梅尼的一个空军兵营。士兵们撤出兵营，武装了示威者。他们在街上设置临时路障，激战一直进行到次日清晨，死亡人数超过两百。根据我自己得到的情报，这就是霍斯鲁达德将军和其他少数几个参谋军官大吹大擂要搞的一次政变尝试。据一些报道说，好象他们中的一名军官拉比伊将军，预先已向霍梅尼的支持者通风报信。（然而此举并没有使他免遭一死。）报道还说，整个事情是在国王的批准下安排的。（几天之前，反对派揭露说，存在一盘国王同他的指挥官们开会的录音带。在这次会议上，国王敦促他们起来造反。国王的随从否认了这种说法。）

二月十日，我接到了我哥哥的一个电话。他表示对国王的行径已不抱幻想。一个真正的领袖，怎么能就那样放弃他的岗位呢？这些年来，他把国王完全看错了。这是我最后一次听到我哥哥的声音。

二月十一日，星期天的清晨，军队领导人决心抛弃巴赫蒂亚尔。由于得不到他们的最高统帅（国王）的指示，由于对霍斯鲁达德和少数其他人建议发动军事政变存在分歧，由于铭记着美国休塞将军的忠告，军队领导人宣告，在两个“敌对”的政府中间保持中立，并指示军队返回兵营。巴赫蒂亚尔由于失去军队的支持，而一筹莫展。他承认这个现实，逃之夭夭了。（后来发现，他离开了伊朗，到欧洲避难。）

首都几乎有四十八小时陷入了不服从任何特定权威的各派的手中。关押我哥哥和其他被国王逮捕的人的监狱的看守人，也象变魔术似地无影无踪了，有些犯人逃跑了。我哥哥仍呆在监狱里——“毕竟得有人勇敢一点儿。”他已经拒绝让他的一些朋友和亲戚组成的一个行动小组劫狱。他给霍梅尼总部打电话，决定向新当局自首，希望会带来公审，以便最后有机会作出解释。

忠于霍梅尼的部队找到并逮捕了霍斯鲁达德将军。

这是巴列维王朝的末日，是二千五百年君主制度的寿终正寝。

伊斯兰共和国临时政府搬进巴赫蒂亚尔空出来的办公室。美国宣布打算同新当局接触，以保护美国的利益。苏联正式承认了这个新政权。

德黑兰，一九七九年二月十二日，星期一

当霍梅尼吃掉对手棋盘上的最后一个棋子时，他用了一个传统的字眼：“沙赫马特。”^①然后，他往后一靠，让疲倦的眼皮闭上一会儿。他已经赢得了这场马拉松比赛的胜利。这场比赛开始于一九六〇年，一九六三年中断，一九七八年又恢复了。没有人能再同他争权。

^①波斯语的这个词，可以追溯到萨珊王朝时代，其原意是“将死”，字面意思是“驾崩”。——作者

尾 声

德黑兰，一九七九年四月七日，星期六

新当局对我哥哥不公正的审判，是从四月六日开始秘密进行的。整个表演倒退到了中世纪和宗教法庭——“法官”戴着假面具，把脸藏起来；革命委员会成员信口雌黄地攻击被告；起诉书控告他发动“对上帝的战争”，“在人间散播腐败种子”，等等。一个人怎么能够回答同玄学有关而同法律无关的指控呢？我在前面已经写到了那次仓促炮制的审判，没有律师，没有证人，死刑预先就决定了。我哥哥在他的所谓法官的高速评议几分钟之后，就被谋杀。对此，我仍然感到震惊。（除此还能如何描绘那次荒唐的审判呢？）三月十五日，他对不敢露出真面目的人说：“我们都生活在一个制度之下。因而我发现我自己就象你们所有人一样有罪，因为我们都接受了那个制度……”四月二十五日，巴扎尔甘总理在他的参谋长加拉尼将军被谋杀时，也讲了同样内容的话。他说：“不能因为军官和士兵在国王手下做过事，就被指控为叛国。我们都是有罪的，因为我们都同旧政权合作过——不管是愿意还是不愿意。”

帕拉迪西岛，一九七九年四月七日

国王和他的家属在豪华的海滨避暑圣地的暖洋洋的海水中游泳，皮肤被太阳晒得油黑发亮。几天之前，他们嘴角上挂着微笑，让世界各国报纸的记者照相。当这位前君主获悉我哥哥被谋杀的消息时，他什么也没有说。他继续关心他自己的身体，把时间花在他喜爱的网球、滑冰、慢跑和高尔夫球等运动上。他有好多个星期保持沉默。然后，由于欧洲报纸攻击他不肯拯救阿米尔·阿巴斯，他于四月二十七日发表了一项声明，企图洗刷对他的指控。

但是，没有人会被国王的这一姿态所欺骗，因为事实上，他要对他自己的所作所为承担全部责任。由于他喜欢对每一个唯唯诺诺的人发号施令，正是他，他本人，作出了所有重大的决定。

一九七五年，他在谈到他打算让伊朗跻身大国行列时，对约翰·奥克斯说：“我们在伊朗使不可能的事情成为可能，这将不是第一次。”^①三年之后，这个不可能的事情成了现实——但这不是国王的梦想，而是霍梅尼的梦想。手无寸铁者反对一支装备绰绰有余的现代化军队，革命者结束了二千五百年之久的君主统治，建立了伊斯兰共和国。这是一次史无前例的革命，形形色色的社会组织统一在“真主伟

^①一九七五年九月三十日《纽约时报》，——作者

大”和“处死国王”两个口号之下。

这些其貌不扬、很多是文盲的群众，究竟从什么地方吸取了不屈不挠的力量？难道不恰恰是因为他们的深刻信念而激发了热情吗？但是，什叶教派自十六世纪以来，一直是他们的原动力。是从霍梅尼激进的演说中吸取了力量吗？可是，这位阿亚图拉好多年前就一直在号召他们起来造反啊。

谁帮助他们造反？摩萨台的民族阵线？知识分子的左翼和右翼？可是他们只代表非常少的一部分人。是对国王的政策表示不满的石油公司吗？可是它们的力量有限，而它们毕竟仍然得到石油。

有人谈论外国影响。国王整天同美国和英国大使进行磋商。巴勒斯坦人训练了游击队组织。设在东欧某国的伊朗派凯电台一直在抨击国王。尼克松和基辛格鼓励国王把伊朗的财富花在购买先进武器上。

其他观察家说得更离奇。罗伯特·德雷福斯和他的同事在《行政情报评论》上发表文章认为，伊朗革命是英国和某些西方情报组织策划的一个大“阴谋”的第一阶段，目的在于搞乱这个地区，肢解这个地区的国家，以便在新的边界之内将它们重新组合。据他们说，这个秘密计划在伊朗的执行者是亚兹迪、戈特布扎德、巴尼萨德尔和阿米尔-恩蒂扎姆。还是按照他们的说法，亚兹迪是一个美国公民，受雇于匹兹堡大学政治学教授理查德·科塔姆，而科塔姆则被认为同赫赫有名的中央情报局有联系。所以，这个阴谋不是西方政府在幕后策划的，而是一个秘密的“兄弟会”组织干的，

其目的是阻止第三世界实现工业化，使它永远处于一种不发达状态。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者可能向这些阴谋者提供了导致这种倒退步骤的武器。伊朗被第一个选中，是因为伊朗具备有利条件。别的国家很快就会轮到。^①

这种观点在伊朗得到了一定程度的证实，例如，德黑兰宗教领袖阿亚图拉塔拉加尼的孩子被革命委员会逮捕之后，他就在一九七九年五月十七日失踪了。首都传出了一些离奇古怪的谣言，说当巴勒斯坦人占领以色列驻伊朗办事处时，他们找到了证明亚兹迪、戈特布扎德和霍梅尼的其他同事与外国情报机构有联系的文件。他们马上给塔拉加尼的儿子打电话，并把文件交给了他。正在窃听电话的革命委员会成员在小塔拉加尼离开房子时，抓住了他，把那些危险的文件劫走了。

当然，这些只是谣言而已。但是，最近世界上发生的某些事情，确实为这种见解提供了根据，例如，西方经济学家突然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开始谈论他们以前主张的发展理论的破产。他们突然敦促第三世界主要发展自己占优势的农业经济，以便增加粮食生产，使用更多的劳动力。这种理论恰恰在这样的时刻提出来的：专家们认为，按照现在的人口增长率，穷国永远无法满足他们自己的需求。大肆宣传的“绿色革命”，未能解决发展中地区的问题。至于伊

^①见一九七九年二月二十日和五月八日在纽约出版的《行政情报评论》，——作者

朗，由于缺少可耕地和水，没有希望在农业上实现自给自足。不消说，国王犯了许多错误，但他关于工业化的主导思想从根本上说是正确的，这一点不容抹煞。六千万伊朗人进入二十一世纪时，一旦石油储藏枯竭，除了依靠以出口为目标的工业部门外，他们靠什么吃饭，靠什么穿衣呢？

不管人们相信关于外国干涉伊朗事务的理论是什么东西，不容否认的是，国王竭尽所能，使自己的王朝归于崩溃。他的军备政策，他的随从的腐化，他的残酷镇压和令人窒息的独裁——这一切，特别在他当权的最后两年中，就象癌症一样吞噬着整个制度。国王由于被自己美妙的梦想蒙住了眼睛，同国家的现实隔绝开来，因此忽视了群众的愿望，看不起教士，即敌视世界，又敌视自己的人民。正如我在本书中试图说明的那样，国王在他家属的帮助之下，成了自己倒台的真正和确凿的根源。

革命是不可避免的了：在君主制度的最后两年里，它藐视法律和传统，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这个政权可以声称，它于一九六五年至一九七七年期间，取得了许多大家可以看得到的成就。但是在穷苦阶级来看，由于国王允许他的朋友和亲戚，靠垄断这个国家的生意，不受惩罚地大饱私囊，这些成就也就失去了作用。即使在更加富有的阶级中间，对国王个人和他的政治选择，也有公开的批评。专政对社会各部门都是一个沉重负担。舆论认为国王集一切罪恶之大成。这就说明了在一九七八年之后，为什么他在群众中会引起那么大的仇恨。

但是，把“真主”引进人们的一场冲突之中，而这些人正在试图解决经济公平和政治自由化问题，这些问题岂不可能再次被歪曲？本世纪初，世俗者和教士曾起来造反，反对恺加王朝的专制主义，可是没有建立他们希望的议会政权，革命导致了礼萨国王的专政。恢复严格的伊斯兰法规会产生更多的自由吗？

这个问题仍未解决。人们收听来自伊朗的新闻广播时，都会情不自禁地相信，由于无政府主义和不满情绪余波的冲击，一九七八年的骚乱和动荡会永久存在下去。甚至库姆的这位主教也承认，他谋求建立的这种伊斯兰政府，在十三世纪之前穆罕默德时代^①，只存在几年。霍梅尼会比先知的那些未能把政府维持下去的同伴干得更好吗？他会不会明白人类社会是不能靠发号施令来统治的道理呢？

这个新的共和国内部进行的辩论表明，现在仍然是君主制度时的“极权主义”——尽管“伊斯兰政府”代替了“伟大的文明”。它是否迟早会产生同样的反作用呢？

当我考虑所有这些问题的时候，我向自己发问：一九五三年允许国王永远离开这个国家，是不是会更好一些呢？中央情报局唆使的政变，只是推迟了伊朗天然发展的进程。假如摩萨台一九五三年之后继续当政，难道伊朗不会成为一个稳定的民主国家吗？当时对“共产主义威胁”是小题大作。

“共产主义威胁”真的存在吗？苏联刚刚试验它的第一枚氢

^①他想象的“伊斯兰政府”同国王的“伟大的文明”一样模糊不清。——作者

弹，而美国已有可观的数目。战后一些年发生的事件表明俄国人的审慎——斯大林面对杜鲁门的决心，于一九四五年从阿塞拜疆撤走；赫鲁晓夫在肯尼迪发出警告之后，从古巴运回了导弹。我们从人民党变节分子的嘴里知道，一九五三年，他们的领导人在莫斯科的压力下，不让下面举行武装起义。

不管怎样，一九五三年的政变，只是推迟了这种估计。国王在胜利地回到伊朗二十五年之后，再次走上了流亡之路，而这一次是带着羞愧和耻辱。他逃走时，把他最亲密的合作者抛下，落到他的敌人手中。他是这条船的船长，为了保全自己的生命，弃船而逃。

的确，穆罕默德·礼萨·巴列维的命运是奇怪的：他在国外成功地扼杀革命（在阿曼），而却被自己的人民发动的起义摧枯拉朽般地赶下了台。确实，在他自己的国土上，没有一个人能未卜先知；但是，只要有一点儿勇气，他至少能体面地结束他的统治。

跋

纽约，一九七九年六月

现在，这本书稿完成了，我也筋疲力尽了。当回顾这场牵涉我个人的悲剧时，保持平静是不容易的。我在结束一天的写作之后，常常发觉手在颤抖，怒火在心中燃烧。每写一页，我更加强烈地觉察到国王是拿我哥哥当他的替罪羊。然而，我必须努力控制自己的感情，尽力保持客观。我写过的书中，还没有哪一本付出过如此巨大的精力。

说真的，我没有想到要写关于在伊朗发生的事件的书。在阿米尔·阿巴斯惨死之后，我曾打算再搞文学和绘画，以忘却我生命这痛苦的一页。但是国王一九七九年四月二十七日对《世界报》记者发表的歪曲事实的讲话，令人作呕。因而，我接受了韦登菲尔德勋爵关于写这本书的建议。我知道，这个任务并不容易；可是，我也知道，我必须实事求是地大声疾呼，以正视听。我谨以此书祭奠我的哥哥——一个拒绝逃走的勇敢的人、一个独裁者暴行的无辜受害者；这个独裁者选择外逃避难，把别人扔下，企图洗刷他自己的罪过。我谨以此书奉献给伊朗人民——他们有权知道真相。

布里奇汉普顿，一九七九年九月

我在本书“尾声”中所表示的忧虑，正在成为现实。不仅自由化的所有希望都成了泡影，而且临时政府所导致的政权，法西斯性质日益明显。它的报复、偏狭和镇压，远远超过了巴列维王朝。新政权出于对巴列维的仇恨，甚至摧毁了过去十五年中所取得的积极发展成果。经济瘫痪、无政府主义和腐败，日益渗透到这个国家的肌体。伊朗受到了软弱和分裂的威胁。新的特权阶级——教士，把这场革命完全变成自己的私利，消灭任何反对派，实行独裁。假如伊朗人民不迅速觉醒，他们为了反对压迫所进行的长期斗争，将由于这个现代史上没有先例的、可怕的暴政的建立而付之东流。

在本书中，我试图寻找这场革命的某些根源。我希望，我的菲薄贡献，会帮助打开我的同胞的眼界，正视今天的现实。我还希望，随着经验的丰富，他们将懂得如何堵截法西斯主义的发展道路，并最终实现建立在公正和平等、尊重我们的传统和我们的特殊需要基础上的真正的民主。